

China
Spring

No. 31 JAN. 1986

中國之春

一月號

總31期

獨家發表徐文立獄中申辯(連載)

統戰？請聽一個起義人員的自白



■張諄再次向舊傳統挑戰!!

巴黎的瘋謠



聽到同胞的聲援，徐文立
妻女欣慰地笑了。

馬德生出國 / 魏京生近況

● 格利克打敗了鄧小平

國民黨中央日報關門算了!

獨家
專訪

先苦後甜的中美鴛鴦



.....
迎接 中國民聯 的召開!
世界二大
.....

慶祝中國民聯成立二周年！



(1)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底，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在紐約舉行，這是大會的第一會場。在此次大會上，中國民聯宣告成立。

(2)中國民聯日本分部的工作扎實，穩健。圖為日本「知識」雜誌刊登的對日本分部姚月謙、童萬著、林漢傑的訪問錄。

(3)中國民聯香港分部經營的中國之春書屋，向中國大陸傳播民主思想。

(4)中國民聯于一九八四年元月趙紫陽訪美期間，舉行請願和遊行活動。

(5)中國民聯法國支部與各共產黨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聯絡廣泛。這是八五年九月十四日在法國與各國人權人士舉辦展覽會。

(6)中國民聯澳洲分部工作主動，這是他們在八五年二月廿四日在墨爾本唐人街派發宣傳品。

②

變數する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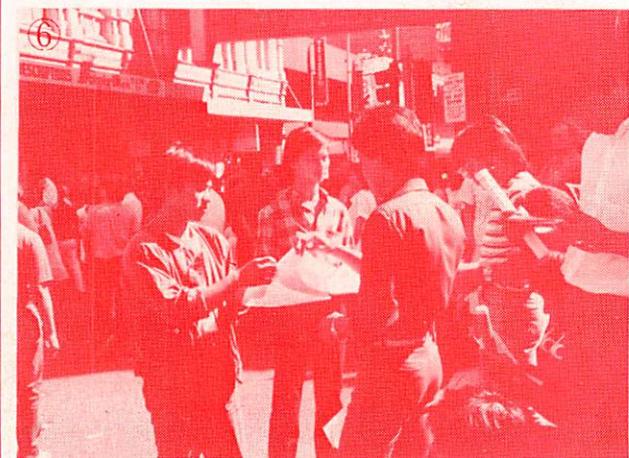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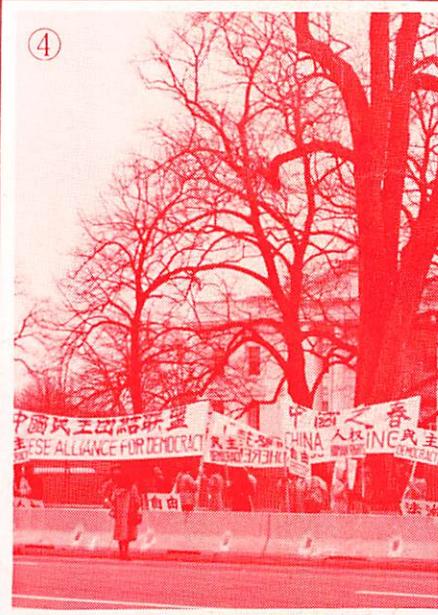
六つの謎み方

反逆罪、反革命罪に問われても、中国を民主化せんとする運動の輪は確実に広がっている

もういくつ寝ると中国の春

姚月謙 童萬著 林漢傑

中国人ホンを座談会





格利克預言了新洋務運動的破產

韋納·格利克即將失望地告別中國。

格利克，這位熱心於中國四化的西德退休火箭發動機專家，去年受聘於武漢柴機油機廠，成了開放以來中國工廠的第一個外籍廠長。格利克雖已六十六歲高齡，但老當益壯，每日工作十二個小時，每月僅拿幾塊美元的象徵性薪水。他對中國的友好之情，連北京的高級領導都為之感動。為了支持格利克的工作，各級領導對他做了「有職有權」的承諾，武漢市還授予他「榮譽市民」的稱號，中共的宣傳媒介對格利克任廠長的這一「新生事物」，也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導。一時間，中共把格利克塑造成了白求恩第二。

據云，格利克任廠長一事，是鄧小平點點頭的。鄧小平之所以樹這麼一個樣板，是想為實現他二大目標摸索些經驗。這二大目標是：(一)引進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管理方法；(二)引進先進的科學和技術。鄧小平曾一再指出，他的開放政策和向西方學習的運動，目的就是上述二點。但他強調，決不引進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四化的同時，必須強化「四個堅持」。因此，鄧小平的四化運動，在本質上與清末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李鴻章等也強調，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學習西人的「船堅炮利」，但不能學習西方的先進社會制度；「船堅炮利」乃為了鞏固清室的專制統治。鄧小平的四化，就是一場新的洋務運動。

格利克並未辜負鄧小平的寄望，上任之後

的確大刀闊斧地幹了一陣。他向武漢柴機油廠介紹了不少西方企業的管理方法，也進口了一些先進技術，他還打算逐步更新廠裏的全部陳舊設備。在格利克廢寢忘食地努力之下，柴機油廠的生產曾有所轉機，但時間不長，又跌了下來。格利克奮戰了一年多之後，精疲力竭，整個工廠，回春無望。在事實面前，從來不認輸的他，不得不向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低頭，絕望地宣佈：待合同期滿，將捲起鋪蓋回國，種花養魚去也。

天真的格利克，在中國遇到的困難，是他事先想不到的。

第一個困難：他敵不過地頭蛇。格利克名為「有職有權」的廠長，却管不了敷衍塞責、但有黨票的下屬。該廠產品屢出問題，追究結果，責任在總工程師和質量檢驗科科長身上。格利克下令開除這兩位失職者，但他們竟被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保護得牢牢的。有「質量先生」美稱的格利克，只得搖頭嘆息：「他們不走我走。」

第二個困難：他打不破國營企業的大鍋飯。說來可笑，該廠門口高懸「時間就是金錢」的大標語，可是，每當格利克走進車間，總是看到不少工人在那裏喝茶、聊天。身為一廠之主，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無權將偷懶的工人解僱。

第三個困難：他飛不出計劃經濟的鳥籠。格利克想將該廠產品外銷，以積累外匯，更新

廠裏的設備。報告一直打到副總理姚依林那裏，但得到的答覆是：按國家計劃，該廠產品只能內銷農村。

第四個困難：他拆不散螃蟹筐。格利克在中國體會到，各國營單位之間，廠內各官僚部門之間，簡直就像一堆裝在一個筐內的螃蟹，互相掣肘，互相抵消精力。然而，這個鐵筐，別說格利克，就是鄧小平也難以拆散。

總之，格利克面對的挑戰，不是陳舊的技術，不是普通的不合理的管理方法，而是一部龐大的官僚機器，一個號稱「優越」，實則腐朽的社會制度。一年多的實踐終於使他明白了：他在西德獲得的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不能適用於中國的現行制度。他不得不痛苦地失望而歸。

一個世紀前，李鴻章等人曾雄心勃勃地計劃，一旦將西方的堅船利炮引進國內，中國便會強大。歷史已經宣告了舊洋務運動的破產。如今，鄧小平等人正在重溫李鴻章的舊夢，妄圖在不改變現行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引進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先進科技，以實現四化宏圖。鄧小平認可下的格利克實驗，已將新洋務運動的夢幻徹底擊碎。

曾一度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鄧小平，在格利克的實踐面前，是否認識到「不變制度、不能四化」的真理呢？

鄧大人，醒醒吧！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雜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三十一期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六年一月號總三十一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ending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社論

3 ■ 格利克預言了新洋務運動的破產

●讀者·作者·編者

6 ■ 請王炳章先生更正·向鄭保羅先生致歉·聲援國內學運·瘋人罵街·因私而怕·缺少考慮·司馬璐先生來函·共產黨出身·多謝鼓勵·給譚純先生的信·一國兩制請從大陸開始·以暴易暴者得暴?
鄭保羅等

●特稿專欄

10 ■ 巴黎的瘋話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中國大陸居法作家)張 諱

●本期專題

迎接中國民聯世界二大的召開

27 ■ 發揮壓力團體的作用

——寫在中國民聯世界二大之前

(中國民聯)王炳章

29 ■ 讓人們在民聯會上看到中國民主的希望

——寄語「二大」代表們及全體盟友們

(中國大陸留學生)李兆陽

32 ■ 民運人士應學會民主運作

——對民聯「二大」的忠言和期望 (香港大陸新移民)今之鳴

34 ■ 關於民運的自身民主化之我見

(中國大陸留學生)姚敏竹

37 ■ 不必為民運悲觀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楊子江

38 ■ 論「民運者不坐天下」

(中國大陸新移民)鍾 衡

●民運報導

40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42 ■ 魏京生·他的妹妹與女友·李慧娘 (本刊駐歐記者)陸明

43 ■ 鄭樸方協助馬德生出國 (本刊駐歐記者)陸明

●特別專輯

徐文立獄中申辯

44 ■ 回憶戰友徐文立 (中國大陸留學生)柯力思

46 ■ 我的申辯(連載) (原「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

●國內快訊·時評

57 ■ 海南的今天就是中國改革的明天?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揮 戈

58 ■ 台灣人可在大陸買地,大陸人為何不可? (中國大陸作家)趙大吉

59 ■ 喜聞土地政策突破 (中國大陸作家)趙大吉

編者的話

徐文立「獄中申辯」的部分內容公佈後，引起強烈反響。稍有良好的都義憤填膺地說：「這哪是反革命？把他打成反革命的人，才是歷史的罪人！」本期繼續刊載徐文立的手稿，本期刊載的部分，記述了徐的童年和少年。徐文立戰友柯力思的文章，寫得親切感人，激起人們對坐牢的民運人士的無限同情。

張諱的「巴黎的瘋話」，再次向舊傳統提出挑戰。這位於出身於解放軍高幹家庭的女作者，從解剖她自己開始，痛斥了傳統文化的某些陰暗面，鞭撻了獨裁者。

中國民聯即將召開世界二大，本期組織了一批文章，討論了民運組織的運作方式、民運組織如何實行民主等等，做為向「二大」的獻禮。

中共的統戰風不停的刮。國內屈可伸的來稿，以一個國民黨起義人員的現身說法，揭露了中共統戰的實質。原擬本期推出的人權專題，因編譯費時，移至下期。

下期預告

下期的專題是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一系列有水準的研究報告，將使讀者對大陸人權現狀有全面了解。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新著「中國的民主」及政治學教授司馬晉所著「中國的人權」兩書，受到國際普遍重視，本刊記者對這二位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了採訪，下期將刊出對他們的訪問錄。

徐文立的「獄中申辯」，下期繼續連載。

人物專訪

64 ■ 先苦後甜的中美鴛鴦

——記曾驚動中美政府的衣錫工與莉莎（中國大陸訪問學者）郭城琦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79 ■ 鄧小平預計八七年退陣

67 ■ 太子黨面臨的新挑戰（國內）楚青原（北京）柳平

統一論壇

69 ■ 國共和談——中國走向民主多元的契機（中國大陸留學生）李兆陽

思想論壇

73 ■ 愛國主義與集體治療（美國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教授）孫隆基

74 ■ 我對評價毛澤東的看法（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方庸魯

78 ■ 毛毒何時了？（中國大陸新移民）曲元

台灣專欄

80 ■ 台灣的權力繼承問題（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張俠

83 ■ 劉添財台獨模式（台灣旅美作家）劉添財

63 ■ 國民黨中央日報關門算了（中國大陸訪問學者）鳴健

僑社專欄

86 ■ 人人起來講真話（美國華僑）黃雨川

87 ■ 喪權辱國，莫甚於此（美國華僑）晨全中

留學生園地

88 ■ 來美雜感（中國大陸留學生）安秉義

90 ■ 胡啓立、李鵬應看的幾封信（中國大陸留學生）伍石村

91 ■ 略談「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演變（中國大陸訪問學者）黎民

92 ■ 借用一等功臣的嘴（中國大陸留學生）伍石村

93 ■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大陸留學生）黎晉

33 ■ 夕光／睡／生命（詩）（中國大陸青年詩人）嵐之凝

36 ■ 又一次送別／站台速寫／黎明（中國大陸青年詩人）嵐之凝

39 ■ 無聲集——為那些我永遠愛着的人們（中國大陸留學生）艾菲

95 ■ 最後的一個（小說）（中國大陸新移民）黃洵

97 ■ 夜懷魏京生（詩）（中國大陸留學生）哲子嬰

● 封面／山水（星星派畫家馬德生作）



請王炳章先生更正

貴刊十二月號（總卅期）刊載的王炳章先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演講一稿中，將本人倡導的「民主統一促進會」與宋希濂的「和平統一促進會」相提并論。誤導了讀者，本人要求更正。

本人倡導的「中國民主統一促進會」，其宗旨如下：

- 一、促進中國民主統一，和平建國。
- 二、為爭取華僑權益，協調華人大團結。
- 三、反對任何武力統一中國的觀念，促請海內外大團結，一致對外。
- 四、軍隊國家化，軍人不得參與政治或干預政治，軍人以保國衛民為天職。
- 五、促請海內外同胞「心平氣和論國是，攜手合作建中華」。重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的大中華，以達到民有，民治，民享，民保的目的。

可見，本會之宗旨與中國民聯的奮鬥目標基本相同。我在此聲明幾點：

第一、本人倡導的民主統一促進會是完全獨立的。這點與宋希濂的和平統一促進會截然不同。宋希濂的團體受中共所指使。

第二、本人前些日子回國，往返旅費完全自理，未有浪費人民的血汗錢。

我對王炳章先生勇敢推動民運、犧牲奉獻的精神，尤感欽佩。但由於貴刊報導不確，使本會名譽受損，故提抗議，并請更正。

中國民主統一促進會召集人 鄭保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向鄭保羅先生致歉

本人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演講稿中，未能明確區分鄭保羅先生的「民主統一促進會」與宋希濂先生的「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性質，易使讀者產生誤解。對此，本人向鄭先生及他的團體致歉。

王炳章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聲援國內學運

看到貴刊十二月號上的「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更感到國內民主運動仍處在風起雲湧，方興未艾的時期，也為當局殘暴鎮壓學生運動深感憤慨。值得注意的是，當局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變換手法來扼殺未形成的學生

運動于胎中，這從十一月二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可以看出，這所謂的聯合通知，完全是當局將「學生運動」轉變成「運動學生」所玩弄的一套鬼把戲。「九、一八」北京，武漢，西安大學生的遊行之后的沉默，醞釀着一場新的風暴，這將在「一二、九」抗日救亡愛國運動五十周年紀念之日爆發，靠搞學生運動和運動學生起家的人當然深知此理。我們相信貴刊以及在海外搞民運的人們的敏銳目光，對這一切是深有洞察的，但並不是所有海外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學者都了解這一點。因此，希望你們

在這之前廣造聲勢，充分發動海外留學生的力量，揭露當局的陰謀詭計，聲援國內有愛國之心，但不享有愛國自由的學生。

幾名大陸留學生於美國賓州

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瘋人罵街

中國之春十月號總廿八期全文刊載了中共中央文件（關於抓緊新形勢加強對台工作和對台宣傳問題的座談會紀要），標題為「統戰密件」曝光，顧名思義，曝光的動機目的，旨在揭露中共統戰陰謀，但同期林樵清的（從披露中共中央密件所想到的）一文，第八段起用大量篇幅談國民黨反共如何如何，似在揭露國府，給人一種「兩個拳頭打人」的感覺。其次，「國民黨將反共視為專利」，這種提法不妥，「專利」根據何在？——沒有說服力。文中對台灣社會繁榮，人民生活富裕高出大陸十多倍，是國府近數十年來慘淡經營的結果，不予強調，反而誣蔑「民、青兩黨是花瓶黨」，忽略大陸有更多的花瓶黨，酷似瘋人罵街，實為不

智之舉。

林君文中不乏卓越論點，惜蕪雜冗長，語近挖苦，打擊目標混淆不清，敵我友不分，無目的地濫樹敵人，只能使你們越搞越糟。

大陸新移民 袁大戈
八五年十月三十日

因私而怕

我在國民黨內工作了三十幾年，一直被目為忠黨愛國份子，但總是覺得有些什麼不對勁，覺得國民黨照目前這樣子發展下去，遲早會有麻煩。看到了貴刊二十八期林樵清先生所寫的：「台灣！台灣！」從披露中共中央密件所想到的「一文，覺得他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把國民黨分析得太透徹了。

國民黨搞到今天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私」字在作祟。因私而「怕」。反正都是當皇帝，在那裡當皇帝還不是一樣？何必冒著危險去進攻大陸，作大皇帝？搞不好連台灣這個小皇朝都丟了！這種不求進取，只求自保的心理，遲早還是要把台灣給丟掉的。

有時我真想指着我上司的鼻子和國民黨領導人大叫：你們這般人享盡了政治利益，也取得了不少經濟利益，却一點也不替老百姓想想，將來共產黨來了，你們是第一個帶著妻小拿牙刷逃走的人。但一般老百姓怎麼辦？你們何曾替他們想過一絲一毫？

這次我回去，也要想方法把我妻小弄到外國，別怪我這麼做，因我不能扭轉大局。

台灣居民 張立於美國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缺少考慮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

貴刊十月號封底刊登了一篇「徵求大陸留學生通訊錄」的廣告信，要讀者根據「有一集一，積少成多，遍及各校」的原則，協助你們收集大陸留學生的名單或通訊錄，我認為你們的這一做法是缺少仔細考慮的。貴刊提倡的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而這種做法却是違背了你們所提倡的這一宗旨。試想某同學在不出於自願，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第三者將其名字和地址告訴了你們，而該第三者因此而獲得你們的讚揚和獎勵，這種做法合適嗎？政治這東西是不可勉強於人的，在眾多的留學生中，雖然有人同情和支持你們，但也有人出於某種原因而不敢接觸你們，當然也有人不願過問甚至不贊同你們，因此不要以為這種做法人人都會歡迎。

貴刊是一份有影響的政治刊物，且已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支持，我以為只要自信自己所倡導的事是正義的，就用不着擔心沒有讀者，更不怕沒人支持，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真確與否，請指教。並請刊登此信。

澳洲讀者 陳鳴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

我去就山——敬答陳鳴先生

陳鳴先生大鑒：

您來信對我們「徵求大陸留學生通訊錄」產生了質疑，並認為我們的做法是缺少仔細考慮的。現我在此就我所知的予以答覆。

首先，我們給留學生寄雜誌和宣傳品的做

法並沒有違背我們所提倡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宗旨。因為我們這樣做是合法的。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都是受到保障的。我們有權給留學生們寄雜誌，當然，他們也有權不看，可是他們沒有權要求我們不寄。

我自己每天回家，經常在郵箱裡發現很多宣傳品。有商業性的，有政治性的，也有宗教性的。真是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瞭亂（英文稱之為「Clutter」），有時間或有興趣的話，我會隨手翻翻，但多半我都是往垃圾箱一扔。他們可以寄，我可以不看，但我不可以禁止他們寄。在著名的海德公園，每天都有人站在肥皂箱上演說，你有權聽，也有權不聽，但你沒有權制止他講話。

還有，留學生的名單很多大學都公開，而且印有通訊錄。我們照這些名單寄雜誌也不算侵犯隱私權。在西方各國都有電話簿或會員名冊什麼的，裡面姓名地址詳列。我相信許多公司可能就是從電話簿上抄了我的姓名地址而給我寄宣傳品，但我不能因此而控告電話公司或給我寄東西的公司。當然，你有權要求電話公司幫你隱姓埋名，或要求任何知道你姓名地址的人士幫你隱瞞，只要你做得到這點，擔保你收不到任何宣傳品，可是有要這樣做嗎？何況在西方國家，做到這點並不容易。

你在信上問到：「某同學不出於自願被第三者將名字和地址告訴了你們，而該第三者因此而獲得了你們的讚揚和獎勵，這種做法合適嗎？」首先，要看我們拿到這些留學生名單之後要做什么？如果是給他們寄武器或毒品什麼的，那當然不合適，就是合適，我們也於心有愧。但今天我們給留學生寄的是我們的雜誌，雜誌的內容主要是宣揚民主、自由、法治、人

權。因此，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談到我們給留學生寄雜誌這事，我們永遠問心無愧。

第三者在幫助我們之後得到讚揚和獎勵，這並沒有什麼不對，因為他也替中國的民主盡了一點力量。而別人在付出了勞力之後得到報酬，也是很正當的。

您信上說政治這東西是不可勉強於人的，我同意。但為了使中國的政治走向民主，我們總要對這些留學生做些工作，因他們到底回國後是一股改革的力量。如果他們實在不願過問政治，甚至不贊同我們，則可在收到我們雜誌後，直接丟入垃圾桶可也。我們只要求寄到，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勉強他們去看，去接受。當然，我們主觀的願望是希望每一個接到的人都能翻閱，但客觀的事實發展則非我們所能掌握的。

您說有些人出於某種原因而不敢接觸我們。我承認這點，也正是由於這點，我們更要給他們寄雜誌，讓他們了解我們。如果有誰因為某留學生看春雜誌而向某方面打小報告，這時也將啞口無言，因為我們是公開給留學生們寄的，打小報告的人可能回到家自己也收到我們雜誌。這樣就成功的打破留學生們害怕接觸中春的心理。

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你們要巴巴的向留學生們寄雜誌？有時還要讓人產生誤解，人家不理你們就算了，何必還要去接觸人家？煩不煩？累不累？」這令我想起了「我去就山」這句話。

一次，回教先知，穆罕德對信徒們傳道時說：「我可以叫山過來。」於是他舉掌向遠方的山喊道：「過來！」山沒來，他停了一會，再向山喊道：「過來！」山還是不來。衆信從此時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覷。這時穆罕德就

說出了他那句震古爍今的名言：「山不來就我去就山。」然後朝山走去。

今天，我們對大陸留學生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我去就山」的工作。有些同學可能根本就沒聽過中國之春，有些聽過了，但却不敢接觸，更有許多留學生根本不知道中國之春的通訊處。如果我們守株待兔似的等待他們和我們聯絡，可能永遠也等不到。於是，我們乃在此主動的做「就山」的工作，無論他願不願意被就，我們都要盡力去試一試。我們相信，日積月累，總會有些成績的。

任何一種宗教，一個政治團體，如果沒有「我去就山」的精神和胸襟，則永遠不能發揚光大。今天，我們被許多人誤解，扭曲、奚落、責罵，沒有關係，因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踏實去做，總有一天——當然，成功不必在我——會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的，是的，總有一天！

中國之春編輯 林樵清

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司馬璐先生來函

貴刊第二十九期（十一月號）刊載之本人有關中共統戰策略的談話，擬作以下一些補充：

第一、在中共對台統戰策略「滅頑打民」（消滅台灣的頑固派，打擊真正的民主派）一項中，根據中共統戰的傳統經驗（此類資料見于中共著名的統戰專家的回憶錄），中共的「滅頑打民」往往不需要自己動手，中共一手利用頑固派打擊民主派，另一手利用民主派打擊頑固派。

第二、在中共心目中，國民黨頑強反共的稱爲反共頑固派，台獨份子則被稱爲阻撓國家統一的頑固派。假如有一天台灣出現混亂，得益的絕非台獨；中共既視台獨爲阻撓國家統一的頑固派，所以，當台灣內部出現混亂時，中共首先消滅的對象就是台獨。

第三、本人深信，中國前途繫于民主。本人希望，中國有這麼一天，各黨派（包括台獨）同樣受到法律保護；本人希望，中國各黨派搞民主主義，不要搞陰謀詭計，本人對於中共對台灣統戰文件作出分析，因爲中共這個文件屬於陰謀詭計的一種。

最後，本人願意重申這個信念，本人分析中共對台統戰文件，係基于民主大義。本人希望，中國各黨派（包括台獨）認清大勢，權衡利害，按民主主義的原則辦事，按民主主義的原則團結。本人對於若干小宗派的無原則的紛爭深惡痛絕。

弟 司馬璐拜

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共產黨出身

看了貴刊八五年十一月號總二十九期上訪問司馬璐先生的文章，覺得他講的十分的對。因爲我自己是多年的黨員，也曾任某對台部門工作過。中共對台的政策就如他說的在向前發展，其中細節如派人入台，長期潛伏，單線領導等，都是正確的。國民黨偶而破獲，但都不傷大局。

我是騙了美國政府而入境的，（美國不准共產黨員入境），像我這樣進來的還不知有多少，在這裡住了一段日子，發覺，如果要我們

顯覆美國政府真是談何容易，反而我們會很容易被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所顯覆。

我個人不希望台灣被中共吃掉，如果這樣，中共就少了一個制衡的力量，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脚步就會更慢了，只是台灣實在令人失望。

對於司馬璐先生，我的看法是：「他太了解共產黨了，真不愧是我們共產黨員出身的。」

王文於美國

八五年十月三十日

(請再與我們聯絡——編者)

多謝鼓勵

中國之春編輯部：

托人帶來的信和肆百元美金收到。我的文章「論官商」和「二論官商」竟得到譚純先生贊助的「獎勵中國之春優秀作品」的三等獎，真謝謝你們的鼓勵。我們把這些鼓勵視作你們對國內民主運動的進一步期望，我們不會辜負這種期望的。

正在蛻變的中國太多變化着的東西，我們希望在這變幻中捕捉較永恆的實體，而不迷戀於彩霞般的雲烟，這種辨別是需要時間的，有心得我們會寫成文章給你們。

肖平草於國內八五、十一、二

給譚純先生的一封信

尊敬的譚純先生：

您好！

不才小女幾篇混言，竟蒙錯愛。收到了您好意贈送的「中春作品獎」，令人誠惶誠恐。

您解囊為民運造聲勢，在下憑著半截破筆檢着看不順眼的事去罵，互為默契了！

感激之言不多講了，譚先生的姓名，小女終身不忘了，今後的報答，是看我能否堅持握著這隻圓珠筆了。

祝您及您一家人安好。

向您的精神致敬！

張諄於巴黎

一九八五、十、二十四

一國兩制請從大陸開始

中共最近的口號是一國兩制，但由於其過去的信用太壞，所以不但國民黨不相信，老百姓不相信，兩邊倒的「牆頭草」不相信，就連中共自己的幹部也不相信。

惟一的辦法是將一國兩制，先在大陸實行起來，如果不再是假、大、空，大家自然會看見的。本來最方便的是劃出一個地區，如海南島，或深圳來實行。但不幸，這兩個地方，都已出了假、大、空的毛病，不可能使人信服了。所以惟一的希望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先作起。在鄧大人、鄧青天的親自督導下辦出成績來就有希望了。

第一步是新聞自由。如能像當年重慶國民黨容許出版新華日報的前例，讓中央日報在北京出北京版自然最好，但中共大概不會有國民黨那種度量。鄧小平也不會像蔣介石那樣優。不得已而求其次，似乎最好是先讓大陸留學生辦的中國之春在北京自由發行，如果連中國之春這種捧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放的雜誌都容不

了，那麼，那裏還能容中華民國的人？還那裏能談一國兩制？

聞其言而觀其行，單說空話是沒有用的。

海濤於美國一九八五、十、四

以暴易暴者得暴？

看完了寒山碧君所寫的：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的出路，其中有一點很重要的思想：即暴力革命不能帶來民主，以暴易暴者得暴。

其實這個論點並不一定正確，而他自己也在文中也推翻了這一論點。美國是以暴力打敗英國，取得獨立，而建成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如果當時美利堅十三州堅持和平的民主鬥爭，可能到現在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的湯武革命，拯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成功後所得到的也並非一個暴虐的政權。因此以暴易暴者，所得到的並非一定是暴政。這完全要看領導者的心態而定。華盛頓是偉大的，就是因為他成功後堅持不做國王、不搞獨裁。使整個國家走上民主政體的道路，因為他不搞獨裁，後繼者也就難有藉口搞獨裁。

中國的孫中山如果晚死二十年，中國也不會變成今天這樣。孫中山是高瞻遠矚且有廣大胸襟的。當人民提議他兒子孫科出任廣東省長時，都被否決了。但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蔣介石繼位，獨裁性格表露無遺，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最後還是把幾千年中華文化中的父子相傳的精神貫徹下去，讓外國人在旁邊看笑話。因此，以暴易暴者未必得暴，主要是要看當政者的心態和氣魄！

歐洲華僑王以利

八五年十月二日

巴黎的瘋話

(之一)

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中國大陸作家·巴黎)張諄

佈告：

天下「綠衣行者」：此信直投天堂，交台灣學者殷海光先生面啓，莫遺他人手中。以從速為盼。

鞠躬！ 巴黎某小人

海光先生：

日前經友人的手借得您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這書把我害苦啦！總有十幾個夜晚，它不讓我睡覺。厲害處竟然不讓我一口气讀罷，只消看個十幾、二十幾行，已讓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過去的事，眼前的事和未來的事，在我這不大的腦子裏翻騰，片刻功夫已經疲倦不堪。

我喜歡看魯迅的書，直覺着他是個滿口說聰明話的老頭。三十多年台灣海峽的隔絕，我在大陸無緣認識您，直到去年來了國外，才知道中國還有個聰明老頭住在台灣。我一向心高氣傲的很，我的老師一向恨我待他不恭，然而我真得佩服您，正當我有心拜您為師時，又在您的另一部遺作中，知您已于七十年代過世了……。

可惜的聰明老頭們，都死了。

但您的書激起我那麼許多牢騷來，您想不聽聽就走了嗎？天下沒有這等便宜事兒，毛澤東寫過一句「牢騷太甚防腸斷」，假如我的腸子被撐斷了，還得求醫，而當今的醫生很會要

錢。這個世道，救命的事也收費，可算昏道了。

文化，這個小到只有兩個字，大到縱橫古今的嚇人字眼，用什麼來說明它呢？這世界上有一百六十多種寫成文字的解釋，可惜我一條也背不下來，只是用心一想，覺着它好像是人類社會之形成發展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的積澱，或者通俗一點說是歷史吧，我這一番自以為是的胡說，肯定為一些研究「文化」這兩字混飯說的學者不滿，罵我是「無稽之談」，我也會罵：「你有稽？你是鸚鵡學舌！」的確，我有時真害怕那些學究們，他們寧願聽死人的「古訓」，而不願聽活人的話，與他們談話更無味，您提一個問題，他們馬上很準確地告訴你某本書某一頁寫的是某某某。活人頭裏裝得是死人的腦漿，咳！

言歸正傳，您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我个人感覺，是站在對中國幾千年文化進行批判的角度寫成的。

難得，難得，實在是難得！

我們中國人都是講孝順的，而且是無原則的孝順。對於「大祖母」——祖國來說，孝意更是無限深厚的。

梁啟超之流當年崇奉洋政，很為人們所不恥，何況又猛抨中國傳統文化政治。以後也有人罵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但太多是一事一議

式的，像您這樣全盤端來批判，恕小人寡聞第一次看見。您不僅僅是一位學者，而且是位思想家，這後一個稱呼是您的不凡。中國近些年來不能說沒學者，但儘是只學不思的「讀書蟲」，談起他們的專業來，能把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一切有關的東西講給你聽，腦子裏好像裝了一部電腦的信息儲存裝置似的。可惜，「工程師」把「分析裝置」漏裝了，所以好些學者就成了只學不思的「先天性半身不遂」？反正十億人出不來一個哲學大家。

中國文化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一點也不敢胡說。

只記得四年前我遊到南京——「金陵城」時，站在長長的長江大橋的構造，吃驚而失望地看着我們中華民族的「血脈」，像一條全身沾滿厚重的泥濘，年邁力衰的老龍，艱難地向前蠕動時，我傷心了。

「怎麼也是這個樣子呢？」

蘇軾的詞是怎麼寫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可它，竟偏偏象詩人描寫的那樣：「拖着——一條長長的黃色裹屍布。」

小時候隨父母回山東老家，爲了看一眼「中華民族的搖籃」，我不肯睡覺，一個人趴在軟

臥車廂的走廊裏，小屁股攔在兩寸寬的暖氣擋板上，隔着玻璃壓扁了鼻子嚀往外看，其實離黃河還有二百里呢！我累的要死了，服務員問我幹什麼？我說我要看黃河，他說已經過了，天黑我看不見，這氣得我夠噲。看不見黃河我還算什麼山東人？回天津還有什麼可向小朋友們吹牛皮的？

回程時正是白天，我終於看見了黃河，我大喊起來：

「怎麼這麼髒呀？怎麼這麼黃呀，全是泥，髒死啦！」

「黃河嘛，黃河怎麼能不黃呢？」大人們不屑我的驚訝。

但我對黃河的嚮往一下子完蛋了。

「黃河呀，我見過了，髒里巴几的，沒意思。」我對小朋友們說，他們對我這樣污辱「偉大的搖籃」顯然有點不滿。

童年的記憶和青年時代與長江的見面，打破了我兩次對中華民族象徵的憧憬，這失望極深地刻在放心裏，使我難忘，不斷地問它們像什麼。

長大了一點兒，可能聰明了一點兒。我發覺，人們都沒有說錯，它們的確是中華民族文化

的象徵。

源遠流長的長江、黃河，可與中華五千年歷史相並列——壯偉！

不幸的是，它們因為「源遠流長」，走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路上「泥沙俱下」在流過山岳時，能沖垮頂天巨石，立在河中妨礙行船，稍不留神就船毀人亡；經黃土高原時，又沖

在歷代專制者的統治下，中國人的腦門上猶如上了大鎖，舌頭上猶如糊了封條，頭顱變得猶如頑石，若有人要治理這頑石，簡直比治理黃河長江還要難。

刷了無數的泥土瀉入千里平原，於是河床日益增高，鬧得長江、黃河流域常年水災泛濫，人民不得安寧。好幾千年前有個「大禹」嚷嚷着治水，治到了今天還沒治完。一九七五年河南省駐馬店地區水災，共產黨爲了保護京廣鐵路和大型國營企業，「一狠心」重演國民黨時代黃河花園口炸堤慘劇，又用炸藥破了河堤，一口氣淹了十三個縣，使得無數人喪生，也省了「無家可歸」的後患。

以後幾年，長江上游又年年生事，沖鐵路淹房屋不計其數。這樣的「搖籃」，這樣的「血脈」，是不是選錯了兩個象徵？我有時懷疑……

一點沒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就是多災多難的歷史，——華夏各民族廝殺，與外藩廝殺，大漢族爭皇權內哄，因「夜郎自大，閉關自守」而受西方人「船堅砲利」的「欺侮」。帝制結束後軍閥混戰，而後又是國共兩黨亂鬥，和日本「皇軍」打完後兩黨接着打，非把一個打到海裏去，成就了一黨天下才不大動槍桿子。然而仍不罷休，還要鬥，如進行「思想領域」的鬥爭，「三反五反」加「反右」，農村「四清」加「文化大革命」，而後又一堆「打倒×××，打倒×××」，據說三十年來死了快一億人。還好，否則中國的計劃生育辦公室連一個娃娃也不讓生了。

我們中國人天生來就該倒霉嗎？您說。大陸人民的生活落後西方「五十年」中國人民的腦子被上了鎖，舌頭上糊了封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中國是世界

上可恥的法西斯專制的國家之一。現在沒有「外藩」欺辱中國了，但是中國人整天自己打自己人，自己把自己搞得一窮二白。他們拚命地排斥西方文化，他們的落後可不該說是受西方不良影響造成的了！

檢討我們中國的問題，是否要以檢討我們中國文化開始？我不知道，我不是知識份子，不敢瞎說。但您做了，我只覺着您做的好，我欽佩您的胆識。我呢，愈發覺着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遠觀去，是滾滾黃河，是滔滔大江，浩蕩廣袤，延及天涯，令人神往。但一旦深入水中，都是污泥濁水，魚龍混雜。五千年的歷史，無數的垃圾沉在江底；五千年的歷程，無數的泥沙在水中翻捲。

人們在治黃河，治長江，爲什麼不治中國的歷史文化呢？想到這些問題，我有點痛苦自己難解釋它們。我所能做的，只是出于情感的憤怒而「吶喊」一聲罷了。

我聽說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前，也是非常野蠻的，不亞於中國。由于那時的文人嚮往古希臘時代的文明和繁榮，不滿封建制度的黑暗統治，以「復興」爲口號向社會進行了變革的挑戰，由此，歐洲才開始了步向文明世界的行程。

我們東方沒有雅典的文化，尤其沒有那「民主式」的「元老院」，我們難以提出一個「復興××朝代」的口號，但我們可以清理吧？我們可以贊揚它，否定它批判它吧！有人在做，我聽說。但還是不夠，可已經遭受到些「愛國人士」的辱罵了。

在中國最難做的事，莫過於思想。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災難。

我常罵中國人是化石腦袋，但「化石」的形成是有個歷史過程的。我一點也不否認孔丘

是一個教育家，不反對他是個思想家，還有人恭維他是世俗哲學家。他在一個落後愚昧的奴隸制向著封建制演變的時代做一個教「文明」的人是可以贊許的，也不乏那個時代的「偉大」。問題是到了後來，尤其是宋代那個討厭的朱熹，把孔教訂為「天下至尊」時，孔丘的形象簡直變的窮兇極惡起來。在它的面前，妄說不得，妄動不得，真正一副頂天立地的精神枷鎖。

中國大聖孔子。



明代的人多有不軌。王陽明創「心學」，以「心明便是天理」，否定心外有理，以對抗朱程理學，無疑是對孔教的反叛。他的後人王良，據說原來不識字，是個賣鹽的。他開創「泰州學派」，其中不少人用「禪」來講解孔教，則又是對孔教的歪曲，其中的「左翼」分子李贄，居然破口大罵孔丘，還抱女人，口口聲聲說：「天下一情也。」君臣父子都丟到糞坑裏去了，離經叛道遠矣，結果與嚴嵩、達觀、何心隱一樣被關連大獄。八十多歲的李贄，被強迫向孔丘「認錯賠禮」，誰知老頭是不懼死的，他用刮鬍刀抹了脖子，落了個死不認罪的頑固下場。

孔丘這時的嘴臉很不好看，活像個閻王，

誰碰他一下，馬上抓你到地獄去油炸一番，人們最好是不說不動，時間久矣，怎麼不變成石頭？而且還不是純質的石頭，上面必須有古老孔教的「教導」花紋樣的刻劃在上面，這樣做人才做的可靠、規矩，不易生錯，于是成了化石樣兒的東西了。

孔教在中國的繁衍和「深入民心」，除了孟子的積極繼續發展，董仲舒大張旗鼓宣傳，朱熹和二程兄弟熱心以外，還有歷代百姓出于孝心的「扶持」。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句話是中國人人口皆碑並深信不疑的，但中國這個沒有宗教的國家，（做為「舶來品」的洋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都十分立不住腳），但在靈魂上沒有一個依靠似乎是活不下去的（這是人的一個不幸），大概孔教就利用這個空隙，成了中國的「國教」了。也許有人會說，二千年前的聰明人不只老孔一個，還有老聃、莊周呢。我想，中國人是很注重家庭形式的，又特別尊重父親，而歷代的皇帝們都十分狡猾地利用這一點，他們管國叫「國家」，並且自命是「民之父母」，百姓既然愛自己的家，又尊重父親，對於「大家」——國、對於「大爸爸」——皇上又怎麼能不尊重呢？在這一點上，法國人比較笨，找翻了字典，法國人稱自己的國家「是」用「NATION」起于二七〇〇年，有民族和故鄉的意思，二是用「PAYS」起于十世紀，意思是同鄉和本地，總之沒有把全國人當成一家子，有骨肉之情的血親關係，這就難怪他們不像中國人那樣熱衷于歌唱愛國主義了。

不管怎麼樣，君主是「爹」，國又是「家」了，大家就該聽家裏的，聽爹的話了。而孔丘呢，他替有一群未經教化的「兒女們」的大家長——皇上，設計了一套管理教育方案，明

文規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就其位，不得僭越。我不能不承認孔丘的這一舉動是有他那個時代的文明價值的，對社會有一定的穩定作用，也難怪皇上歡喜有了一套管理「兒女」的方法。只是可恨，後來的皇上們太懶了，不肯時常修訂，增補這套方法，只是一個勁地沿用，當然，這很可能是皇上的「自尊心」在作怪，有了地位讓人奪去是丟臉有了權力讓人分一半是丟臉，天下所有的父親看見自己的兒女們反對自己都十分不受用，「大爸爸」自然也是。（其實他根本不必難過，因為他根本不是「民之父母」，只是「自以為是」而已，完全是心理上鬧了個誤會，他只要想「你們都是我兒子」，就會心境坦然。）

孔教，——封建專制的思想基石在中國就這麼站住了嗎？

可惜，這塊基石上建立起的大廈，不富麗，也不堂皇。它是一座「兇宅」，它層出不窮地上演同樣的悲劇——那些反抗封建專制、懷疑封建專制的鬥士們和改革者們一批一批地上了「斷頭台」，那些權力薰心的野心家出于對「大爸爸」寶座的渴望，驅趕着千百萬無辜為他們去流血，「大爸爸」為了維護尊嚴，又役使人民用生命消滅「叛逆」。

殺人呀！死人呀，為了反對這個封建專制制度，也為了保護這個封建專制制度。

二十世紀後半葉，好多國家一下子文明起來了，不那麼愛鬥了，愛好和平起來了，生活也富過了以往任何時代，這是沾了權力分散的好處。

我們中國自推翻了帝制後，也弄出好些黨來，各立山頭，因此也有了自由的曙光。

不幸，兩個大黨的頭都是從朽儒辦的「私塾」裏教育出來的，又是滿腦子帝王思想，專

中國人民推翻滿清帝制後，群黨競出，但不幸的是，兩個大黨的頭，猶如從昔日帝王龍袍下的屁股間脫穎而出的「聖嬰」，搖身一變，相繼成了換了牌子的「共和國皇帝」。

制獨裁的人物，說句拍馬屁的話，——「打着共和招牌來篡皇叔的大野心家」。這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造就出來的地地道道的中國式「聖嬰」，他們骨子裏一點也不辜負五千年封建文化對他們的培養。其中有個毛澤東特別沒良心，他在政治制度上百分之二百地接受封建制，而又亂罵其思想始祖孔丘，有點過份了。然而他也最具有奪權的本領，他先把敵對的國民黨和反對派趕出中國大陸，而後又一吃掉那些小黨——民主黨派們，讓他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誰不服，就給你扣一頂右派帽子打入冷囚，這股皇帝氣派，在他三十年代寫的那首「沁園春·雪」中表露無遺，抽空讀一讀，讓人敬畏的倒抽三口冷氣。

毛澤東是一位比較聰明的皇帝，他知道世界上都鬧着「共和」，所以不能落伍，也掛上了共和招牌。各國又紛紛利用新潮思想代替封建思想，毛澤東也不能低人一等，他用馬列主義代替「孔教」。因此，從外殼上看，誰也不能說中國不是個新派國家，正是當了婊子又立了牌坊。

但是，「共和國的國民」並沒有「共和」的思想水平。「共和國」一詞出于古代拉丁語，意思是「公用的」，法國的莫哈斯說：「共和國的政府或是由多政黨組成，或者什麼都不是。」這些，有幾個中國公民懂得呢？他們不會像一個法國人那樣，一旦個人權力受到執政

黨拒絕時，時常引用這句法國民諺：「喂！我生活在一個共和國裏。」以警告執政者權力是大家的。所以，中國公民，他們眼見着毛澤東坐在帝位上亂舞權杖，誅殺思想異己而無動于衷，並聽從毛的驅使在「共和國」二、三十年期間，消除那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專制的人，我不得不承認，我眼見過的中國人民在深受毛澤東專制壓制的同時，又在做着毛澤東殺人的幫兇！



張諄女士全家

在西方共和國裏如果一個總統想搞一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成功嗎？——全民性的、全國性的？我看不能。自由思想的泛濫，集結不起來這樣大的陣容！

毛澤東是封建思想培養出來的「換牌子皇帝」，中國人可以讓毛澤東高據帝位行惡至死。也因為中國人民是封建思想薰陶出來的一代新奴隸。要不中國人怎麼會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類混帳歌曲？

我是從解放軍大院裏混大的，在大院裏，時常看到滿處貼着這樣的口號：

「生為毛主席生，死為毛主席死。」

「毛主席指到那裏，我們就打到那裏。」

這種精神那裏是「人民解放軍」呀，是徹頭徹尾的御林軍精神，——「皇家衛隊」。在「千首歌、萬首歌，戰士最愛唱毛主席語錄歌」的歌聲中，有位戰士把毛澤東像章別進胸前的肌肉裏，瘋了？

一九七八年，我去河北懷安縣城看一位朋友，兩人沒事到街上逛，遠遠地，我就看見許多農民擺的小攤上，在大白天亮着紅紅綠綠的小蠟燭。

「怎麼回事，是不是供佛，這年頭，他們可敢？」

我上前一看，不由笑了。

每一個小攤上，都有個小佛盒，用紅布自己做的，還垂着紅線頭捻的流蘇穗，當中擺了一個白塑料制的毛澤東半身像，讓太陽風沙搞的髒乎乎的，燭光在像前一閃一閃，擠在花生、瓜子和廉價的紙包水果糖中間沉思着。

「他們真反動，把毛主席當佛爺供着。」我有點看不順眼，喊了半輩子「萬歲」，多少有點對毛澤東的「戀情」。

朋友吐吐舌頭。
其實農民一點也沒錯，毛澤東正歡心這樣做。

我小時候，因為一懂事就常聽「毛主席」這個稱呼，家裏客廳正中間總掛着一張「毛主席像」。六歲時，媽媽教我寫字，第一句話就教我寫「毛主席萬歲」，而後才教我寫自己的名字。這一切，都讓我毛澤東從精神上上升華到一個「天經地義」的，超越一切的「神仙」地位。鬧到後來，別人問我最愛誰，我不加思索的回答：

「我最愛毛主席，共產黨，然後我愛我的爸爸媽媽。」

並沒有人教我，強迫我這樣說，但我脫口而出，而且理直氣壯。因為我愛爸爸媽媽，而爸爸媽媽都愛毛主席，當然我要先愛他了。

有一次我問媽媽：

「毛主席也是人嗎？」

「當然囉。」

「那人都會死，毛主席也會死嗎？」

「是人都得死。」

我聽了心裏一沉，又問，

「毛主席死了地球還轉嗎？」

「轉。」

「那咱們還能活嗎？」

媽媽不再回答我了。

但我好久心情壓抑，「毛主席是紅太陽，是大救星，沒有他我們怎麼活呢？他死了我們

如果說一個民族性的形成有着社會的因素，那麼一個社會的形成也必有其歷史文化的因素。因此，要解釋今日中國之所以仍是一個專制制度，就有必要在中國歷史文化上追尋根源。

幹什麼呢？我們怎麼走路呢？他是我們的帶路人呀！」十二、三歲的我相信我在文章裏和歌裏學來的詞兒都是真的。

「這輩子能讓我見一次毛主席，我死都願意。」我和小朋友說，這是真的，六歲時，媽媽把飯鍋中烤糊的鍋巴給我吃，實為怕浪費，嘴上却說：

「你吃了它，今晚上做夢可以看見毛主席。」

我頂討厭吃鍋巴，又黑又苦，可一聽能見毛主席，三口兩口就吃了，而後也不跑出去玩，洗洗就爬上床，規規矩矩睡好，數着「一、二、三、四」強迫自己快睡覺，夢中與偉大領袖毛主席見面……

結果，我什麼也沒見着，起床抓着媽媽哭鬧了一回。

十歲那年，爸爸帶我參加「國慶節」天安門廣場的焰火晚會，我帶着一個「通行證」，在戒備森嚴的廣場上直奔天安門城樓下，我瞪大了眼睛往上看呀，不敢眨一下，終于，朦朧的桔黃色燈光中，一個穿着灰色服裝的高大的身形出現。

「毛主席萬歲！」整個廣場沸騰了，那熱情，把人的全部血液擠到大腦裏，身上一陣發冷，雞皮疙瘩都出來了。

我點起脚尖，一根手指咬在嘴裏，一動不動地透過大人後背往上看，像每一次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電影一樣，我的大眼睛充滿淚

水，——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以為。
「爲了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刀山敢上，火海敢下。」

「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堅決打倒誰。」
我做爲××小學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在大會上發言，真誠而激昂。那時我才十一歲。

可惜我太小，是個「紅小兵」，我要是一個六六年的「紅衛兵」，我相信別說是一個劉少奇，就是十個八個劉少奇也早讓我把他的頭擄下來當球踢了，我當時能做的，只是「好人好事」，還不夠參加鬥爭的資格。我向媽媽要錢給學校買東西，下學我給公共廁所打掃衛生，學校組織掏大糞，有勺子我不肯用，伸出兩隻手去抓，惡臭難聞，但我覺着只有這樣做我距離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才更近，對毛主席才最忠！

一個小學生，那兒來的這種心態，——迷信、愚昧，喪失了自我。——是時代的社會文化的熏陶，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兒童，美國兒童不會這樣，連東歐國家也不至于。我們都是「忠君」祖先的孝順後代呢？

如果說一個人的思想的形成有着社會的因素，那麼一個社會的形成也必有其歷史的因素。中國社會，——從制度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該向中國的歷史文化追尋那些根源呢？中國的文化傳統對中國目前的政治專制狀況應負多少責任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太難了。您的書中似乎談過了，找空我再看看。

你們台灣有首歌，叫「龍的傳人」，唱來唱去就是說當中國人最光榮，因爲「祖宗」是「一條龍」。它挺紅，國民黨和共產黨老不統一，唯在唱這首歌上意見一致了，海內外中國

中國人真不愧為「龍的傳人」，個個自稱為「龍子龍孫」，「龍子龍孫」當然應該繼承「龍祖龍宗」的權位，於是，人人都想領導點什麼，千方百計欲獨攬天下之大權，更何況權力「萬能」。

人都能哼哼兩句。

前不久我聽說海外某小名人覺着大陸搞經濟改革方法不對，放言要回中國「領着他們幹」。我聽說了，就把這消息寫在了信上通知國內的朋友準備「接迎」。誰料國內的來信上寫了這麼一句。

「中國人真不愧為『龍的傳人』，個個都是龍種，人人都想領導點什麼。」

我樂了，心想這個人倒不笨。

「將門出虎子」，「帝王國家」也不乏帝王之才。

在中國這個五千年歷史的封建集權國家，這個「無神論」的國家，什麼是中國人精神的「主宰」呢？自然不是上帝，不是釋迦、不是如來，更不是法律，而是權力！

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裡有一段著名的詛咒金錢可以混淆黑白，惡善倒置，讓醜老太婆變成美女，讓謊言成爲真理的自由，但它只特別適合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金錢只能排行老三，權力遠高于它之上。

中央領導可以玩美女——不花錢的玩；要人的子弟可以一火車的枉法走私，不用買通公安局，買通法院；高級幹部花國家的錢大造私宅。我講過一個軍級幹部的家，三口人十二個房間，家中的五套大沙發和地毯是國家的不算，連電冰箱也是用國家的，外加一輛臥車、一輛越野車，沒辦法，方圓幾百公里都是他的天下嘛，難怪了。

權力既然可以給人帶來這麼多的「幸福」，人們追逐它、崇拜它又何足爲奇呢？中央領導不過月薪二百來塊吧，外加獎金不足一百，然而他們享受的，比腰纏萬貫的資本家要適意的多，不用掏自己的腰包，——國庫墊錢！來得多麼痛快！

我好像話說得有點矛盾了，因爲我前面老說孔教孔教的，就是說中國人注重家庭形式，特別尊重父親，就是說中國人需要「國家」和「皇帝」，而且我一再說過去的皇帝們利用「孔教」來教管「兒女們」，所以在「皇帝」面前，孔教，——不是宗教，該叫它「政教」才合適，只不過權力和金錢之間的「老二」而已，有權的皇上是可以隨意改變其「政教」的，否則毛澤東一做了「神仙皇帝」，竟如何可以毫無顧忌地「打倒孔老二」，用洋人的「馬列主義」替代了二千年的「孔教」呢？要在西方的民主宗教國家，那個元首如果說「咱們今個不信耶穌了，大伙們快去把教堂都砸了，明天改信撒旦了，因爲聽說撒旦能讓汽油降價，讓大人家都有工作，還增加工資。」試想，教民們非得讓地球倒轉不可。

中國不，中國人沒有宗教思想的追求，所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往天安門城樓上一站，大手一擺，以救世主的口氣一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一秒鐘過後，中國人不管願意不願意的，懂馬列主義不懂馬列主義的，就一塊兒不吭聲地改信馬列主義了。

馬列主義，——這個新政教，從三十年前到今天，有幾個中國人看過原文的著作，敢說自己懂？不過是聽共產黨宣傳它可以讓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沒有剝削而已。說實在，人類在頂複雜頂神秘的意識形態追求和信仰上，居然可以在一天之內「統一」一個國家的人，起碼是在形式上的統一，真是對人類心靈的大侮辱、大踐踏。但這只發生在屠殺「異教徒」的中國，因爲蘇聯，在信仰共產主義同時，允許東正教徒存在，中國法律上允許，可人們不敢，文革十年中有多少教徒受害？在中國監獄裏，有多少教徒被囚？有案可稽，去查吧！

從孔式「政教」到毛式「政教」的輕易而又巨大的演變，說明中國是一個權力高于一切的國家；從老百姓無怨言地放棄「孔教」而接受「毛式馬列教」，又怎能不說明中國老百姓信權力勝于信「教」呢？

我就想，毛澤東當年打倒劉少奇，全國人民積極響應，起而攻之，假如毛澤東當年說「打倒馬克思、列寧」的話又會怎麼樣？沒錯，全國人民又會熱烈響應毛主席的戰鬥號令，把二老從地獄拉出來揪鬥一回。毛澤東是當朝皇上，是同志們的「親爹」。可能有些讀書人出于小聰明有些不滿，可你敢說出來嗎？「廣大革命群眾」是不答應的，非剝你一層皮直至見血不可，不開玩笑。

前兩天看「爭鳴」，有篇文章感嘆毛澤東把中國人的「孝道」糟踏得不成樣子，文化大革命儘鬧些「兒子打老子」的亂子，其實，他沒看到，毛澤東是很會用「孝道」的，只是與旁人相比不同，他把楊貴妃的「萬般寵愛在一身」化做「萬般孝道在一身」了，技術大有提高。我只可惜毛澤東沒有真正破了那個無原則的誰鬍子長、頭髮白、「資格老」、輩份大就

「孝」誰的「道」，否則他將是中國第一個施行民主政治的領袖，多麼好的「垂青千古」的機會讓他錯過了，落了個「暴君」的萬古遺臭，值得嗎？

現在的大陸「向錢看」，誰發財誰光榮，金錢的力量是否可以衝擊一下權力的絕對權威地位呢？

不行。

看過「紅樓夢」的總不會忘記第四回裏有一句概括賈家財勢之大的話：「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結果呢？有一天皇上生氣了，罷了賈政的官，又派了官軍抄家，偌大的家財傾刻間化為烟雲，擺不盡威福呼喇喇的場將下來。

不行，非把權力從「皇帝」手裏，從「皇黨」手裏搶上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七分、五分、六分之一不可，要不然你有命難保，有財難保！「工人階級不是領導階級」，「一切權力不屬於農會」，「一切權力不屬於蘇維埃」，一切權力屬於咱們所有的兩條腿或者瘸了一條腿、斷了兩條腿的人！

奪權吧，別都奪，每個人像掰麵包似地從中國共產黨的集權上掰下一塊，小心他們那天一藏起來我們就餓死啦！

噢，我寫信要小心點了，我覺着我有一「反革命煽動罪」的嫌疑……幸好海光先生您在天堂，留神替我保密一下，否則我性命難保。

在「一黨專制」這塊沃土上，封建時代的

現在大陸人民「向錢看」了，但別忘了也要「向權看」，因為你若沒有權，錢就難保住。人人都應該聯合起來奪自己的一份權，否則就會縱容野心家獨攬大權，反過來壓迫人。但同時，你切勿因此欲貪所有之權，否則人們仍會向你奪。

達官貴族換上了「黨和政府、軍隊的高級幹部」的面目堂堂皇皇地出現了。這些「新貴族」的特權階層，以「革命功勳」自居，凌駕于人民之上，他們怎樣享受他們的地位呢？

舉一個小例：中國人的平均住房面積，就北京而言，是一點三平方米，——跟個棺材差不多。而且常常是一家三代老少男女擠在一間房中，而房租呢？每間房租要五塊錢左右。

而國家規定軍隊高級幹部，也就是高薪幹部，每家使用五、六或者更多的房間，其中客廳、飯廳、廚房、衛生間、走廊免交房租，美其名曰：「為首長辦公服務」，只交臥室幾間的租金，如四間臥室以每間二至三塊錢來收，不過十塊而已，當然，臥室多要多交了。

在西方，掙的多的住房好，那是他花大錢買下租下的，在中國，愈沒錢房租相對愈貴，愈有錢房租愈賤，到了中央那一級，四處的行宮別墅，直到了免費白住的程度，更加得意了。

北京某副政委，夫婦倆是「萬里長征」的老幹部，吃過太多苦，所以特別懂得節約。他們家養了些兔子，老夫婦為了解決飼料問題，又不失「餐苦樸素」的革命傳統，決定每天早晨四、五點起床，乘國家免費配的那輛「紅旗」牌高級轎車，——耗油量幾乎是世界第一，出去沿着大街小巷，尾隨農民進城送菜的大馬車，檢掉下來的白菜梆子，這樣既達到了清晨散步的目的，又不花錢為小白兔們找到了可口的



海碧天藍，白雲悠悠，張諱女士靜坐海邊，似在凝望，似在沉思。

飯菜，只是忘了，「紅旗」車的那張吞油的「虎口」，但老紅軍的「節約」精神仍傳為美談。

三年前，朱德有一個孫子被槍斃了，因為玩女人。一聽這消息，我就不舒服。他不就是前幾年我在北戴河看見過的那個小海軍嗎？還有他哥哥。問題就在他哥哥身上。他哥哥比他早一年被公安局抓走，為什麼呢？因為他誘姦、強姦、通姦九十八個女人。結果呢，沒判刑沒勞教更沒槍斃，仍然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只是把他從北京某軍隊機關送到青海某軍隊機關繼續當官去了，現在，我想他又會回北京了。當年他奶奶康克清處于「嚴肅打擊刑事犯罪」的政治氣氛中，小孫子是全國大流氓，一忍痛

年輕的第三梯隊固然與老一代不一樣，「天下沒有兩個一樣的蜘蛛」，但不一樣並不一定意味着中國政治有了希望。唯勸第三梯隊諸公子，不要再做權力的奴隸，而應學勇敢的卡洛斯，把自己從「龍種」的神話權位下解放出來。

「轅門斬子」，為黨和政府立了功，現在大孫子還不該回來安慰一番？小孫子真笨，為什麼不早一點和哥哥一起玩被抓？偏偏趕在「嚴重打擊」的節骨眼上了，否則也和哥哥一塊去青海，一塊回北京了，小命是無論如何也不會丟的。我也覺得這是個時間上的誤會。

權力這個「無冕王」會不會在中國動搖？難！

第三梯隊上來了，都是年輕的，好多人對他們抱希望，用「進化論」的樂觀心理以為年輕的總比年老的強。

我呢？我認識一個人，我還小的時候就聽他說：

「找朋友呀，要麼就找有錢的，要麼就找屁股後面冒烟的。」

「屁股後面冒烟？」我不懂，追問了一句

「這你都不懂？嘿，就是有汽車唄。」他很看不起我。

在中國有汽車的人當然都是大官了。

他命不錯，情場上一殺二殺，終於殺進一個副總理家，當了「乘車快婿。」如今還不如王兆國、李鵬他們混得好，但也是「第三梯隊」的預備隊員了。

這些共產黨封建世襲式的「繼承人們」，這些集權制度下幸運的寵兒們，你們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地得到了權力，上升為特權階層一份子，開始體會了前呼後應，揮之去，招之來的

「官宦」生活，嘗到權力帶來的富貴榮華，你們會再放棄嗎？

馬列主義，從來沒有在中國進口過，而且，馬列主義的種種理想一個也沒在中國實現，而馬列主義的敵人，——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則越來越接近共產主義夢想中的生活水平。所以，我相信第三梯隊的諸君們在「特權」的綠蔭下加深了對西方世界物質、精神生活的認識、了解，他們在內心深處深深嚮往于西方的發達和繁華，他們根本不相信馬列主義了，我再說一遍，他們不懂，也不信馬列了，他們的感官不可抗御地攝下了西方世界的「美妙鏡頭」。

但是，他們要向西方「進口」什麼東西嗎？進口科學、技術、機器、進口外資，也進口連法國人也望而生畏的「卡赫且」的高級時裝表演隊。可是，你記着，他們絕不會「進口」！「進口」什麼？——「進口」西方的民主選舉，「進口」法制和人權！

「進口」民主選舉，萬一他們被選擇了怎麼辦？

「進口」法制，他們當中誰犯了罪是否也要演一場「水門事件」尼克松下台？

「進口」人權，再有個魏京生給外國總統寫信大家抓他還是不抓他？

這不是給自己憑空樹敵，沒事找麻煩嗎？

他們不同于老一代的共產黨，老共產黨們其中不乏對馬列主義懷着教徒一般的虔誠和信

仰，他們在做壞事時一直以爲自己在行世界上大善事，在「普渡衆生」進入共產主義樂園呢，我對他們不得不懷有一種悲哀的尊重。

而年輕的呢，則很有可能墜爲「既得利益主義者」。駐華的蘇聯三等秘書，——一個年輕人說：「我熱愛蘇維埃，因爲我父母過去很窮，蘇維埃讓我上大學，做了外交官，我現在的一切幸福是黨給的」。這個小混蛋竟忘了西伯利亞集中營，忘了在爐邊吃土豆白鹽的蘇聯老百姓。我們的第三梯隊諸公子，與這位蘇聯外交官有同樣的背景，不乏可能走同一條路的。他們沒有信仰，也沒有懷疑，他們像「兒皇帝」那樣被人「選中」上了「龍庭」，這群走運的、受賞識的小官僚們憑着他們領會上司意思快、聽話、規矩才提拔起來，又有仗老子官大的人，他們不會爲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鬥過一天，是靠當別人的政治機器上的台，這種沒政治理想的人最易墜入爲權而從政的臭水溝裏。

也許，他們現在還不是，還不知道，或者不承認，然而這起碼是一個難以避免的事實，或者只有他們夜裏與良心自白時才可以發現，可以臉紅，——他們是精神的「貧血兒」。

權力這個東西，對人來說，用的久了，只能讓人變得和豬一樣愚蠢，愈大的權力愈像豬

我認識一個中國監獄女獄卒，她是共產黨員，女牢的頭目、政治管教員，負擔罵女犯人的全部責任。

「你們聽着，你們犯了罪，黨和政府還給你們飯吃，你們要感謝黨和政府，好好改造你們的資產階級臭思想，別那麼臭不要臉，在監獄裏亂說亂笑，你們還有臉笑嗎？犯了罪還敢笑嗎？你們這些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是社會渣滓，流裏流氣，什麼樣子，撒泡尿照照你們

的臉，照照妳們的思想，噁心不噁心？骯髒不骯髒？一個比一個不要臉，沒有一個好東西！」

因為星期六晚上牢房發撲克，犯人們借打牌忘記哀愁，一個個地笑出聲，我叫它「每週一笑」，結果犯了一「監規」：「在監號裏不許哭，不許笑」。所以招來女獄卒一頓劈頭蓋臉的臭罵。

我聽了這番罵真有暈頭轉向，摸不到東西南北的感覺。

說他語無倫次是抬舉她，說她胡說八道、滿嘴放屁才是正經。因為兩聲笑，禁止便罷，何必這麼不愛面子濫放污穢之詞呢？簡直像個神經病、瘋子、歇斯底裏併發症。

我琢磨了一會，覺得這都是她的「管教隊長」的權力把她糟踏成了這付狗樣。在家對她的丈夫孩子，親戚朋友因為地位大致平等，恐怕不會太放肆，唯在人之最賤的犯人面前，她才夠得上算一個領導，有教管的權力，而且是絕對的，因此才把她寵得不加思索，信口開河的胡說亂道，連自己做人的尊重也不顧了，像母狗似地狂吠起來，我有點可憐她……她真以為犯人沒有說話和反對她的權力，也沒有內心輕蔑她的權力嗎？

第三梯隊一旦掌握了權力，會不會被發號施令的「快樂」沖昏頭腦，會不會被輿論界專拍馬屁的下流文人吹迷了向，分不清自己是鬼是人，重新把自己放到「至高無上」，「絕對

當人們對現實不滿時，總是期望「好領袖」的出現，然而新出現的領袖，偏偏又不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好，甚至有時新領袖變得特別壞。在這種情形下，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可以通過民主選舉和法治來更換領袖，然而中國人則只有期望而已。

正確」的位置上，向他們的上一輩那樣死把着權力不放？這真可怕，這群沒信仰的，搞起純粹的權力之爭，老百姓又該遭殃了。

進第三梯隊一言：西班牙王子卡洛斯是你們的榜樣！當年弗朗哥僭了西班牙國王的位，行了幾十年法西斯專制，他死後讓位西班牙王子，不料這位被弗朗哥撫養大的王子，竟一點不受弗朗哥的法西斯式的影響，一登位就把權力交給了西班牙人民，讓西班牙人民選舉自己的政府，傾刻間西班牙進入世界民主潮流。西班牙王子沒有因失去了自己的絕對權力死去，或者掉幾斤肉，他的國家平定了、進步了，西班牙人和全世界的人更尊重他了。

你們呢？你們有這種勇氣嗎？你們已不信仰共產主義，你們又害怕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把鄧小平御賜的寶座掀翻，可憐的你們，做了權力的主人，又做了權力的奴隸，在民主與專制的路口徘徊。你們，從權力下面解放出來，做個自由人吧！爭權難，保權更難，小心白了少年頭，為什麼你們不太相信人民比你們更聰明，他們會自己選擇可能為他們帶來福氣的領袖，他們也可以更換不稱職的領袖，你們究竟憑什麼非領導他們不可？也可能是鄧小平強迫的，但你們掌權了，聰明的就把權力還給人民，不聰明的，你就等着捱罵吧，反正我活一天罵你們一天。

我們不是龍的傳人，你們也不是「龍種」

，記着，不是「龍種」！

喔，海光先生，我寫得熱鬧了就把您忘了，我剛才又把「第三梯隊」數落了一陣子，您聽着可能費事，因為您離開地球十幾年了，我們這兒天翻地覆又鬧出許多花樣來，對您不免太陌生，沒關係，慢慢您就習慣了，什麼都是一回生二回熟嘛。

我剛才咒了半天「皇帝夢」，現在想想，又覺着自己無力得很，就像我一個自以為自己是一個信仰人道主義的人，但每當在電視裏看見南非白人野蠻壓迫黑人，看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看到共產黨以思想鬥爭殘害異己的節目時，我就恨得咬牙切齒，一個人在家對着螢光屏亂罵！

「殺了他們！混蛋！王八蛋！打死他們！」

這種時候，我心底總有一股悲哀，——為了人道主義，也為自己。人道主義在面對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時，它顯得太蒼白無力，我的人道主義理想呢也顯得動搖了……

人在宣揚一種東西和反對一種東西時，只要你觸及到它，就要受到反彈，好像打球，你把飛來的球打回去了，你的手也要疼一下子……

我不讓人做「皇帝」，可是人民離不開「救世主」降臨的希望，于是我被諷刺了。

一九七八年的深秋，天安門廣場的東側一個建築工地的矮牆外，貼出了許多大字報，否定文化大革命，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明暗是這些大字報的內容，後來因有妨「革命聖地」的市容，這個新生的「民主牆」才轉移到了西單。大字報的內容也豐富了，人們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毛澤東這個暴君為什麼出現，提出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懷疑。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記不清是一個加拿大

還是美國記者來到民主牆，向圍在那裏的熱心中國民主和改革的青年們說，鄧小平接見了他，鄧小平說要為劉少奇和彭真平反等等。

早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不滿的青年們，一聽就知道中央和鄧小平要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揭開這個十幾年壓在人們頭上的磐石了。

「萬歲，萬歲！」他們高興地喊着，我也喊了。

沒有人組織，人們排起大隊，幾乎把整個長安街擠滿了，我們這些學藝術的學生，可能特別喜歡出風頭，都擠在第一排，好像自己是「五四」時代的大學生。

上千人的大隊從西單向天安門廣場湧去，我們喊：

「堅決支持鄧小平，堅決和黨中央站在一起。」

「劉少奇萬歲！歡迎彭真重新擔任北京市市長。」

這些西單民主牆最早期的「民主派」們，沉醉在不再喊毛澤東萬歲的快樂中，沉醉在否定毛澤東的舊王朝，迎接鄧小平新王朝的「改朝換代」的快樂裏。我呢？當時也不例外，二十歲的大學生，只喜歡熱鬧、革命，至于什麼性質的熱鬧和革命我還不懂得去想。

回憶起來，像東歐人民歡迎為他們消滅納粹的蘇聯紅軍時一樣，他們在狂熱中送走了瘟神又迎來了魔鬼，像毛澤東大軍挺入北平時一樣，中國人民結束了戰亂的恐怖又迎來了精神「麻瘋病」，更像一九七五年美國撤軍柬埔寨，金邊的人民用感激的淚水和花環迎來了吃人的紅色高棉，當年「西單民主牆」的民主派們，有不少的人把中國的未來放在了鄧小平的身上，他們沒想到，權杖一到了鄧小平的手裏，這塊先于「人民日報」，第一個表示公開支

鄧小平借用民主運動的力量重新掌權後，反過來又壓制了民主運動。



持他，為毛澤東排斥他鳴不平的「自由論壇」，就成了威脅他和他的黨的「危險地區」。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直接提出徹底改變中國社會制度，請共產黨放權的要求，然而，這超越了歡迎「改朝換代」，所以，「西單民主牆」的利用價值到此為止了，鄧小平在中央宣佈「抓其中的壞人」。于是「民主牆」流產了。青年民主派們做了他們「推選」出來的領袖的「階下囚」，被他們心目中的領袖玩弄了、拋棄了。

國家既然有政府，自然離不了領袖，所以對「英明領袖」的出現，不止是中國人的渴望，也是全世界人的渴望，現代人同遠古的人一樣，對現實總是不滿的，只是用對好領袖的希望替代了對神的希望而已。

法國人，目前對密特朗政權十分不滿，似乎法國的經濟蕭條全因密特朗的政策不佳釀成，所以他們像幾年前咒詛法國右派把國家搞窮一樣，在大選中把右派攆下台，滿懷希望地把

滿口宏圖大志的社會黨領袖密特朗捧進愛麗舍宮，使他成了「法蘭西的未來和希望」。如今又在咒詛社會黨的無能，咒詛密特朗把國家搞糟，希望又開始轉移到右派身上。

「下次你選誰當總統？」我問了好幾個當年反對右派的人，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出當前最勁的右派領袖「希拉克」。

我想，在英國、美國、德國、日本也不乏這種可悲的現象，除非進入了無政府的美妙境界，人們就不得不像妓女那樣爲了過好日子而一天給自己換一個男人，必須找一個領導自己的人，而且是「打賭式」的、「冒險式」的，不注意就選了一個禍國殃民的蠢種。

當然，這是從「絕對觀念」來看，如果從「相對論」這個混淆是非的「和稀泥」的觀念來看，西方還是比東方的集權國家強。雖然離不了找一個人站在頭頂上壓迫自己，有着種種社會弊病，如似：停車罰了款，你即時寄錢就加倍罰，也不問究竟是你沒往機器裡放錢還是你放了而機器壞了。叫你賦稅也不管你有錢沒錢，家裏遭了什麼橫禍，否則叫你上法庭。我眼見一個法國工人流着淚大喊，「我有三個孩子一個老婆，我付不起稅，你們罰吧，你們把我最後的錢拿走吧，我養不起我的孩子我就在稅局放一個炸彈！」

我看着這個穿破工作服的工人難過極了，他沒有真正的困難不會這麼激動的。

我一個朋友，因爲忙，晚了一天付稅，結果罰款一千塊，事後稅局發現多征了他三千塊錢的稅（由于統計錯誤），來信說退還。

我說：

「你給他們寫信，說某月某日之前退還，否則誤期罰款一千。」

他說：「你瘋了，這是國家，我們能罰他

們？」

三個月後，這款才姍姍來到，要是也罰款，恐怕可以罰好幾萬了吧？這就是人民選舉的政府！能說他公平嗎？

但是，西方人可以把這些事情記在心裏，等到時機一到，蜂擁而起，把你轟下去，換一個新的。當然，西方換了許多的政府，仍不能解決社會的各種問題，世界仍是不那麼理想、美好，有無數哀愁和不满，還有人去自殺，以為世界太骯髒容不下自己清白之身，這，又當別論了。

不像集權國家，政府好像是監獄裏發的一塊窩窩頭似的，愛吃不愛吃就是這麼一塊，餓死活該，絕沒有換一塊奶油蛋糕讓你吃着可口的盼頭。

可人人都願吃下能治萬種病的「民主麵包」，不要吃專噎噁子眼的「集權窩頭」，傻瓜也明白這種選擇。

海光先生，有個事呀，您在天上住久了，可能不知道。您在地上住的時候，大陸還與全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劃清界綫，不要人家的臭思想也不要人家的臭錢，經濟困難時期、災荒年裏、大水災、大地震餓殍遍地的時候也不要一分臭錢，硬梆梆地自力更生。現在的鄧小平呢，比毛澤東開通了一點，「不管白貓黑貓，抓着錢就是好貓」，所以他在不要臭思想前提下，開始要臭錢了，走台灣外資致富的道路，拼命向外國「臭資本家們」借臭錢了。

中國要借「洋錢」來建國，但更要借洋政治、洋思想，否則，一個公有制的國家，一旦靠洋錢發達起來，流進老百姓口袋裡的也不會多。洋人也應設法向中國輸出些洋政治，否則猶如救蛇不拔其毒牙，後患難防。

資本家先生們，是做錢生意的，想發大財是職業所需，當然喜歡有像大陸這樣的資源豐富、市場廣闊的地方，所以蜂擁而去，又贏利又得「愛國人士」或者「國際友人」的美譽，何樂而不為呢？

可這後面藏了一個極大的危機呢，您注意到沒有？我們從小都聽過一個老掉牙的故事，就是說從前有個農夫，在路上發現了一條凍僵了的蛇，他可憐它，就把它放進懷裏，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它。

蛇醒了，它的精力恢復了，它又有了害人的本領了，它一口就把救它的農夫咬死了。故事也完了。

我一直覺着這個故事不美滿，開始聽說農夫連蛇都肯救，我真受感動，——天下有這麼善良的人！可蛇又咬了他，說明這世上原來有些非殺不可的東西，這又讓我難過。于是我想，也許農夫犯了一個錯誤，不是因他救了蛇，救命永遠是應該的，只是他放蛇在懷裏之前，應該把蛇的毒牙拔掉了，這樣與自己安全有益，也可以讓毒蛇從良，豈不兩全？

當然，用農夫的善良來形容想去中國發財的外商太過獎了，用蛇來形容共產黨也有點污蔑的意思，所以，只當是一個故事聽聽，與本信要說的沒有必然關係。

但是，一個一切財產都國有化的共產黨國家，願意使自己的經濟發達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經濟發達後，賺了錢是屬於人民私人的，

還是屬於國家的？

蘇聯，曾在世界上名列第二十六位發達國家，該算一個富人了。可錢用到人民身上有多少呢？我有幾個朋友去過蘇聯，他們說蘇聯的商店都是空的，只有土豆一種，比中國還不如。八月裏一個躲進莫斯科法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的蘇聯工人控訴：

「爲了吃上一次肉，我們要花半個月跑來跑去到處找。」

慘呀！

這有點像中國文革期間的景象，但中國現在還是有肉賣的，雖然貴一些，不能像西方人那樣天天吃，用肉餵狗，而且肥一些，但到底是可以解饑的。

蘇聯比中國有錢，人口也少，怎麼連中國人吃的還不如呢？

這是蘇聯和世界大享——美國軍備競賽的「碩果」。

美國人有錢呀，他在世界擁有最現代化的軍事科學，也可以讓美國人生活在世界第一流的水準。蘇聯比美國本是窮人，打腫了臉充胖子從人民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中拿出一大半去玩軍事比賽。人民也說不出什麼來，財產是國家的，人民也是國家的嘛。西方人徵稅得得雖然重，還給你留下了租房子、買汽車、休假、吃肉的錢，共產黨國家表面不徵稅，發工資時不吭聲地就扣下來了，只留給你一個糊嘴的錢，年青人買塊手表都要省幾個月的工資不可。天底下還有比這來的陰險的重稅嗎？

目前在全世界倒數第二或者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的中國（弄不清準數，共產黨自己什麼都不說，聯合國統計的數字無法證實，反正是世界上的貧窮國家），開始了借洋錢發展國家經濟的大戰略，有成果的話或許也可以

像蘇聯那樣弄個第二十幾位經濟發達國家當當。讓老百姓享幸福。

只是，仍一切財產公有制嗎？仗着有錢了也搞核武器競爭嗎？也準備打「太空戰」嗎？中國現在一天到晚罵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搞軍備競賽，其實這有什麼可怪的？一個代表「社會主義陣營」，一個代表「資本主義陣營」，互相都喊出去了「消滅××××」的口號，你死我活的。一個蘇聯駐華外交官對一個西方留學生說：「我們蘇聯就是要控制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我們的軍隊去阿富汗，也是這個目的。」

聽聽，讓全世界信仰共產主義，讓全世界的商店只賣土豆，讓全世界人建設了幾十年社會主義而為了一塊肉花半個月光景去奔走？佔了人家國土了，還說是給人家帶去「福音」了，共產黨最會給自己的肛門戴大紅花。

西方人離了肉不能活，天生的「吃肉民族」，不像蘇聯人光吃土豆，中國人白菜蘿蔔，你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糟糠碗換人家的肉碗當然要和你玩命了。

我就擔心這兩點：

一、在一個公有制國家裏，如果一旦發達起來，流進老百姓口袋裡的究竟能有多少錢？

蘇聯這個社會主義陣營中頂發達的國家是我們的「警鐘」。

二、中國在貧窮的狀態下尚可用人民的血汗巨金來造原子彈，一旦國庫積蓄增長，會不會是第二個蘇聯？中國學「美蘇爭霸」多是因為它還不具備爭霸的份兒，——還沒本錢跟他們湊熱鬧，所以才做出這「窮書生的清高」，可它具備了與蘇聯同樣的政治素質，——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一人類「最高境界」。這是潛伏的危機。

我希望這不是真的，西方世界為了賺錢，為了削弱蘇聯，美國對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又用錢為自己栽培一個新的「霸王」，——消滅自己「資本」的「共產強國」。

但是，為了讓中國人生活的好，像西方人一樣吃穿好，我還是希望中國人借洋錢，我還是希望外國人「放高利貸」，同時，我還希望，中國人也向洋人借點洋政治，外國人也向中國輸出點洋思想。這樣，我們中國一旦富起來了，不致于向蘇聯那樣錢專往國庫裏跑，都變成大砲彈在空中白白的燒了，莫斯科的老百姓反而冬天沒有燃料取暖，連在蘇的外國專家也常常挨凍（我的一位朋友），而且我們中國長江以南也是沒有燃料取暖的，這種民生衣食溫飽的事兒是絕不可小視的。而是能夠像西方、日本這些民主國家一樣，用人民的選舉權限制政府不得「爭霸」，不顧人民死活去亂造飛船原子彈。至于對外嘛，西方人也可以免除可能出現的「北極熊」式的「中國龍」騰空而起，挾着「世界共產」的狂風之猛襲。十億「龍種」呀，這一殺過來可非當年騎着馬的成吉思汗可媲美，都是踩着火箭，提着原子彈來的。我好像在寫未來世界大戰的「科學幻想小說」了。這不好。

對，有些好心的善良的凡事往好處想的樂觀人士會說：

「人家共產黨一再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向第三世界整天發誓『永遠不稱霸』，如何會成爲妳擔心的那樣呢？」

我說呀，蘇聯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第一個宣佈與資本主義大家庭「和平共處」的。當時要「繼續革命」的毛澤東，還曾很不歡喜，聯合胡志明想「打」，並且向美國一口氣發了二百多次「嚴重警告」，（按常規「嚴重警告」

三次後對方無視就該打了。）雖然大家都沒打「鐵老虎」，但嚷着「和平共處」的蘇聯仗着有幾個錢還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駐軍波蘭、侵略阿富汗，大的打不動，專找小的欺侮，這算「和平共處」？別相信宣傳，別相信口號。

中國嫌越南不聽從自己這個「二哥」調遣，專跟「大哥」蘇聯要好，成了眼中釘、肉中刺，是睡在自己身邊的「定時炸彈」，於是決定「教訓」一下，才打了幾天，人民幣已損失慘重，再打老百姓就要緊褲腰帶了，還算聰明，不打了。但是，為了國際政治的需要與「同志加兄弟」反目爲仇，而且動輒想「教訓」，只苦于沒錢，今後有錢了呢？就不只是教訓的事了。中國人是特別善于「統一」思想、統一國家的，目前只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內使勁，等內部「統一」好了，有勁沒地使了，不會向外邊的世界使勁了呢？統一也是有好處的，見《爭鳴》雜誌一文寫一個家庭婦女論述「統一思想」的「好處」說：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統一步伐，還統一……」反正全都統一了，把人都統成一個人，然後統一台灣、統一美國、統一全世界，把全世界統成一成一個國家，這樣一個國家，由一個人領導起來就省事了，也不用蓋這麼多監獄……」

對共產黨來說，這個「統一」夢是實現偉大理想的先決條件，海光先生，您說是嗎？

今天我累了，先停筆，過些日子再和您聊聊，地上的事是說不盡的，您們天上那塊兒怎麼樣呢，想也不乏奇文，可寄來共欣賞嗎？

祝貴體無恙！

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夜深沉

（按：文中段落提要爲編者所加）

一張廢紙千行淚

一個起義 人員的控訴

(安徽) 屈可伸



致編者和讀者：

這篇控訴如果閱過風險，到達大洋彼岸，希望「中國之春」讓出一角園地，給以發表。更希望中國大陸的駐外使節讀過這篇控訴後，通過你們的外交專線送北京中南海，一邀鄧小平老先生和胡耀邦先生青及。如果統戰政策真的不是像大陸上的「統戰對象」所身受的那樣，和台灣當局所說的「伎倆」、「陰謀」，則請先在大陸範圍內徹底落實，不要只滿足於陳列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櫥窗裏。如果真有誠意爭取海外華人協同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福國利民的統一大業，就必須勇敢地正面宣佈永遠放棄「四個堅持」和徹底批臭毛澤東，以取信於天下。然後集海內外各黨、各界和民運、民意代表之精英於一堂，舉行「國是研討會」，制訂一份實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統一的新中國藍圖。如果只是發動一個又一個的統戰攻勢，而沒有誠實的行爲表現，不僅大陸上的「三信危機」無法消弭，台灣彼岸的一千九百萬入又有誰願踏大陸同胞的覆轍？海外有識之士又能有幾人入君彀中？

並向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致意：在這篇控訴發表後，請密切關注筆者和文內所涉及的人的命運！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於中國大陸

「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綫」是「毛始皇」賴以駕登龍庭的「三大法寶」。歷史紀錄證明，所謂「黨的建設」無非是拉幫結派，在黨內培植親信，清除異己的權力鬥爭。即中共有史以來，先後十一次極其殘酷，現在仍在繼續進行的「路線鬥爭」。所謂「武裝鬥爭」，就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

「武主義」。在「窮人翻身鬧革命」的號召下，以蠱惑加裹脅的手段，驅使千百萬誠樸、善良的中國人，為建立「毛氏紅朝」，血染黃沙！所謂「統一戰綫」，用形象比喻來說，就是蒲松林筆下的「畫皮」政治。善以狐媚多姿，巧言令色，投人所好。使「登徒子」入吾彀中，然後玩弄於股掌之中，吸精吮血，養彼「

真元」，棄他體骨。如龍雲、盧漢、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等知名人士的遭遇和下场，世人皆知，毋庸枚舉。最可憐的是我們這些隨君入彀的無名小卒，無端地血海浮沉，回頭無岸！有的早已沒頂，有的又再被「強姦」，有的仍繫階下！不幸，由於歷史的誤會，在神州大地上發生的這場空前浩劫，我們這一百多萬名不見經傳的降將敗兵，竟是首當其衝的主要受害者！天呀！為什麼這樣不公平？！

當我們倖存者又一次被作為「統戰籌碼」拋出來，「光榮」地領到第二張「起義人員證書」時，一個個怎禁得思潮滾滾，往事聯翩！有的人臉如腊塑，毫無表情。有的人欲哭還笑，靦顏承歡。有的人熱淚盈眶，強作鎮靜。有的人淚如雨下，悽然抽泣！這一張張不同的臉譜，却都是一樣心情！半世恩仇憑誰訴，滿眶熱淚和血吞！更可悲的是，這錐心刺骨，國破家亡的遺民淚，竟被解釋為「感動得流了眼淚」，表示要為「四化」建設和台灣回歸的統一大業，貢獻餘年」。受盡屈辱的靈魂，又一次被強姦了！我也無法抑制住人的本能衝動，急忙跑回「家」（只不過是我的住處，我早就沒有家了），抱住慈母的遺像，拉開棉被，蒙頭痛哭。三十六年間的往事，一幕幕映現在我的眼前。

一、「光榮」起義後， 忍辱作俘虜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我從徐蚌戰敗的俘虜營裏逃到湘桂邊境，收容前方下來的殘兵敗將，準備整補時，全國戰場的形勢急轉直下，長沙守軍「起義」了！這座曾在日寇立體進攻下三戰三捷的名城和在東北戰場上曾與林

彭交鋒的「四平大捷」的名將陳明仁，竟然在中共的統戰攻勢下不戰而屈！我們這支尚待整補的殘破部隊，回天無力，「無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噙着眼淚，「光榮」地接受了第一張「起義人員證明書」，聽候改編。在共軍駐圍軍代表的領導下，我們深入學習「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佈告」、「告起義、投誠人員書」……許許多多的文告和信誓旦旦的諾言。概括起來，就是「愛國一家既往不究，一視同仁，量才錄用」所謂的「十六字方針」和連篇保證，好話說盡。這項「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在當時雖然有不少人明知是釣餌，也不得不忍痛吞鈎！至於這項「政策」究竟能落實多少，那就不是已經放下武器的人所能過問的。如果真的言而有信，則中共中央就

不着在三十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再下達一個「中發（七七）六號文件『關於落實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通知』」。更用不着在三十六年後的今天再發第二張「起義人員證書」了！

繳械是軍人最大的恥辱，是很難被接受的。善于搞文字遊戲的毛澤東，竟玩弄「改編」這個詞來解除「起義」部隊的武裝，官兵全被編遣得七零八落。我和二十多個校、尉級人員被調往共軍第四兵團部，也沒有明確分配職務，被安排和軍政大學第四分校從江西招來的學員一起生活，原先「吃中灶」的資格，被無形取消了。「一視同仁」的政策，也開始被否定。

十二月九日，盧漢又在昆明「起義」了，陳賡的四兵團兼程西進，一九五〇年仲春時節，我又回到了昆明。我向總隊政委提出，我的眷屬在昆明，擬請幾天假回家探望父母妻兒，只蒙「恩」准八小時。「保證家庭團聚」的諾

言，原來也是一張空頭支票！瀾別經年，訴不盡離愁別恨，妻子送我返校途中，路經圓通公園——我倆定情的地方，我沉痛地感到，這圓通山上的櫻花，和我妻子特有的嬌容一樣，失去了她本來顏色！

昆明地區（包括雲南境內）的「起義」人員陸續進入「軍大」了，自准尉至中將約一千數百人，編成十二個中隊。我們隨軍西進的「起義」人員也分別編到各隊去當「學員」，全都換上共軍制服，我們互相顧盼了一下，每個人的軍帽上都沒有帽徽，胸前佩的也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而是「軍大學員」四個字。「愛國一家」的十六字方針又獲得深一層的解釋。

「開學」那天，兵團政委宋任窮（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向這一千多「學員」鄭重宣佈「對起義人員的政策」，特別強調了「十六字方針」和畢業後的出路：（1）原級留用；（2）復員轉業；（3）繼續深造」。然後是從總隊到中隊的各級幹部反覆交代「校」規、紀律、守則和活動範圍，其中有嚴禁互相竄隊一條。這許多清規戒律，和俘虜營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左襟上的俘虜編號變成了「學員」胸章。

在「認清歷史面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交代歷史、坦白罪惡」、「互相幫助」、「背靠背的檢舉揭發」，「面對面的批判鬥爭」……一步緊逼一步的精神追擊下，和「同學」突然被「調走」，下落不明的恐怖中，使人人自危！我因為交不出「殘殺人民」的「血債」和不承認「消極抗日」，而被日批夜鬥。最後，我以誇張和取笑的手法，承認了「血債」，才過了「認罪關」。

一九五一年元月，宣佈「學習結束」，除「回鄉生產」和「繼續深造」的以外，一律以

副排級（相當於國軍准尉）分配到「解放軍」第十三、十四兩個軍去當「教員」。一個姓劉的「起義」少校營長，在「軍大」多次被評為「學習積極份子」的「學員」，要求對「畢業後的第一項出路」作解釋時，總隊政委（姓周）說：「你們不要忘記『量才錄用』四個字」。劉問：「難道這七、八百人都是副排級之才？」周政委說：「你可能是大才小用了，嫌官小？那就繼續深造吧」。於是，這位「劉積極」（大家都這樣喊他），由鬥爭會上的主要「火力」變成「靶子」了。免死狗烹，活該！

二、妻子的淚浸透了

「復員轉業證」

我們到部隊後，並沒有去當「教員」，全都在軍部集中學習。同年五月開始，在「復員還鄉」的名義下，陸續被清洗下來，連同眷屬，集體遣還還鄉。我扶老捧幼，回到從八歲離開，瀾別二十三年的家鄉——安慶。投宿無門！就向安慶市「復員軍人安置辦公室」報到，聽候分配工作。眼看復、退下來的共軍官兵都很快走上了地方工作崗位，脫下戎裝換紫袍，連戰士（兵）也當上了行政二十五級的幹部，唯獨我們漫無消息！我一家老小，餓着肚皮，不得不「冒昧」陳辭，請速安置時，得到的答覆是：「你好好看一下你的復員證」。是的，我的「復員證」上比他們多四個字——起義人員。高齡父母，餓病交迫。稚齡幼兒，嗷嗷待哺！妻子用她最後的一件大衣換來的十五斤米早就吃光了！可憐她捧着昆明師範學院的畢業證書，踏破鐵鞋，也找不到一枝之借！九月間，她懷着一綫希望，報考師資訓練班，然而，

竟以優異成績，名落孫山！她滿懷悲憤，鼓足勇氣，去找教育局的黨委，答覆是：「我們仔細研究了你的問題，我親自看了你的試卷和照片，以及政審材料，憑你這才貌雙全，很想取妳。問題是妳沒有和妳那個舊軍官愛人劃清界綫，妳如有劃清界綫的決心，我還是可以取妳的。」她不能容忍那一語雙關的侮辱，厲聲呵斥說：「我的丈夫是『光榮』起義的，你這些說法簡直是無恥！」她氣衝衝回家，一頭栽進我的懷裏，放聲大哭了！一個勁兒責怪我：「你爲什麼要從徐蚌前綫跑回後方？你爲什麼不和你那些同學跑去台灣？你戰敗爲什麼不自殺？你爲什麼丟不下我？你還我血書，我用血寫的『即使你成爲國殤，我也會隨你進入忠烈祠』。你爲什麼不相信我？」一歲零七個月的孩子，抱着他媽媽的腿哭了。雖然他不知道他媽媽爲什麼哭。也不知道他自己爲什麼跟着他媽媽哭。然而，這是他出生以來真正傷心的哭！我親愛的妻子，痛心抱起傷心的孩子說：「走！這裏沒有我們的生路！」我那年近七十歲的母親哽咽着說：「走到那裏去？沒有遷移證和通行證，寸步難移！」

好心的鄰居張嫂，市人民醫院的工友，送過來幾斤米，勸慰說：「譚老師，天無絕人之路，介紹工作的能力我沒有，我給你到醫院裏想想別的辦法」。幾天後，我妻子隨着她到醫院去了一趟，回來時，買來了米和半年不知其味的肉，還有一隻老母雞。那有這許多錢買東西？她欺騙我說：「給醫院洗被褥，預借了計件工資」。此後，她每去一次，總是要買回不少的吃、用品，甚至父母和孩子的衣服。而且張嫂來通知她時，總顯得有些鬼鬼祟祟。這不能不引起我的懷疑，在我一再追問下，她氣惱而傷心地哭着說：「你沒有權利問我，我有權

用父母遺給我的東西換取生活必需品」。一聲霹靂，轟得我呆若木雞，難道她會被逼得去出賣肉體？這不可能，但除此以外，她父母給她的東西早已賣光了！我不知道我是否曾經暈倒過去，當我發覺她緊緊地摟住我，吻着我時，我猛力地推開她，拿起我的「復員轉業證」，跟踉地往外跑。她撲將上來，奪去了「復員證」，把它撕個粉碎。哭着抱住我說：「你不要再去找他們，這些東西全是廢紙，我要全都撕掉！你不要胡思亂想，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我的錢是怎樣來的！」母親又哭又急地把「起義人員證明書」收藏起來說：「撕不得，他們發的，我要看他們究竟怎樣解釋」。

我眼見妻子快速消瘦的身體和退盡顏色的臉頰，我必須打開這個疑竇。當她再一次穿上那件唯一的外出服時，我遠遠地盯住她。將近一小時後，她拖着沉重的雙腳，由住院部出來，走向醫院出納處時，突然暈倒在走道上。我搶步上去抱起她奔向急救室，她手裏還緊捏着一份三聯單。我定睛一看，不禁失聲大叫：「妳賣血！」她掙着微弱的聲音說：「這就是父母留給我唯一可以出賣的東西了！」我倆的淚，第一次交流在一起，我愧爲人夫！

三·母親的血染紅了第一張「起義人員證明書」

「走，要堅強起來！要活下去！到江蘇去找我的叔叔」，妻子強持着衰弱不堪的身體咬着牙說。又是好心人張嫂，通過她在公安派出所的姪兒，費盡心力，我們才領到了遷移證和通行證。用妻子的賣血錢作路費，投奔江蘇，在我叔岳的工會裏當了一名辦事員。妻子也由

叔叔於抗戰中掩護過的新四軍的朋友——市統戰部的陳主任的介紹，當了中學教員。叔岳祝福我們「否極泰來」。父親嘆曰：「來日方長，何言否極！」果然，「三反」、「五反」開始了，叔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罷官了。叔岳母交不出她丈夫「貪污」的黃金，被逼得倒栽黃缸自殺！天下竟有這樣的慘事？！

腥風血雨漫神州，接着是「肅反運動」。七十九歲的父親，被逼着交代早年當縣長的「反革命」歷史，和現行「反革命」活動。他無法答覆「爲什麼你把三個兒子分別送進了陸海空軍軍官學校？你是怎樣策劃準備和人民對抗到底的？」的逼供，倒斃在「居民幫助會」場上，有幸超脫了人寰浩劫！

運動進入了高潮，在一個月黑風朔之夜，我家的住房被武裝包圍了，三枝手槍對準我，宣佈說：「你被捕了」。妻子沉着地問：「第一部憲法墨迹未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人身不受侵犯』，你們憑什麼侵犯公民住宅，隨便抓人？」紅色「石壕吏」說：「我們抓反革命，你們不能算是公民」。母親指着「起義人員證明書」說：「這上面蓋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的紅印。你們說話到底算不算數？」啪啪，兩記耳光打得我白髮蒼蒼的母親口鼻淌血，手裏的「起義人員證明書」被染紅了！另一個匪徒（請原諒，我用了這個詞，因爲當時的現場行爲如此）一把奪過「起義證書」撕掉，隨即給我母親當胸一拳，母親倒下了！五歲半的孩子，被嚇得蜷伏在床底下。我被手銬加細綁帶走時，孩子跑出來抱住我的腿，哭着喊：「解放軍叔叔，不要抓走我的爸爸！」還是那個毛家土匪，反腿一脚，把孩子踢了個倒栽葱！同時罵道：「把你這個小反革命也一起拿去宰了」。我這三代人的心底創傷，是

這第二張「廢紙」能糊裱得了的嗎？

在公安看守所裏經過兩年多殘酷的預審後，忽然被叫出去。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白晝，我的妻子怎麼會在他們的辦公室裏？我難道在夢境中？她強忍住眼淚，只向我點了點頭，沒有說話。陪同她來的一個中年婦人開口了：「我是區人民法庭的審判員。我們受理了譚若雲同志的申請。她提出要和你劃清界綫，離婚。經本庭調查認定：申請人是人民教師，她有這樣的政治覺悟，黨是歡迎的，法律是應該支持的。被申請人——你，現在是在押的未決犯，我們還是依法徵詢你的意見。你同意就簽字、蓋指模。不同意就上訴於中級人民法院。」我問：「若雲，是這樣的嗎？」她低垂着頭，連連點了兩下。我看不見她的臉孔，因為全被垂髮遮住了。那婦人打開卷宗說：「這是她的親筆訴狀，你該認識。」我說：「好，我同意，但請妳和她各自答覆我一個問題：(1)問譚若雲：我母親那天倒下去後，再起來沒有？如果她老人家不幸還活着，就請她把那份血書還給妳。孩子被踢倒，受傷沒有？現在怎樣？(2)請問審判員：你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上的那條那款而認定夫婦任何一方為劃清政治立場界綫而申請離婚的理由可以成立？既然貴庭調查認定我『現在是在押的未決犯』，那又依據什麼判定我和她的政治立場是敵對的？」若雲答：「祖孫兩人無恙，我三人今後永遠相依為命。血書仍鮮紅如舊」。看守所的惡吏見那婦人支吾無以對，就拍案吼道：「這兩年多我們知道你是個會鑽字眼的惡訟棍。你的反革命氣焰太囂張了，給他拉下去！」那婦人說：「簽了字再走」。我說：「請依法解釋問題後就簽字」。惡吏：「你再說就給你卡起來」（一種刑具——壓含彈簧卡）。我對那婦人：「

請維持妳的司法秩序。你能容許旁人干擾你的司法權責嗎？」那婦人說：「我暫時答覆你，我們認定離婚理由可以成立的依據是黨的肅反政策精神」。我說：「好，請拿筆來」。在那「離婚裁定书」上簽上：「本人尊重黨高於法的原則，同意離婚」。簽名、捺指印。婦人漲紅了臉說：「這怎麼行！」我說：「這是貴法官引用的依據」。棒打鴛鴦，於焉分飛！

從被捕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毛澤東想在他將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之前，再玩一次「施仁



政」的「統戰」陰謀。繼「特赦戰犯」之後，隨之又「寬大釋放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我經過二十年零五個月的超納粹集中營的折磨之後，也被當作一枚小小的「統戰」籌碼拋了出來。在那七千四百五十三個漫長黑夜裏，我從看守所——監獄——勞改隊到就業隊，歷盡了大監房——小號子——黑號子的長期監禁。經過了誘供——詐供——逼供——刑訊——疲勞訊問——催眠訊問——飢餓訊問——乾渴訊問等各種法西斯審案手段，接受了測謊器——電刑——曝刑——凍刑——青龍爬背——蘇秦指劍——狐狸望月——猴子攀樁——噴氣飛機等等由原始到現代的刑具摧殘。閱歷了犯人反間——捏造檢舉——串通對質的非法定罪。闖過了補交餘罪——檢舉揭發——立功贖罪等等關卡。反復寫過了千篇必求一律的交代材料、認罪材料、檢查材料、感覺材料。從勞改隊到就業隊，從事超牛馬的勞動。二十多年間處於奴隸不如的地位，人的尊嚴被踐踏殆盡，在這篇控訴中難以盡述。只要我一息尚存，誓盡西江水，寫一本「中國的古拉格」，比較一下這兩個暴力集團究竟誰更殘暴。我沒有繼承爾仁尼琴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奢望，我只想叫希特勒的鬼魂拜倒於毛澤東的屍屍下，自愧不如。「縣團級寬釋轉業後」，雖然離開了放而不釋的就業隊，却仍然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親屬繼續受到政治歧視和社會排斥，子女的淚水仍然只有往肚子裏吞！

四· 孩子的恨，不屑一顧

我這第二張

「起義人員證書」

我們被寬釋的縣團人員，是被稱為「先生

」的。我被安置在一個小型工廠當守門員和打掃廁所。某次，一個青年工人喊了我一聲「老同志」，被「人保科」（管人事和保衛工作的機構，其權力在每個單位都是凌駕於單位主管之上的）科長當面訓斥：「糊塗！我早就對你們交待過，對他們這種人只喊『先生』，他們是寬釋的勞改犯，怎麼能喊同志」，你還有階級立場沒有？我們這批先生在繼續遭受三年歧視之後，中共（七九）六號文件下達了，市統戰部成立了「落實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辦公室」。市政協把「先生們」組織起來學習有關文件，號召我們「一定要相信黨的『有錯必糾』的政策，放下顧慮，提出申訴。這次決不會因申訴被加刑」。然而，先生們鑒往衡今，以「毋為禍首，毋為福先」的處事態度，靜觀自在。我則以「不為禍首，焉享福先」的進攻型性格第一個遞出申訴書，爭取第三次釋放。

經過三百六十八天的時間，闖了八十一次原單位（文件規定：一律由被捕前所在單位負責復查）的大門，上訪過二十三次省市統戰部，踏了三十一次法院的門檻，就這樣單刀陷陣，舌戰群「儒」，終於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困境中衝出重圍，於一九八〇年二月，拿到了第五張「判決書」。判詞結論是：「一、撤銷本院一九六一年某字某號判決書；二、對屈可伸宣告無罪」。正在大肆宣傳「平反冤假錯案」和一片感恩頌德聲中，我接受了一位記者的採訪，要我談談自己的感激心情。我說：「非常感謝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親自制定的『對起義人員的政策』，在我放下武器三十一年後，也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離開我們三年多以後，終於落實到我的身上了！」記者同志報以會心的一笑，告辭了。

接着是「解決落實政策工作中的遺留問題」，統戰部概括為「三子問題」——房子、兒子、票子。又開始了一場持久戰。經過四年的拉鋸戰，分得了一間斗室，第一子的戰役總算結束了。再集中精力投入「票子」之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全都補發了工資。我們起義人員冤獄時間之長、受害程度之深、株連親屬之衆，較之「文革」受害者，有過之，無不及，為何連冤獄費也不給呢？「十六字方針」中還有這「一視同仁」四個字尚待「落實」。這問題一反映出來，忙壞了「政協」、「民革」這些黨的「諍友」他們使盡了混身解數，軟硬兼施，希望撤掉這着「臥槽馬」。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下達了一個「中發（八三）九號文件」下了一着賴皮棋說：「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蓄意製造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後，應予補償其工資損失。文革以前的是歷史遺留問題。是由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政法人員的政策水平而造成了一些錯判，這些受害人受到的委屈我們是能理解的，各級黨組織要對他們做好思想工作，作和安慰工作，他們一定能體諒國家的困難」（引文係憑記憶，寫稿時不便借調檔卷，故非原文照錄，但文意無誤）。這一要賴，「票子」問題在「強權就是公理」的法制下也算解決了！剩下的「兒子問題」。因為我們的子女的血管裏循環的是「反動血液」。戰敗者是奴隸，奴隸的子孫當然還是奴隸，這是史有前例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這不能怨恨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所以我的兒子在我們「平反」將近六年之後，他還是沒有正式就業的權利。他如數家珍似的說：「過去，省體委指名要我，師院體育系要錄取我，工學院電機系指名保送我。汽車製造廠招工，話劇團招演

員……一經政審，都不要我。現在，爸爸的政策落實了，誰給我落實呢？」我是三重身份（起義人員、台屬、僑屬）的統戰對象，理所當然還是找統戰部。既風趣，又誠實的陳部長却向我訴苦：「我只有再去給人家磕頭吧！文革時，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部』部長，坐了七年牛棚。現在，我愛人說我是磕頭部部長，催我趕快離休。落實七百多原工商業者的政策、一百多錯劃右派的政策、你們這兩百多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這十種統戰對象，要落實政策的，共約兩千多人，都要去磕頭求人落實，落實一個人的政策磕一個頭，我都要磕兩三千啦！我不像組織部，握有人事權。宣傳部，握有輿論權。工交部，握有審批權……都有條件和外單位搞『協作』。我這個統戰部，一去到人那裏，就知道是來找麻煩的。我沒有搞協作、交換的資本，只有磕頭。你們在政協會談上提統戰工作的意見說我們是『統而不戰，落而不實』，概括得太好了。我再給續一句『磕而不響』就更全面了。我的頭都磕破了，對方連響都沒有呀！」我的未婚媳婦問我：「這個持久戰要打到何年何月？該不是『八年抗戰』？」當我的孩子看到我新領的「起義人員證書」時，輕蔑地說了聲：「又拿來一張廢紙」。

一張廢紙千行淚！我在這張廢紙上寫了下面一段話，然後在我父母的遺像前把它燒了：「作爲一個軍人，在戰爭中，必須堅持勝利，萬一戰敗時，只有自殺。否則，從你放下武器的那一刻起，你就開始接受了那無窮盡的，連畜牲都不能忍受的屈辱和折磨，而且禍延子孫，株連九族，旁及師友！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是超奴隸制的社會奴隸制，奴隸的子孫，只能永遠是奴隸！」

發揮壓力團體的作用

——寫在中國民聯二大召開之前

(中國民聯主席) 王炳章

今年年底，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海內外配合運作的民運團體，將召開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來自世界各大洲的中國民聯各分部、支部、聯絡站的代表，將雲集一堂，共同探討中國的民主前途。

中國民聯現階段扮演的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的角色。何為壓力團體？為什麼要組成壓力團體？她的作用是什麼？如何運作才能發揮其作用？如何強化她的作用？這些，都是從事民運和準備投入民運的人需要探討的。

壓力團體是一群有共同理想或共同利益的人有意識的組織，成員彼此合作，以達成同一個目的。中國民聯是認同「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及多元」的盟員組織起來的、推動中國民主及多元化進程的群眾團體。

壓力團體與政黨不同，政黨的目的是通過各種手段謀取政權，壓力團體則祇是影響執政者的政策。中國民聯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影響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政治政策和留學生政策等，使之向開放、開明、民主、多元及致富於民的方向發展。具體一點說，使當局在各方面放鬆控制。

通常，壓力團體通過下述途徑達成影響執

政者政策的目的：

一、宣傳。如出版報刊、雜誌、書籍、張貼大字報，或利用廣播、電視等，以宣揚本團體之主張，造成民意傾向和潮流，讓執政者瞭解本團體的要求。中國民聯現在出版機關刊物的中國之春月刊、中國之春簡訊及有關宣傳品。壓力團體還可借助其他大眾傳播媒體宣傳其宗旨，如發佈新聞稿、舉行記者會、接受記者訪問和舉行公開座談等。

二、遊行示威或請願。該項活動易於激發團體成員的參與感及向心力。活動本身通過吸引民眾注意力、新聞媒體傳播、派出代表與當局接觸、遞交函件或直接讓執政者聽到、看到等方式，使執政者瞭解壓力團體的主張和體驗群眾之力量。一九八四年元月份趙紫陽總理訪美和一九八五年七月李先念主席訪美時，中國民聯總部曾在華盛頓組織過遊行、請願活動，有力地使中國民聯的主張傳給了中國官方。

三、遊說。派出代表或委託他人與官方政策制定者接觸，陳述團體之主張和要求。中國民聯曾委託過很多可以與北京官員接觸的人士，把我們的信息及要求傳達給官方。

四、寫信及簽名運動。這是一種看不見的遊行示威，目的是使接信的政策制定者瞭解意見，並從發信人及簽名者的身份和數量上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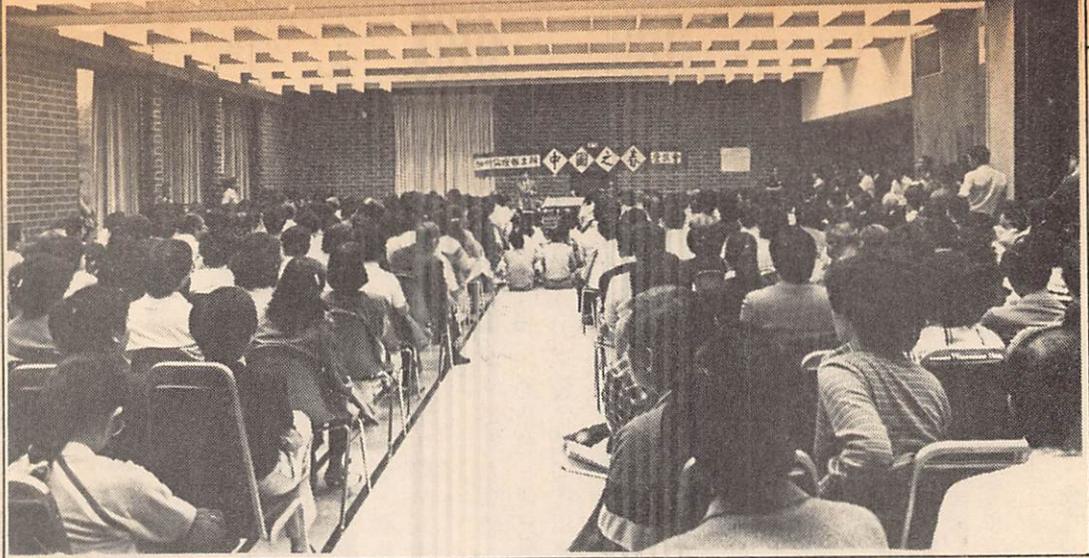
意見的代表性。

五、談判。壓力團體與執政者溝通的最佳途徑是雙方派出代表談判，達成諒解和協議。然而，壓力團體做到這一步很不容易，她必須有堅強的實力和足夠的影響力，以致當局不能再無視她的存在。

六、罷課和罷工。這是壓力團體在上述一系列活動無效後，採用的最後合法手段（在中國不算合法）。這種行動，旨在用破壞性造成壓力，迫使當局讓步。罷工和罷課，通常是迫使當局坐到談判桌上來解決問題的。

七、暴力。如綁架、劫機和暗殺等。有些壓力團體借助暴力，以引起輿論注意，進而宣傳其主張，實現其特定目的。這種非法手段已為人類所不齒，中國民聯一貫反對暴力行為。一個壓力團體的作用大小，取決於其成員的素質和數量。素質因素包括身精神、意志、知識、經驗、社交面、組織能力和理論水平等，更重要的，是能否合作，即是否有團隊精神。當然，素質因素也包括社會地位及知名度等。增強中國民聯的影響力，祇有兩個途徑：一是提高現有成員的素質；二是吸收更多的人，特別是素質高的人參加。

至今，仍有一些人認不清結為團體的重要性。美國有句名言：「組織就是力量。」正是認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性，美國的民間組織及壓力團體非常之多，有力地起到了制衡執政者的作用。反對組織，猶如反對自由一樣毫無道理。有人擔心，一搞組織就會產生獨裁，不如以一種若有若無的「運動」形式來爭取民主。其實，健全的組織正是防止個人獨斷的好方法。否則，祇搞運動、不搞組織，連活動的方針由誰制定都不能解決。因為沒有組織形態，便不能確定誰有表決權，誰無表決權，也不能保



中國民聯是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基礎上成立的。中國之春運動于一九八二年底開始時曾震撼了全世界的華人社區。這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中國之春演講會的熱烈場面。演講會由加州論壇報主辦。

證少數服從多數而又保護少數的原則。
中國民聯剛剛兩歲 我們應為自己的成績感到驕傲。

在二年多前的中國之春雜誌第一、第二和第三期上，我們就曾呼籲北京政府進行價格體制改革、擴大市場機制及發展私人企業。我們更通過很多媒介將這些建議轉達給中國的經濟決策者。後來，北京政府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某些政策，包涵了這些建議的合理內核。

前年，留學美國的兩位大陸學生被押解回國。中國之春立即召開記者會，并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為兩位留學生鳴不平，并強烈要求北京政府放鬆對留學生家屬出國的限制。我們還動員了不少人向有關當局為被押回國的留學生求情。結果，其中一位於四個月後被允許返美。一年多之後，北京政府解除了對留學生家屬出國的限制。

今年二月，中國之春雜誌發表社論，替廣大農民要求土地的所有權和買賣權。最近，北京官方透出消息，將明文規定土地的承租權可以自由買賣。這項政策，雖然離農民的要求還差許多，但畢竟是向前邁進了一步。

以上僅是幾個影響執政者政策的例子。當然，我們不能認為，北京當局的這些政策轉變都是由於中國民聯的努力，但至少可以說，我們在中國的大變革中，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是抵消阻碍改革的保守派的重要力量。

至於中國民聯所組織的其他活動，如營救處於危急狀態中的耿晨等同志，去年奧運會期間的宣傳等，其壓力團體的效用，是有目共睹的。

組織壓力團體的基本假設是：執政者不能永遠代表所有人民之利益。那些利益未能被

現行法律和政策所體現的群眾，要為自己爭取利益，則必須結為壓力團體。有一種人之所以否定壓力團體的價值，否定民主運動的價值，是因為在他們的潛意識裏，認為執政者可以自發地進行改革，這種認識不值一駁，因為，連獨裁者毛澤東都承認：「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北京當局也承認，目前較為成功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的制訂，實際上是農民先自發地包起產來，當局祇是順乎民意罷了。歷史的經驗表明，執政者往往是由群眾推着向前走的，群眾爭取時，執政者能滿足群眾的要求，不去嚴厲鎮壓，就算相當不錯了。我們決不能奢望當權者能自動自發地改革！

我在青藏高原曾住過一年多的時間。有一個草原奇觀經常啟發我思考團體的力量：當草原毛蟲吃光一片草地，進行搬家而被河流阻隔時，為了過河，它們向中央集中，抱團，逐漸滾成一個大球。最後，大球滾入湍急的河水，漂向對岸。到岸後，小蟲再分散開來，向前爬進。在河水中，外層的少許犧牲了，但如果它們不結合起來，等待它們的，祇是集體的饑餓和死亡。它們團結起來，就能征服那滔滔的江河！連原始昆蟲都知道結合的力量，何況我智慧的中華民族！

還有一個現象啟發我思考協調運作的效能。青藏高原的熊是既大又凶，可藏民并不怕它，祇要有兩隻協調動作的小犬，就能戰勝大熊。大熊衝向第一隻小犬時，另一隻就咬它的後腿和尾巴；大熊轉過頭來回擊時，它的後腿和尾巴又受到了第一隻小犬的攻擊……這裏，協調很重要，如果兩隻犬都站在一個方向，別說兩隻，就是三隻，也不是熊的對手。

團結起來，協調運作，專制制度之熊，必被人民制服！

讓人們在民聯身上看到中國民主的希望

——寄語「二大」代表們及全體盟友們

作者簡介：李兆陽，男，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某大學主修理工科，但對社會科學亦有廣泛涉獵。

李兆陽

民聯成立將近兩年了。若有人要問：「民聯在這兩年的時間里是怎樣渡過的？」那麼，我可毫不猶豫地告訴這人：「她是以無比旺盛的生命力，朝氣勃勃地成長起來的！」

然而，她的生命雖然旺盛，她的成長雖也迅速，但她也遇到過一些來於別有用心之徒的誹風謠語；同時，她的生命畢竟是很稚嫩的，她本身也有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爲了使她更能茁壯地成長，爲了使她能夠更具有民主的素養，在她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前，我無需列舉她已擺在人人面前的成績，却要先談一談我對幾點既存或將來有可能出現之問題的看法，願與大家共同討論和認識，以資共勉。

如何對待民聯本身的問題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更何況由許多不完美的人組成的民聯。我認爲民聯本身有無問題並非十分重要，重要的乃是其成員應如何對待她的問題，如何解決她的問題，如何一步步地去完善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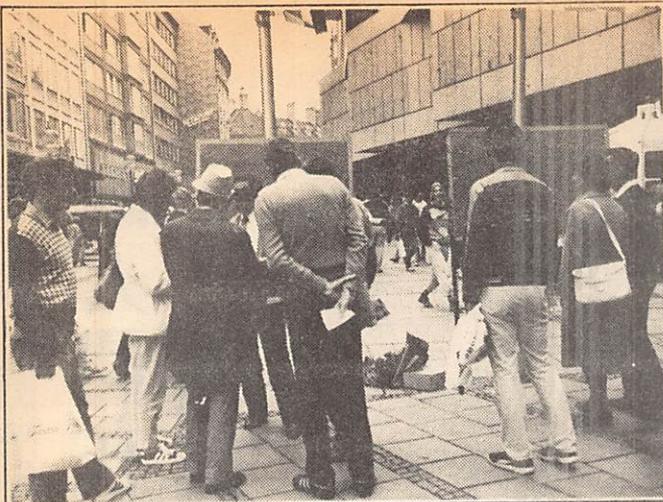
參加民聯的難免有一種有分裂傾向的人，這種人感情衝動，發現別人的意見與己不合時，容易憤然離去。當然，一個組織造成分裂的原因是極其複雜的、多方面的，我們不應把責任全推在這種人身上。事實上，組織本身不能有效的消除嚴重的分裂，就是一種問題，就應當反躬自省。分裂本是一個團體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西方民主國家的團體也有分裂，但他們的分裂與我們的不同。例如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當某一個黨在一個州稱雄獨大及外部壓力最小時，那麼這黨的內部鬭爭就激烈起來，有時導致分裂，形成尖銳對立的一黨兩派，甚至各有自己的政綱，儼然如兩個政黨，但他們的彼此批評和指責都是以理性民主的方式進行的，絕不會彼此勢不兩立或不共戴天。所以，他們分裂一段時間後，仍能互相妥協，再次合作，一致對外。

裏有專制，哪裏就有散沙。但在一個民主團體裏，真正的民運者就無必要以這種惡性分裂方式來反應團體自身的問題，而應以理性民主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中國之春運動初期所出現的幾次惡性分裂，不管其原因如何複雜，但畢竟對民運有相當的破壞性。

所幸的是，自一九八三年底中國民聯正式成立以來，由於組織架構的不斷完善，由於民運人士對民主觀念的理解日益加深，中國民聯未再出現惡性分裂。

至於普通分裂，即西方民主團體的分裂，是不是可以搞呢？我認爲，在特別必要時，搞也無防，因爲幾乎每個團體都要有分裂出現，你不同意，它也會出現，永遠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分裂就是一個團體內部分歧嚴重的表現，普通分裂反而是民主制衡的激烈表現。惡性分裂則帶有濃厚的不民主的色彩，是民運人士所不齒的。也許有人要問，你是否主張民聯搞普通分裂呢？我說，當然不。事實這並不由某個人的主觀意志所決定。不必要時，有人想搞也無人支持。

我這裏只有兩個目的，一是讓所有的中國



近兩年來，中國民聯為從各個方面去影響中共政府，在世界各地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圖左為中國民聯西德支部在趙紫陽訪問西德期間的活動照片，圖右為中國民聯美國東部成員在李先念訪美期間的活動照片。

人，不僅民運人士，都要認識到惡性分裂對人對己都有極大的危害性，要盡力消除；二是對普通分裂不要過於敏感，不要忽略了它對民主的正面作用。

另外，民聯還有少數朋友起初完全贊成民聯的宗旨，並熱心參與，積極活動，但過一段時間後，發現民聯本身存在着各種問題，如組織在一些事務的管理上不夠民主，有些領導或同志的工作作風不夠民主，等等。他們往往只認為不應當有諸多問題，而不能客觀地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於是對民聯失望，甚至對整個民運悲觀，最終從民運中悄悄地退出，從此對民運漠不關心。

顯然，這些朋友的隱退，絕非因民聯什麼大原則上的問題，否則他們當初根本不會加入；他們的隱退，乃因民聯組織本身身上的一些問題等。儘管這種隱退要比易走極端的極少數人所造成的惡性分裂理性得多，但消極的隱退畢竟不能解決民聯的問題。我為他們的隱退惋惜。

那麼，悄悄的隱退是消極的，惡性分裂是有損的，民運人士究竟應如何對待民聯自身的问题呢？

首先，我要問，我們為什麼參加民運？我們是單為個人的權益而參加的嗎？顯然不是，因為我們這些已到民主國家的人已可享有自己的權益。我們是為爭取全體中國人自由、民主和人權而參，是為振興我中華民族而參，所以每一個真正的民運人士都應具有崇高的獻身精神。將中國從專制制度變革成民主多元政治，是我們最大的目標，只因我們有實現同一目標的同一志向，所以我們才到一起，那麼我們為什麼有時會因一些微小之個人利益而忘却了我們的大目標呢？為什麼有時會因一葉障目而不

識泰山呢？

不錯，民聯本身存在着許多問題，但客觀理性地認識她的問題就是我們應有的態度，積極地解決她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責任。真正的民運人士對民運是有強烈責任感的，有責任感的人就不應在問題面前退却，更不應自暴自棄、製造更多的問題。豈不知不斷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正是人生奮鬥的具體內容？

試想，如有人認為民聯內有些人沒民主的觀念，而且一些具有民主觀念的人再都因此退去，那麼還有誰在裏面抵制各種不民主的現象呢？剩下的人若都是無民主觀念的人，那麼他們不更容易搞專制嗎？來於大陸的許多人在中共專制的統治下都敢犯顏直上，為什麼在一個以民主為宗旨的團體內却不能抵制不民主的現象呢？

美國建國時，幾個開國元勳如漢密爾頓、杰克遜，甚至包括華盛頓，都極力主張建立一個高效率的中央集權政府，但杰佛遜和麥迪森則極力反對，最後才在雙方妥協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個既有一定效率又充份體現民主的聯邦政府。試想，假如當初杰佛遜等人一看到華盛頓等人的不民主觀念就消極地退去或明哲保身，假如不是他們彼此的制衡，那麼美國後來就很可能有這樣一個適中的政府。

當然，我上面所謂的抵制乃是民主的制衡，也是彼此的幫助，而不是彼此無理性地對立。人性本身就會有專制的傾向，人也往往最難克服自己人性的弱點，因此，我們應彼此幫助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你有不民主的表現時，我可以給你指出，必要時抵制；我有不民主的作風時，你也應給我指出，抵制我。我們應彼此包容，但也不應為表面苟和而喪失民主原則，不應使民聯偏離她的大方向。維護民聯的宗

旨是每一個成員的責任。據說有人發現某同志的工作作風不民主或有很多缺點，就叫嚷要開除某某同志，豈不知這樣做法本身就是極不民主的行爲。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當然，像這樣動輒就要開除同志的人，我們仍要視他爲同志，幫助他認識民主的內涵，以免矯枉過正。

我再說，你要改變一個人，就要接觸他，影響他；你若完完善民聯，就要參與她，影響她。有人說民聯裏有搞政治投機的人，那麼像一些具有正義道德感的人參加的多了，不就把局面改觀了嗎？試問，那些既不參與又不影響，只對民聯指指點點、評頭品足的旁觀者，究把頭埋在沙堆裏的駝鳥還能聰明多少呢？

同志們，既然我們選擇的事業是爲大多數中國同胞而獻身的事業，那麼，問題就不會把我們嚇倒，困難就不會把我們嚇倒；待到民主的春光普照神州大地時，也許我們已失去許多自己的東西，但我們仍是幸福的，因我們的幸福將寓於十億同胞的幸福之中。

同志們，把眼光看得遠一點，盯着我們的大目標吧。同時也希望同志們要勇於表現自己，把自己在民聯裏存在的價值表現出來，那就是爲民聯做出有益的貢獻。

關於民主和職權

也許有人會問，你們假如把民聯搞得像美國的民主政黨那麼民主，成員那麼自由散漫，那你們的工作還會有什麼效率嗎？你們的領導人還有什麼太大作用嗎？表面看來，太民主確實也很難辦事。不過，事實上倒不盡然。有這種顧慮的人，顯然未能把民主與職權的關係區分開來。

前年，我和一位中國同學一起在一個外國公司工作。有一次，這同學對我說：「你們都說美國人講民主，我看我們的老板一點都不民主，什麼都讓我們做，不是嗎？」我說：「不是，乃是你沒有把民主與職權的兩個概念搞清。我們和老板的關係是僱傭關係，表面上，這與民主、職權的關係不一樣，其實很相似。例如，老板花錢僱傭我們，我們若接受他的僱傭，那麼就等於我們已同意老板將在我們身上所行使的任何正當的職權，那麼當老板讓我們做事時，我們就不能再說老板不民主了。你若不喜歡這老板的人格和領導作風，你可在完成契約的情況下換個老板，這就是你的自由，就是美國人的民主。」

同樣，一個民主的團體或政府中領導人的職權亦是由其下面的成員以民主的契約同意的。例如，美國大多數人民在未同意雷根當總統前，雷根無權指揮人民，但一經大多數人同意，雷根的權力可就大了，當他行使總統職權時，你就不能說他不民主了。即使你是原來未同意雷根做總統的少數人之一，但你也得服從雷根的領導，因這是全民認同的民主原則。

也許有人會說，大多中國人的民主觀念沒有這麼強，因此，一個太民主團體的領導工作仍然困難。我則說，那你就先從輔導中國人開始嘛。

關於民聯的性質

一個團體的成員，特別是領導人，對其團體的性質的認識是十分必要的，否則，他們的運作方式就難免與其團體的性質相違。另外，團體的性質將決定着它的組織關係，决定着其領導人與普通成員的關係，決定它發展的趨向。

例如，中國共產黨，在性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黨；在組織上是民主集中制，是一元化的高度集權制；在成員與領導的關係上，是成員絕對服從領導，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全黨絕對服從中央，領導人的工作就是發號施令，成員和下級沒有充分自由；它的發展趨向就是不斷地走向並鞏固它的一黨專制。再如，中國國民黨，在性質上，自稱是革命民主黨；在組織上，亦是民主集中制，中央指揮全黨，上級指揮下級，全黨常依賴某個「偉大」的領袖；在發展趨向上，竭力維持它一黨獨大的統治地位。但美國的政黨就不同了。在性質上，美國政黨就是民主政黨；在組織關係上，是多元分立制；在領導關係上，是上級協調下級，而不是上級命令或指揮下級，所有黨員，原則上一律平等，領導讓黨員工作，要全靠說服，你若說服不了，只能說明你無領導能力，只有被你的上司換掉。黨員對組織無顯著的權利義務，黨員從不依賴一個固定的領袖，黨員有充分的自由。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大概會知道國共兩黨之所以走向專制的原因了吧。

有人不是在擔心民聯會重蹈國共兩黨的覆轍嗎？那麼民聯就有必要向人們闡清自己的民主性質。雖然「一大」以來的民聯性質還不甚分明，但在「二大」上就要認真討論確立自己的鮮明性質，要將其性質體現在組織關係和領導關係等各方面。我認爲，民聯自然是一個壓力團體，根據當前的歷史形勢和歷史教訓，又不需要暴力革命，所以我們就應該全力把民聯辦成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團體，把她辦成一個民主的大學校，讓人們在這個大學校裏共同學習民主，讓海內外同胞在我們身上看到中國民主的楷模和希望！

民運人士應學會民主運作

對民聯「二大」的忠言和期望

(香港) 今之鳴

應克服專制母胎的影響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得知你們即將召開「二大」，故寫這封信給你們。提些意見給你們參考，也表達我們的憂慮和期望。

中國民聯的主要目標是促進中國（大陸、台灣、港澳）政治民主化。民聯成員主要是來自大陸的青年，台灣青年次之。民運者大多在專制或不民主的環境裏成長。這自然形成一種矛盾：民運者所理想的是民主的，但其行為習慣却又很難擺脫專制的影響，往往以非民主的運作去爭取民主，以專制運作去反專制，甚至紅衛兵派門作風時隱時現。這一點若不及早注意，民主運動就有可能被導向歧途。

不可嫉異如仇

民主內涵有諸多要點，其中之一是發表已

見、堅持已見並爭取已見為眾接受。因而競爭成為必要。美國總統的競選是競爭，大陸的毛林及毛劉之鬥也是競爭，紅衛兵「保」「革」之戰亦是競爭。其區別在於前者通過民主運作程序競爭，後者用絕對化的、排他的、敵對的運作方式去解決問題。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常識了。我之所以還要提及，是因為要認識某些已存在的明顯的事理頗易，要自己的思想行為習慣與這些事理吻合就很難了。

我們聽說，民聯內個人往往對異見者視如仇敵。一旦發現對方有錯，就對其口誅筆伐、群起而攻之，甚有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之勢。另如某人作風不正、風格不高、氣質平凡、開支失當、帳目不清……即使總目標相同、大方向一致，有幾件事合拍，但只要有一件事，甚至百分之二一件事不合就一拍兩散，「劈炮」而去。我認為這種人不管他當時投身民運是出於一時衝動也好、理智冷靜的決定也吧，一旦「劈炮」而去，總是對自己當初理想的背叛。如果他還承認民聯還是促進民主運的話。當然如果他離開後還在為促進民主而戰，那他還是

問心無愧的。如果他在離開後，疏遠民運、懷疑民運、甚至反對民運，那就令人嘆息了。如果某人認為民聯已非民運組織而離開，我們可以說這是他個人的判斷所致，他有權利如此做，我們應尊重之。但反過來我們內部是否也存在着一種不民主的現象，對些微意見不合、看不順眼的人，誓要把他排出民運之外？很難說。不論問題在哪一方，每一個民運者都不會願意自己有這種惡習，但在不知不覺之間，在實際處事時，這種惡習往往會表露出來。

勿令親痛仇快

你們即將召開「二大」，我們則希望你們在「二大」上的爭論熱烈些、競爭劇烈些。希望你們在爭論中吸取深刻的教訓，總結出寶貴的經驗，探討出可行的民運方案。我們希望「二大」能湧現新的人才給民聯帶來新的氣象。當然我們也希望現領導人能繼續在任，以便在已有的基礎上，老馬識途更上層樓，開展新的局面。只要對民運有利，不論新人當選還是舊人留任，都是值得歡迎的和慶幸的事。我的要點是在以上講的良好願望上，更重要的是以下的憂慮。為了便於敘述，故把問題簡化。假設「二大」有兩派之爭，甲派寸步不讓，非把乙派壓下去不可，若成，則組織「我們」的民聯，清除異己；若敗，則搞組織分裂，退盟，把「你們」的民聯搞垮而後快。乙派或成或敗亦如法泡製。上述假設是令人不快的，是忌諱的。事實上，這假設不可能是完全真實的，但並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假設的可能性。我之所以有這種憂慮，正像我在上面提及的，是基於民聯多少有些用非民主手段促進民主運動，用專制獨裁手段去消除專制獨裁。在專制環境下

成長的反專制制度者本身受到專制思想的污染，其思想行為習慣都帶有專制的烙印，不自覺地給民運帶來負影響。

爲了更進一步說明我的擔憂，我想舉出兩個事例。

中共會對自己陣營中的托洛茨基派作出一個決定：可以同任何反動勢力，包括國民黨反動派合作，就是絕對不可與托派合作。今日在香港，中共正極力拉攏國民黨人士加入其「協助」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例如卜少夫等，與國民黨反動派合作；也拉攏香港立法局行政局議員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也就是與被他們稱爲「孤臣孽子」的帝國主義犬牙合作。但被他們稱爲「香港華理沙」的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則拒絕合作，並且對劉進行種種打擊，視爲眼中釘。由此可見，專制的勢力可把一般外部敵人視作對等的（至少在某一時期的表面上如此），在必要時可以對等談話。但在自己陣營內的對立派，絕不能有對等的地位。因爲一承認其對等地位，就承認了其取而代之的潛在可能。這是對專制掌權者的近而嚴重的威脅。對一個視權力爲最高目標的政治勢力來說，這是最犯忌之事，是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中共對內之所謂路線鬥爭如此頻繁且狠毒，其動力之源是爲私爲權。

我們擔心的就是染有專制獨裁餘毒的民運者把這種對越親者鬥爭越狠毒的惡習帶進民運內部，做出親痛仇快的蠢事而不自覺。

對你們的希望

在發表己見、堅持己見的同時，還要學會尊重異見，甚至保護異見。不走極端、要妥協

行事。誠心服從民主裁決。這是以促進民主爲己任的有志之士應該而且可以學會的民主運作技巧。如果自認爲是民運者却不肯遵守民主規則，是要捫心自問的。

我們希望堅持己見、推展己見的失敗者，能誠心服從民主裁決，除了繼續保留（或修正）己見外，還要與異見者合作，甚至在異見者領導下竭誠爲民運盡力。這種民主胸懷應該具備的吧！

我們希望己見獲得民主接納者，也能尊重並信任異見者的衷誠合作。一個民運團體內有異見者的存在和監督是保障自己不變質的重要條件。歷史證明，不允許異見者及其監督存在的團體，其掌權者大多都會變得很專制。

我們希望不連任者，繼續愛護民聯，不要用行動來背叛爲民運奮鬥的初衷。我很佩服「牛虻」。他盯住了革命目標，緊緊地，永不鬆脫。「牛虻」從不把個人得失放在心上。

我們不應把參加民運者視爲完人和聖人，認爲他們會爲民運而絕對地理性地衷誠合作無間。我們反而認爲，民運者有私心，爲公中也爲私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常的。但有一點要明確，要麼，你不參與民運。要麼，你在處理民運的公與私的矛盾時，應優先考慮公利，最低限度你不得損害公利。這個要求對一個民運之士來說不算是苛刻的吧！

民聯兩周年了。我們希望你們在仍然堅持崇高的目標外，還要逐步學會並應用民主運作的藝術去達到目標。特別是學習把民主運作用於民運內部，如果民運內部都難實踐民主運作，那麼民主的目標就很虛很虛了。

我們關注着你們的「二大」

「二大」成功！

文藝園地

夕光

你別我走去了
門吱呀一聲嘆口悵悵
模糊的背影褪色爲空虛
刺眼的黑
正偎依窗台
黃昏裡淡弱了的夕光

睡

邁着小貓的脚步
睡悄悄地來了
街一片夢的綠葉
散發出幽濕的溫馨
讓心舒展在卷縮的軀壳
然後揉揉眼，走了
留下一個明亮的醒

生命

跳上那輛公共汽車
我就去上班
每天，每天
膠皮輪胎轉動
黎明的街道
因爲房頂上還有些老式烟囪
我就咳嗽
拐過那個直角，脚步匆匆
一步，一步
敘述流水綫上生命的故事
從早晨到黃昏

（中國大陸詩人·歐洲）嵐之凝

關於民運的 自身民主化問題 之我見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姚敏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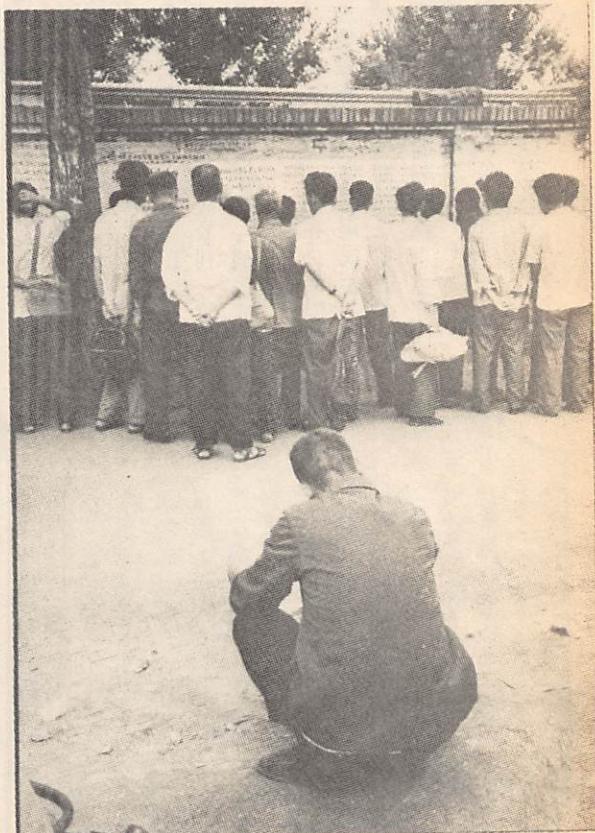
對於中國民聯來講，提高其自身的民主化素質，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儘管中國民聯目前實力尚弱，而且它並非以奪權執政為宗旨，但任何一個民運組織都必須從開始就注意加強自身的民主觀念，樹立組織的民主風氣，這是民主運動的需要。任何一個本身專制的政治團體或個人都不可能為別人帶來真正的民主。歷史的教訓理應記取，朋友的忠告必要重視，我現就民運組織的自身民主化問題略陳管見，並求指正。

應當澄清的問題

在討論中國民聯的自身民主化問題時，有這樣兩個問題首先需要研究：

一、當代的民主運動 不是奪權運動

有人認為中國民聯有取代共產黨而執政之意，我想這可能是一種誤會或理解上的片面。中國民聯「章程」的總綱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裡所講的「變革」，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不能單純理解成奪權，更不能設想一定要由中國民聯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才會建立中國的民主化，要根據客觀形勢發展來決定；民主的中國由哪一黨來執



西單民主牆前的運動就是要求政府實行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制度的民主運動。

政，要取決於人民的選擇。作為民運組織之一的中國民聯，不過是變革專制制度的壓力集團，對於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起着促進的催化作用，它本身的存在與消亡也取決於客觀形勢的需求，對共產黨取而代之並非它的終極目標。同時，觀察它的實際運作也無這樣的圖謀。

中國民聯的前身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乃是當年北京之春民運精神在海外的延續。我們知道，北京之春時期的大字報，還是油印的民刊小冊子，全是針對中共存在的弊端從各角度發表評論、意見、建議或改革提案，要求將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歸還給人民。甚至有些民



中國民聯是個多元民運組織的聯合體，是個監督執政者的壓力團體。

運者非但無「消滅」中共之意，反有保護中共之心，他們希望中共能轉化向善，真正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實現政治的民主化，而成為不負眾望的執政黨。

今日的中國民聯雖然與北京之春時期的民主運動在運作方式與架構上都不盡相同，但它仍是現代中國民運的脫胎。從這個意義上看，它的運動本質不是奪權執政，而是要聯合一切反專制勢力來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時速。

二、中國民聯不是政黨

中國民聯不認為自己是個政黨，而它也確

實不是一個政黨。據我所知，中國民聯是一個包容量很廣的民運團體。它的盟員構成並未強調政治信仰上的單一化，它的鬆散的組織架構上下只是協調關係，它的任期有限的負責人祇是這個團體的管理者而非統制者，並且該組織的各層次分支機構與盟員都有充份的活動自由和運作的靈活性。因此，中國民聯不過是個多元民運組織的聯合體。它在自願的基礎上結合，在民主的前提下運作。其盟員的成份與組織架構的性質，具有對它自身可能產生專制的一定約束力。這一點它與專制的群體或國共兩黨有着根本的區別，也是它加強自身民主化的有利條件。

在運動實踐中提高民主觀念

至今世界上還沒有可稱為盡善盡美的民主制度，沒有絕無異議的民主準則。所以我們要不斷尋求、不斷探索，也因此民主運動才有其存在的價值。

我同意這一觀點：反對專制並不意味着追求民主，二者之間存在着意識鴻溝。中外歷史上反專制者層出不窮，但以新的專制替代舊的專制者更不乏其例。即使今日的歐美、日本等一些所謂政治開明的民主國家，在激烈的黨派之爭中或對內對外的政策上，仍擺脫不了黨派私利的偏見與專制的色彩，年輕的中國民聯又怎能保持絕對的超然。尤其是我們這些從專制的沸鼎中爬出來的人，身上難免殘留專制的氣息，甚至有時會混淆民主與專制的界限。於是，儘管我們懷着良好的願望，但有時仍會出現相反的後果。因此，我們急需在民運實踐中提高民主觀念，加強民主運作的的能力。

我認為當前中國民聯注重自身民主素質的

培養，其目的倒不一定是為取而代之某一黨進行執政做準備，更實際的是為使自身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民運組織，真正承擔起推展中國民主運動的任務，同時，也是爲了加強自身的生命力。在今天海內外的環境中，一個民運組織如若染上了專制的色彩，不要奢談甚麼未來執政，恐怕要維持自己的存在也是困難的。

如何提高中國民聯自身的民主素質，方法正在探討中，這裡我祇講兩點意見：

一、要樹立為民主運動而獻身的精神

我們在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所投身的這一民主運動是一個崇高的事業，中國民聯的盟友應明確自己從事運動的意義和歷史責任。中國民聯裡沒有鐵飯碗、沒有烏紗帽、沒有安樂窩，我想將來也不會有。相反，它卻面臨着強大的專制鐵蹄、顛簸的政治漩渦、曲折的奮鬥之路。所以，參加這個組織的人首先要具有無私的獻身精神。實現中國的民主政制需要大批無私者去奠基，而民主的準則更需要無私者去奉行。抱着投機的目的搞民運絕無出路，必被歷史所淘汰。我們永遠不做政客，更要時刻防止政客作風的侵蝕，因為我們畢竟是游泳在政治的浪濤裡。

現在，中國民聯尚無權無勢，已有人在警告它不要重蹈國共兩黨的覆轍。可見中國的政黨之爭和專制制度所帶來的後果是何等慘痛，留給人們的記憶是何等深刻。中國民聯應從嚴酷的歷史中汲取教訓，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我認爲每一位民運盟友都能經常考慮自己要向民主運動去奉獻些甚麼，而不是想通過搞民運而使自己獲得一些甚麼，那麼，中

國民聯的自身民主化就有了思想基礎。

二、不要機械地套用 而應科學地借鑒

民主既是民運追求的目標，又是民運運作的手段。當今世界上對於民主的涵義有各種解釋，而所謂民主的運作方式更是五花八門。中國民聯應如何在實踐中實行民主，我的意見是不能照搬照學，而要科學地借鑒、吸收。

民主的運作應是有理性、講道義、合情理、順民意，以平等為前提。民主又不是無原則的忍讓與苟合和不現實地包容一切。

美國的蒙代爾和里根大唱對台戲，但他落選後却與里根彼此道謝言歡，體現了政治家的高姿態風度。然而，他與里根在辯論的過程中，互相指責和批評對方的當時，並不顯得那麼「包容」，甚至未免帶點「專制味」。關鍵還是里根不像中共那樣將他的政治對手打成「反革命」，要對他進行「專政」（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否則，又不知蒙代爾會有怎樣的「風度」。

對於一個民運團體或個人，運用民主的分寸或廣度也與其自身的能力和條件有直接關係。俗語說「宰相腹中能行船」，這是形容宰相那樣權隆勢重的大官有包容量的。當然小民腹中不能行船（然而也非絕對），因為小民人微言輕沒有那樣大的包容條件。但是，不能就此結論宰相有民主風範而小民不講民主。

同樣，一個民運組織，在其弱小時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其民主運作的能量也必有局限性，所以，不能強求它具有一個民主的大黨甚至執政黨的民主運作水準。正如可以培養一個孩童去做摔跤運動員，但却不能用摔跤運動

員的水準來要求一個孩童一樣。當然，任何一個民運組織或個人都不應鬆弛對自身民主觀念的培養，民主運作的水準理應隨着組織的壯大而不斷提高。

民主又不是無原則的忍讓與苟合。一個專制的政權將你打成「反革命」，你要反駁；有人想在政治上扼殺你，辱罵你是「江湖騙子」、「政治娼妓」，你應據理辯解，因為這是維護你的正當人權，並不違背民主的原則。當然，反駁、辯解的方式可以有各種。

我們要主張公平合理的政治競爭，但「公平合理」要表現在各方而不是表現在一方，自己一方的沉默與忍讓不能體現民主也無法表現公平。循循善誘的解說固然是良好的民主運作方法，但有針對性的據理批判也是必不可缺的民運手段。

任何一個民運組織或民運者，辦事、講話，都應首先考慮是否能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基本點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事物中，民主運作要從大節着眼。過份地拘泥小節、糾纏瑣事會束縛自己的手脚、削弱民主運作的力量。

民主是一種神聖的權利，應為全民所共有。民運組織或民運本身在民主運動中也應學會維護自身的民主權益。放棄或減弱了自身的民主權利，不能有效地進行民主運作。

中國民聯現時所處的環境、地位不同於一切民主國家的政治團體，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處境。我們要根據自己所處的主客觀條件在民主運動的實踐中加速自身民主化。我們一定難以避免地還會走彎路、犯錯誤、做蠢事，但要努力控制到最少的程度。祇要我們時刻想着祖國與人民的命運，想着我們是中國民主運動而獻身的一群，我們的道路就是光明的。■

● 文藝園地 ●

又一次送別：站台速寫

火車正七點二十分開
站台上碰碰撞撞擠滿了過客
我就這樣送你、母親
爲了能回味那淡淡哀愁中的悵情
那盞燈太刺眼了
我害怕它會漏進我幽邃的夢境
雙腳踏在硬梆梆的水泥地
無數輛行李推車咕嚕嚕從上壓過
「一路小心，多多保重了」
「……那封信就在黃昏前發出」
「我會在中秋夜久久凝視清輝的月亮」
「院子裏微濕的梧桐葉常常去掃」
你抬腳踏上列車的台階
留一個背影吸收着視線
轉眼；汽笛響了，喘息的節奏敲擊路軌
我拾檢起淚珠，想回家給母親看自自然然的微笑

黎明

黎明舉起晶瑩的酒杯
把夜傾倒在大海裏了
悠悠波濤吞沒着時間、魚群
柔和的曉風兜蕩輕吻從芳草上滑過
帶着殘夢的疲乏我投入你的懷抱
讓跑的弓步忽忽射向更遙遠的地平綫
縱然玫瑰色晨靄已抹醉微微搖曳的樹林
我仍在尋找着一隻鳥兒跳躍在胸膛啄食憂傷

（中國大陸詩人·歐洲）嵐之凝

不必爲民運悲觀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洲) 楊子江



在大陸民運被非法禁止，而國外民運剛開始時，就有人擔心出軌，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上期「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的文章出於關心，以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爲證，(一)大前提中國近代歷史，國共兩黨以民主爲旗幟走向專制。(二)小前提中國民聯是搞民運的。(三)結論：他是「經民主包裝的新型專制」。顯然，以這種命題作大前提，離開時間、空間和條件，所得出的結論是很成問題的，這樣看來，歷史只有走向頭路，在中國搞民運是沒有什麼希望了。

不奇怪，在中國舊社會老百姓也有兩種觀點，一是「勝者爲王論」，上至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下迄洪秀全的農民革命，都曾經稱王，其中如朱元璋更建立明朝帝國，他們莫不說替天行道，爲民請命，實際上還是治民。一是「以暴易暴說」，說誰一旦掌權就會欺負人民。但是，儘管歷史上有過大量的事實，但比之今天就變化啦。如果把眼光擴大到世界，近代英法民主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他們建立民主自由社會的基礎相當深厚，誰也不懷疑他們是高舉民主旗幟走向民主。

能說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的目的不是走向民主嗎？否，不能夠這樣說，辛亥革命後

，社會的確有過民主自由新氣象，但長期受軍閥割據，外敵侵略，國民黨也有專制、獨裁的醜惡一面，以致退守台灣。但在今天，相對地說他爲形勢所迫，那裏政治民主、經濟自由還是趨向點滴進步。

現在，我們都認識到，以馬克思理論爲指導的東方社會則尤有不同，它排斥民主的原因，是明顯的，(一)鼓吹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濫用國家機器鎮壓人民。(二)主張暴力革命，「槍桿子裏出政權」，各級領導多是軍隊出身，習慣強迫命令下面服從。(三)在「國有化」的基礎上，形成龐大的官僚特權集團。(四)黨的絕對領導，組織上的「民主集中制」，書記掛帥，權力集中在主席身上，家長式統治，「一言堂」。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在大陸爲擺脫困境，推行經濟自由化的同時，仍堅持「四項原則」，政治上強化專制。如不改變，怎能希望他民主呢？

共產黨國家，向來對人民不民主，對黨內鬪爭十分殘酷，列寧、斯大林把不同意見者，以帝國主義走狗、資產階級黨內代理人、暗探特務等罪名鎮壓；毛澤東用走資派、叛徒、內奸、反革命兩面派、修正主義者罪名打倒。而斯、毛最後也自食惡果。

歷史教訓，中國民主運動要多元化，要承認國共兩黨，多黨派民主競賽，民運組織內部運作也要民主，都是必要的。

民運在多元化之中，民聯和中國之春不過是新生事物之一，有時幼稚見笑是不可避免的，希望人民像母親一樣，不要因孩子跌跤而不讓他學走路，或咒他早日駕鶴西去。倘擔心會有個別白衣秀士之類的，我們既相信領導，也相信人民群眾的思想水平和鑑別能力，民主潮流是勢不可阻擋的。

論「民運者不坐天下」

(中國大陸新移民·加拿大) 鍾 衡



文章與 現實的 差距

中國之春總二十三期，今之鳴先生「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一文，給我很大的感觸。他總的精神，我是贊同的。過去，我都是把民主運動和革命鬥爭聯繫在一起，以為如沒有專制制度作對立面，何來民主運動？既說要以民主去取代專制政權，則一向唯我獨尊的舊勢力，豈肯甘心退讓？再聯繫古今中外的歷史，不經暴力流血及權勢壓迫，舊變新，邪轉正的交替又怎能實現？至於革命元老由革命先驅轉變成專制的守護神的悲劇，我從來沒有想到。今先生給民運朋友敲的警鐘是很必要的。

但今先生從而要求民運者須確認幾個觀點，之中有一個是：「可以有打天下的思想，絕不可有坐天下的思想」這我就再也想不通了。誠然，在理論上，真正為國為民的革命家，是應有此抱負和修養的。但在實踐中，那些頑固的掌權者和民運隊伍中的政治投機家却不客氣。他們或在形勢不利時，以退為進求自保；或在競選中，巧言令色以騙權。等到他們已「穩坐天下」，大權旁落的真正民運者，辛辛苦苦幹了幾年以至幾十年，民主依然成為泡影。最實在的例子是辛亥革命的孫中山，他倡導

三民主義，和求名位的崇高情操，完全吻合今先生的要求。然他致力四十年的結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

今先生另一說：中國民運實質是對付共產黨。他說民運者不應打消滅共產黨的主意，主張只能做到黨權轉移到人民手裡、或黨權逐步被人民力量制衡。為說明這個可能性，今先生批駁了「不可能」、「了無期」、「不徹底」三種論調，其主要根據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在理論上，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對。但我再舉一個實在的例子：一九四六年，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戰爭勝利的形勢下，我國民氣高漲，民主的美國當時具有左右蔣介石政府的力量，以共產黨為首的在野的民主黨派也頗有氣勢，人民對民主要求的覺悟也很高。「潮流」不可謂不强，而蔣氏獨裁政權却没有被制衡，國民黨內的頑固當權派一點也不考慮把黨權轉移到人民手裡，他們在被迫召開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後，便立即派遣特務毆打各黨派的代表，悍然撕毀協定，導致三年內戰，終於敗退台灣。至今將四十年，雖經台灣人民不斷努力爭取，黨權仍凌駕民權之上。

轉過來看今天的共產黨，儘管今先生說他已起了很大變化，而且相對地弱了。但比那時的國民黨，恐怕還要強得多。起碼：(一)當年還有的確獨立存在的民主黨派；(二)還有合法出版民辦的報刊，反對黨中共的新華社還能公開活動；(三)雖有白色恐怖，但抨擊當局錯誤的輿論，群眾還敢表態支持；人民上街遊行是要冒性命危險，但執政者還不能隨便以此入罪。

偏安一隅的國民黨，尚且抗拒「歷史潮流」四十年才稍有改進(？)；而雄據大陸、稱強於世界的共產黨，又要再過多少個四十年才肯對「潮流」讓步呢？

今先生主張民運者絕不可有坐天下的思想，實質和當年中國共產黨內陳獨秀的主張類似。不能想像只要經過民運者鼓吹一輪之後，由原來的專制者或假民運者「坐天下」就會按照民運的道理去辦事。又是活生生的實例（今先生文中也提到）：如魏京生、王希哲……等很多有為的青年，只為發表了一些獨立的政見，就被莫須有地長期監禁；而殘害人民多年的極左思想及其祖師爺却一直被「小批實保」，他們的死幫，人民恨之入骨，雖已名為被判死刑，却十分仁慈地供奉起來，耐心地等待其悔改（?!）。……還有更多，不勝枚舉。問題在於槍桿子和印把子都牢牢握在專制者的手中。中國的政治現實和「歐美也存在着大量由封建專制相對地和平演變成民主政制的史實」（今先生文中語）畢竟是有本質的不同的。

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民運者想到要消滅共產黨。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的兩個大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一樣，他們有光榮的歷史，他們本身都擁有符合民主運動的積極因子，他們內部也產生民主和專制的鬭爭。他們絕對有權在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舞台上繼續扮演他們的角色。但我認為今天的中國民運者，必須明確宣稱要消滅毛澤東式的共產黨和蔣介石式的國民黨，並堅決爭取合法地組織比他們現在更符合人民利益，更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各種政黨，和他們競爭「坐天下」！或在「天下」平起平坐，共同商討從政治民主化到軍隊國家化；再從軍隊國家化保證政治民主化的大計。

因為，坐與不坐天下並非關鍵，主要的是槍桿子。任何政黨擁有武裝，民主運動要想和平地步向民主，永遠只能是一廂情願。民運者即使發誓說「絕不想坐天下」也是不容許存在的！

● 文藝園地 ●

無聲集

為那些我永遠 愛着的人們

艾菲

不要說，你不認識我
你看見了嗎
枯井的壁上
那混濁的水滴
不要說，你不認識我
你看見了嗎
死去多年老樹的根上
那潮濕的青苔
不要說，你不認識我
你看見了嗎
倒坍的墓碑旁邊
那顫抖的蒲公英

在海那邊（七六一八一）

(一)
在寂靜的夜裏
你可聽見風在訴說什麼
在荒涼的海灘上
你可看見雨在寫着什麼
在我的眼睛裏
你可曾發現了什麼
在我的靈魂深處
你可曾知道些什麼

(二)
有誰知道我的痛苦
又有誰能理解我的痛苦
我俯視這可怕的深淵
這是人生坎坷而漫長的道路
誰能告訴我何叫幸福
誰能指明我的去處
尋找幸福
我仰望蔚藍的天空
那渺茫而神秘的去處

(三)
假如我是你的安慰
我在我的歌聲中輕輕入睡
在你美麗的面龐上
我看到幾滴幸福的清淚
拋開那些往事的回憶
用不着痛苦
也用不着後悔
不論現在，或是將來
你都是我親愛的小妹妹
即使有一天世界末日來臨
一切都在火山的熔岩中坍塌
崩潰
你仍然可以看到一縷青烟
從那廢墟上冉冉起飛
那就是我愛情的精靈
在把你尋找
把你追隨

（未完待續）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北京大學生醞釀

更大的抗議活動

北京大學生舉行的「九·一八」大示威，震動了中共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後，決定由李鵬等出面進行安撫。表面上是安撫，實際上是通過各級黨組織對學生實行高壓。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及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對來自上面的高壓極爲不滿，醞釀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面對學生不服壓的形勢，中共中央政治局擬由官方出面組織，在即將到來的十二月九日，舉行大型的「一二·九」紀念集會，以此緩解學生們的不滿情緒。然而，大學生們對官辦的集會根本不感興趣，他們要求的，是能夠表達自己心聲的集會和遊行。爲防再次「出事」，中央要求各校黨委向大學生做「思想工作」，千方百計地阻止大學生們在「一二·九」紀念日自發地組織活動。

大學生們氣憤地說：「現在簡直還不如國民黨時代，國民黨統治時，大學生們還能自發地舉行『一二·九』式的示威遊行，頂多被水龍頭沖沖就算了。可是今天，我們連自發集會的權力都沒了，憲法豈不成了一紙空文？」

現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暗中展開「一二·九再見」活動，大家說，「一二·九運動」

時代的集會遊行自由沒有了，現在祇能與「一二·九」再見，意即請大家抵制官辦的「一二·九」活動。

北京的大學生們正在積極醞釀着新的抗議活動，讓我們支持他們，做他們的堅強後盾。

中國民聯在亞里桑那州 舉辦演講活動

由中國民聯美國亞里桑那州聯絡站積極推動，中國民聯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在亞里桑那州圖桑市和鳳凰城市舉行了演講和座談活動。

十一月六日晚，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在圖桑市亞里桑那大學以「留學生與中國的民主前途」爲題舉行演講，一百餘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留學生和當地僑胞出席了演講會。王炳章在回顧了中國一百多年派遣留學生的歷史後指出，近代中國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留學生書寫的。孫中山、蔣介石、宋子文等留日、留美學人，創建了國民黨。而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等留法學生以及劉少奇、王明等留蘇學生則成了共產黨的骨幹。

王炳章說，中國派遣留學生，是爲了趕上世界先進國家，向外界學習。然而，學習人家

什麼，却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清末洋務運動時，張之洞、李鴻章等人主張學習外國的「船堅炮利」，但反對引進先進的社會制度。歷史已經做了結論：舊洋務運動失敗了。今年，鄧小平似乎正重蹈舊洋務運動的覆轍，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和管理方法，但不能動搖「四個堅持」，不能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歷史的發展將證明，鄧小平的新洋務運動是行不通的。

王炳章強調，要使中國成爲現代化的國家，除引進先進的科技外，更重要的是學習現代多元民主社會的人權觀念，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法治精神。爲了將這些學到手，就必須深入西方社會，丟掉原有的思想框框，體會西方社會的各個層面，關心外國的政治活動，並從民主社會的傳播媒介汲取知識。

王炳章希望留學生們將多元民主社會的先進人文思想傳入國內，爲促成中國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貢獻力量。

演講後，展開了討論，王炳章回答了聽衆的問題。

十一月七日，王炳章又與亞里桑那大學的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進行了深入座談。晚上，王炳章參加了亞里桑那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舉辦的電影晚會，給留學生們送去了近兩期的中國之春雜誌。

十一月八日，王炳章抵達鳳凰城，與亞里桑那州立大學的部份台灣留學生舉行了座談。在訪問亞里桑那州期間，王炳章還與當地的中國民聯聯絡站研究了民運工作。

林希翎赴台灣探親訪問

一九五七年被中共打成右派、至今未獲平

反的林希翎女士，最近赴台灣探親訪問（她的父親在台灣，已患癌症）。在台灣訪問期間，林希翎會見了各界人士，發表了很多獨特的政見。林希翎這次赴台，一再聲明自己不去做「反共義士」，國民黨同意了她的這一要求。她赴台期間，正值台灣選舉活動，她應黨外之邀進行了多次演講。林希翎在一系列演講中，既批評共產黨，又批評國民黨，被稱為「左右開弓」。由於她的言論不為國民黨所悅，在她赴香港稍作停留，又申請返台時，遭台灣當局拒絕，即將在台出版的她的「一本選集」，也遭查封。

林希翎女士於一九八三年九月被北京當局批准赴港探親，後被法國接納，在法國社會科學院做研究工作。

「野草」出版七月號和九月號

由中國民聯國內某市第五支部出版的民刊「野草」，一九八五年七月號和九月號已經出版，并轉到中國民聯總部。由於國內某市政治情況不穩定，「野草」已經不能按月出刊。但是，編輯部的同志們仍克服了重重困難，將國內唯一的政論性民刊「野草」堅持了下來，目前為不定期出版。

「野草」七月號的要目為（括弧中為著者）：

- （一）改革的回潮（肖平）
 - （二）物價與工資（吳丹）
 - （三）小報的大掃蕩（周藍蓀）
 - （四）非政治化時代的特色——北京球迷的騷亂（張劍平）
- 「野草」九月號的要目為：
- （一）第N梯隊——人治的長鏈的伸延（

肖平）
（二）特區危機——改良路線固有矛盾的暴露（張子良）
（三）從「黃禍」到「黃潮」（李原）
中國之春雜誌將轉載「野草」的部份文章。

北京再度發生愛國大示威

北京大學生「九·一八」大示威被壓制後兩個月，再度舉行震驚中南海高層的愛國大示威。十一月二十日，數百名北京的大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高呼愛國口號，高唱國歌。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是這次愛國示威的組織者。他們散發傳單，沿途向群眾講演。

遊行的直接理由是慶祝中國女排擊敗日本隊而蟬聯世界冠軍，同時慶祝中國圍棋隊首次戰勝日本隊。但內情人透露，大學生們示威的真正目的，是宣洩他們對官方媚日政策及壓制學生政策的不滿情緒。

天安門廣場的警衛用擴音器向示威的學生們喊話說，北京市政府已下達禁令，禁止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活動，并要求學生們解散。但遊行的人群對喊話置之不理，大家燃放鞭炮，載歌載舞，示威約持續了二小時。整個活動進行順利，無人被捕。

中國民聯無錫站成立

中國民聯最近在國內江蘇無錫市建立了聯絡站，這是在該市建立的第一個民聯組織。無錫聯絡站由知識份子組成。

在國內建立民運據點，是民聯的重要工作內容。當前的建點原則是「小而多」，即：每個點的規模要小，以防洩密；點的數量要多，

遍及各省。當政治溫度適宜時，這些相當於「醃」的民運據點，像酵母發麵一樣，將迅速發揮作用。

民聯二大代表已經選出

參加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底在美國召開的中國民聯世界二大的各地代表，已全部選出，并上報大會籌備處。各路民運積極份子將會集一堂，共商大略。中國民聯香港、日本、巴黎等分部和支部，在選派代表時，都自覺運用民主程序，不管當選與否，大家都心情舒暢。

預祝民聯二大成功！

徐文立獄中手稿引起廣泛注意

西單民主牆運動期間的著名民運領袖、原民刊「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的獄中手稿原件，最近突破北京第一監獄，越過重洋，安全轉移至中國民聯總部。

中國民聯總部將徐文立手稿偷運出國的消息及有關資料通知中外傳播界後，引起了廣泛注意。具有極大政治影響力的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十月十三日刊登專文，介紹徐文立冤案和其獄中手稿。合衆國際社在同一天，就徐文立手稿偷運出國發了長文專電，詳細介紹徐文立披露的中國監獄及司法黑幕。國際特赦組織、東亞人權協會等人權團體，對徐文立的手稿也極為重視，有關刊物將詳細報導。

中國之春於廿九期刊登卅期即將發表徐文立獄中手稿的重要預告後，引起讀者普遍注意，一些讀者準備捐款，幫助徐文立及其他尚在獄中的民運人士的家屬。

魏京生

他的妹妹與女友

李慧娘

(中國之春)駐歐特派記者／陸明

魏京生！又是魏京生。他最近怎麼樣了呢？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費凝君的父親是中國公安部的高級幹部，蒙他今年暑假回國打聽，「……魏京生是廢了！就是今後放出來也沒有多大用啦！」費君講了一些他所知道的情況。另外，法國漢學家「木人」君，也向我述說了魏京生女友鮮為人知的近況。

魏京生的精神狀況和身體狀況都極差。起初，他在監獄中是寫、罵。後來他常常痛哭（顯然是由於孤獨、思親與忿忿不平及憂國民之

原是美術學院的學生，魏京生被判刑之後，魏京生的畢業分配受到了不言而喻的影響，被分配到西北的青海去教小學去了。魏被判刑之後，雖然魏的父親一再向黨組織和警方聲言：「與其子政見不同。」但仍在離職之後「冷藏」起來了。魏京生的女友××，原是藏族人，魏京生初判之時，她曾堅持了一段時間，但最終仍和一個德國人結婚了。那個德國男子是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官，他對魏京生及其女友抱有深深的同情，他對妻子說：「以我的愛情來同情和支持你們，你還可以繼續愛着京生！」

心）。兩年之後，他逐步變的憂鬱起來，常常一個人望着天發呆，這種狀況一直發展到明顯的「痴呆症狀」才引起了獄警方的重視，後經上報公安部勞改局，才決定給魏做一次系統的身體檢查。（檢查結果不詳）只從一個勞改局的幹部那裏聽說：魏現在又瘦又呆，精神已經崩潰了，……據說這個人的人格（指魏）本來就很偏激嘛！……」

……也許到了釋放魏京生的一天，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具活屍了，可悲呀！魏京生有一個美麗的妹妹，名叫魏姍姍，

結婚前，××流着眼淚對魏姍姍說：姍姍！我不能等了，我的爸爸被以「叛亂」為名關押了十八年，母親、哥哥和弟弟都被抓了，我在等待中過了前半生，難道我還要再等一個被關押無期的丈夫嗎？

是的！我們不應當用封建烈女的標準來要求一個現代女性！她應當結婚，應當有人愛，有人保護，否則她會成爲另一個悲劇。

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和一個悲劇的國度裏，每一個政治烈士仁人都會面臨一場愛情的悲劇，北京民刊「今天」的戰士劉念春刑滿出獄之

日，妻子已經與他離了婚，河南省開封市的民刊「無名」社創起人陸潤洲因不堪政治審查和妻子的離異而臥軌自盡了。許多搞民運、學運和新藝術運動的人都是孤獨的生活着，並非由于「商女不知亡國辱」，中國社會培養的女子大多質弱，又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中，男人個個都還是唯唯諾諾，談何女子之勇！在這一點上，魏姍姍倒是有幾份爽氣的，請看她一九七九年在悲憤中所作的圖畫「李慧娘」。詞云：

月慘淡，
風淒涼，
白露冷冷寒，
蟄哀鳴。
俺無主的冤魂漂泊難尋，
似斷線的風箏。

也飄到了「集芳靜院」。
但看流螢，
落葉掃空庭，
數着星星，
聽着漏泉。

悲哀、冤情、無望而幻想超脫，這正是多少代以來中國社會悲劇人物們的內心境界。可憐的中國人民，太溫文而又太纖弱了，誰能是你們可依託的「主人」呢？只有自己堅強起來，任何自稱爲可靠的「主人」都是不可信的，莫數星星，莫聽漏泉，却正該像畫中的李慧娘一樣，拿起復仇之劍，向專制制度和那些有「權霸狂」的人刺去。（當然這種硬性是氣質上和意識中的，並非煽動中國女子去拿刀殺人）。魏姍姍從那時起已開始去教堂了，希望冥冥之中那公正的「神」能保佑她，保佑她的哥哥並希望哥哥也信神。愛心、復仇和再傳播永遠是需要的。請保佑！請行動吧！阿門！

「瘸子」與「太子」

鄧樸方協助馬德生出國記

(中國之春)駐歐特派記者 陸明

殘廢的藝術家馬德升久想出國體察西方現代藝術意識，雖有很多漢學家、外國藝術家及藝術院校邀請，無奈北京市公安局長期阻撓刁難，每一次馬德升拄着雙拐去警察衙門問訊，總是遭到對方沒好氣的回話：

「你還想出國？也不……」

「是不是已經死定了不讓我出國？」馬德升問。

「你當然可以這樣理解！」

馬德升沒有問爲什麼。在當代中國警察那裏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中共已把實際的立法權授給了每一個中國警察，他們說誰沒理，誰就準不能「有」理，否則就說誰「態度惡劣」而罪加三等。正是這批無所制約的警察，在若干年內，鎮壓壞人的同時也欺負百姓和知識份子，使得人民對這些「警察」厭惡之極。說一句坦率的話，中國共產黨的威信，有一半是這些警察敗壞的。特別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他們在「四五」運動中，在「北京之春」民主思潮運動中，在北大的學生民主運動中，和歷史上一切反動警察——如鎮壓「五四」運動的北洋警察、鎮壓抗日進步學生的反動警察，甚至可與明清時代的宮廷「錦衣衛」一樣，扮演了鎮壓民主新思潮的反動角色。

今年夏季，「中國殘廢人福利基金會」副主席鄧樸方應邀到法國訪問，一向對中國現代民主及藝術新思潮熱情支持的法國漢學家們，利用各種機會向中共的各種實權人物推薦中國當代政治、藝術青年人物。特別是馬德升，他在中國當代藝術界和思想界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不幸的人生命運剝奪了馬德升身肢的健全，貧困的家境沒有使這個殘廢兒受到充份的教育，動蕩的時代更爲這個畸形兒刻劃了一種「冷」的目光。於是，在「社會選擇」和「自我選擇」下，馬德升成了一名獨特的「藝術家」。雖然這頂貴冠並不爲馬君及大陸名家藝術人們所認同，但在唯一「名」是「抬」的海外却是這麼稱呼起來了。

和「星星」的其他藝術「家」一樣，馬德升的藝術手法及藝術觀念在國內并無太大的市場，百姓與「院校派」都對之「冷淡」。就藝術領域來說，這本是不奇怪的事：各種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去尋找知音！但在藝術空氣與思想政治空氣一樣保守的中國大陸，這實在成了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怎麼能夠容許這種不是『藝術』的『藝術』在中國這塊『社會主義』淨土上生長呢？」恰如中國歷史上一個故事所云：某花匠謂另一草圃的花匠曰：「花

圃焉能容草？」豈不知世上萬花萬草各有愛之人，花本是草，草亦爲花。藝術這種東西亦然，李爽的剪紙畫，王克平的「天然木頭」，還有馬德升君的「墨疙瘩」抽象畫，說句坦率話，連筆者本人也不欣賞。然而，和任何傳統的東西一樣，藝術的傳統觀念與手法也會形成一種保守與老化的勢力，這種勢力與窒息社會的傳統思想觀念、道德觀念、宗法觀念聯成一體，就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的束縛作用。中國大陸近年的「老人政治」實際是與「老人藝術」相輔相成的，一切都是「老×家」的天下，畫家、作家、藝術家，逢「老」逢「名」就「吃香」，甚至「蔭及子孫」。這樣一個保守的社會，實在需要千萬萬個馬德升、魏京生來打一打、破一破。

在一個特權具有極大影響作用的國家，鄧樸方這樣的「太子」式人物正可發揮其特殊的作用。正巧，鄧樸方又是專管馬德升這類「瘸子」的親王官，於是馬德升的出國問題就得到了小鄧的關注。

經過這批漢學家的「沖掇」，鄧樸方回到北京後，就與公安等有關部門進行聯繫，果然「權能通天」，幾天後，馬德升就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出國」通知，而且那一向是「吊」着的「臉」，馬上都變成了「笑」臉，其中原委不言而喻。

一九八五年十月，馬「瘸子」一拐一拐地登上了中國民航的七四七飛機，臨近海關之時，那些關「官」們又慎重地將馬君的畫「參觀」一遍：

「……這個，是女人的屁股，……：：：：：！又是一個墨疙瘩：」在確定沒有盜竊「偉大祖國」的寶貴文物和帶出有損國格的「污染品」之後，終於讓馬登機離境了。

期待春和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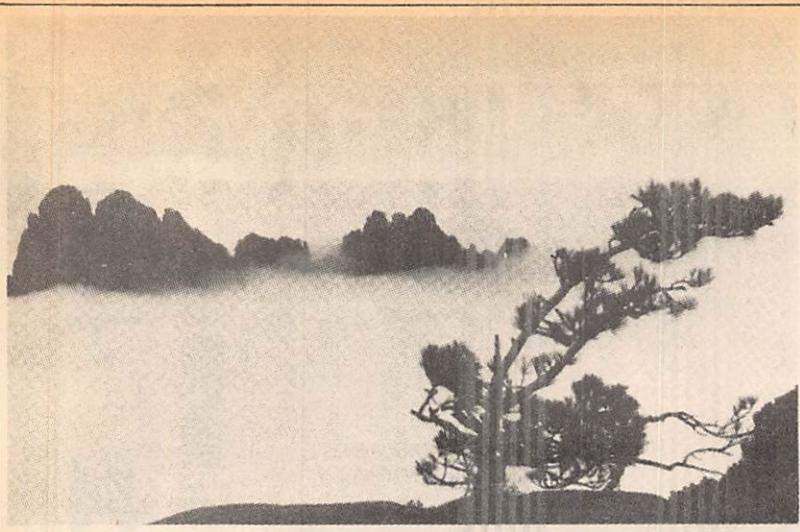
——憶戰友文立

我不是空想家，我認為我是切合實際的理想主義者

——聖雄甘地——

柯力思

作者簡介：柯力思，男，中國大陸留學生，學習自然科學。柯曾在西單民主牆運動時期與徐文立長期共事，出國後投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文立啊！奇變不息的黃山雲海曾是你想望中的仙境，可你何日才能身臨其境呢？

天晴朗得出奇，排雲亭竟見不到一片遮攔谷底的雲，始信峯外奇秀麗都映入眼底，十二月初，霜凍的松針透着冰樣的銀芒，使翠綠的老松更添晶亮。我走在黃山頂上，不禁想起文立，但覺悵然、孤單和不忍……他曾邀我和他一家三口共踏這天下第一名山和他的安徽老家，而今他失去原就少有自由的自由，三年多了，却獨自個兒享受這晨光暖暖的大自然美景，於心何安？唉！

自然、社會、人

回想我們在一起的日子，雖是為實踐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相識，使我們比肩前行，但聚論時政的時候實在不多。而是友情，以心交心生死不渝的友情，使我們凝聚。我們常常談到夜深，談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命的意義、生活的情趣、人的悲苦歡樂，這樣一些「不革命」的繁瑣雜碎。他常述說足跡所到的山川城鄉的人物、風情，他不僅喜歡和當地人攀談，了解他們的生活，不僅喜歡觀察各地社會的動態，並且他是那歷地愛自然、欣賞自然、陶醉在自然裏。也許是他對自然的虔信，使他戾氣化

去。在商場、在街上、在公共汽車上，到處可看到人們為了一點小事爭吵、幹架的年代，像他遇事和和氣氣耐着性子和人講情由擺道理，總顯得篤定心平的人，真不多見。是啊！一個不能體會自然之神偉的人，如何能懂得「人」的孤獨、渺小、無助，從而由衷地熱愛他的同類，要在自然、社會、人三者之間不斷地探索，尋求彼此和諧之道？想及此，我稍稍感到釋然，只有多照幾張山貌風光，讓彤嫂帶給他，讓他這一直沒有相機的攝影愛好者，在鐵窗裏從照片中略窺他所熱愛的自然吧！

斑斕的秋末

十月的北京，醉人的金黃，六年前，星星美展遊行、人大學生新華門前靜坐示威、民主牆連綿兩百公尺的大字報，牆前不時出現人群圍睹的即席演講，像秋色般燦爛的同時，也給人一種剝脫、凋零、肅殺之氣瀰漫的感覺。『四五論壇』例行編輯會議在文立家召開，我循址找到白廣路，進屋時裏邊已坐滿了人，三三兩兩的在愉快地交談著。見著我這生面孔，主人迎了出來；瘦削、白哲、中等個兒，眼珠子



踏上黃山，遙望勁松，我不禁想起文立，我有些悵然、孤單和不耐……。

►徐文立一家。——柯力思攝



神采滾動，說話不急不徐、清晰而稍帶南方口音，隨和、好客。我們寒暄一番後，會議就開始了。主題是：公佈魏京生案件審判過程錄音稿；討論非常激烈，爭論的焦點不在於贊不贊成油印出版，而是，要一字不漏都登或只擇要摘登和如何避免公安局干涉、捉人的技術問題。建偉成爲爭辯的中心，他雄辯、激動的言詞很具有說服力。他認定要忠實地把錄音全文刊載，並自己一個人包攬所有工作，這意味着承擔一切後果；兩個多星期後，他被拘留，從此失去音訊，直到八一年春，看到他的獄中手稿「沮喪的回顧與展望——我向社會法庭控告：……」，才知他所受的苦。

友誼的火花

會議開到十一點多才完，已沒車回我住的地方，於是就留下來和文立毫無顧忌的談論開來。他認爲：公有制是不可能逆轉的，重新打破現有結構，讓資本案、地主復活，是不現實的；公有制不等於社會主義，只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充份享有管理權的公有制，才算得上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應排斥私人財產，當前中國還應開放一些企業讓私人經營；將來世界可能是東、西雙方互相妥協的混合式經濟；中國的變革非常迫切，但一切變革必須是和平、合法地進行。這次的深談，成爲我們密切合作的基礎；後來「共產主義者同盟」、「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討論、醞釀都順理成章，不過是交換些技術性問題而已。兩個第一次見面的人，不會通通信，也無中間介紹人，竟一點沒有保留，這在那時候是相當地冒險的；但是，猜忌得不到朋友，只有相互坦誠，友誼的火花才會迸射、激發。

三點多了，文立回到過道另一邊的臥房，一間六平方米大小的小房，三口人擠在裏面。騰出來作編輯部的大屋，約十一、二平方米；一邊擺着一張方桌；一邊一式兩樣的自製沙發隔着小茶几，牆上懸着一付對聯；一邊堆着油印刊物、白報紙、手推油印機和一張供熬夜的編輯同仁輪流休息的鋼絲折疊床；中間空着，常用來鋪寫大字報。我和衣睡在鋼絲床上，隔天醒來，文立已爲我準備好早點。

從此，我成爲他們家的常客。年節、周末，文立常親自下廚，做一手精緻可口的菜，邀我共嚐。北京家庭一般飯食較粗糙，彤嫂係北京人，自文立出事後，我再沒這份口福了。因此，我笑說：嫂子真有福氣，是不是文立天天做菜伺候？

愛，值得等待

我沒見過他夫妻倆紅過臉。彤嫂第一次探監，兩人一見面相擁而泣；文立隨即提出離婚的考慮。十五年，五千多個漫長的夜，文立不願就誤她的青春，不願她受「反革命家屬」的活罪。文立也知道，他的大哥與大姐都是共產黨員，早在他辦「四五論壇」時就和他「劃清」了界限；他被捕後，他們無隻言片語，甚至連問問這一對受苦的母女都沒有，連他母親，他們都阻着，那怕一封信也不讓她老人家寫。一旦離了婚，那就誰也不會來探望他了。彤嫂斬釘截鐵的回答：「我等你十五年！」後來，文立又提出一個所有中國丈夫不能容忍的建議：「彤，我不希望你過這種寂寞的日子，你還年輕，如果你不願意離婚，那麼你應該找個朋友……」

愛，這般的愛，才值得等待！

西單民主墻運動領袖、
原《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獄中著作

我的申辯

〈續〉

編者按：本期所載「我的申辯」的三至十九節，是徐文立就其童年至青年一段生活過程的憶述。憶述文字真切感人，同時也向我們展現了作者後來思想形成的脈絡。二十至五十七節將予下三期順序刊出。

無光的童年

我故鄉在長江中游，是個有名的碼頭——安慶，更具體一點可能是懷寧縣石牌鄉。

安慶的象徵是臨江寺和臨江寺的寶塔。登上這個塔，可以看得見對岸，和很遠很開闊的江面。塔有七層，至多五十米，到了頂層向下看去却能使入暈眩。膽量特別大的人，竟敢爬出頂層的小窗戶，站在陡峭的瓦沿上，去攀抓那盞照耀東去西往的航船的明燈。我不敢，可佩服這種人的勇敢。我祇是在十一歲左右，在這裏生活了近三年，尚未充份領略這歷史名城的風采，就匆匆離它而去了。

抗戰勝利在即的一九四三年陰曆六月初八，我誕生在抗戰的前綫——江西安福。當時，中國人都在盼着抗戰的勝利。加上，這天氣奇熱，有幸來了一場暴雨，在涼爽中我落生了。

。爸爸以順利為吉，給我起名叫「利」。我輩逢溫字，叫溫利。父親死後，伯父以為「利」者，貪圖小利也，主張改名為「立」，許是老人家勸我自立圖強。參軍後，沒有人肯按我的輩份，把我名字寫成「溫立」，而俗寫成「文立」。衆意難拗，這樣我才有今天這第三個名字：徐文立。

在我前邊，父母已經造就了七個孩子，中間早逝了三個。除了二哥長我四歲，其他哥哥都比我大十歲左右，大都在外地上學，偶然回來并不跟我這個小不點親近。

當我記事的時候，可能是五歲，家裏已搬到那個「環滁皆山也」的滁縣。對於江西，祇依稀地記得，家裏曾到過南昌附近，景色奇麗的桃花島玩過。

到滁縣，家住在縣裏的頭號大地主金家大院裏。當時的金先生辦一所鄉學，他自任校長和教員，近於免費的讓鄉親的孩子們上學，他

對佃戶的租子也不催逼，所以在鄉裏頗有人望。解放後，政府特別定他為「開明紳士」，子女也都在政府機關供職。長子曾隨彭總赴朝任英語翻譯，後又曾隨中國乒乓球隊，作為新中國第一個官方代表團的成員正式訪問了美國，為打開中美關係作了貢獻。

爸爸整天忙於醫院的公務，不記得他有過星期天。記得祇帶我們去鄰近的教堂和遠處的琅琊山玩過一次。也不知道媽媽她整天忙什麼，從不關心小孩子的心理需要，也不跟我玩，也不買玩具給我玩，我對於當時這個家，最有感情的祇有二件事，一是每天下午給吃一芽南式的月餅，總覺得很香，因為我每天這時也覺得餓了。再一件事，就是等爸爸回來，我給他拿拖鞋，然後可以參加他和媽媽，或和客人們的談話。我小，他們不背着我，有時我還能插上一、二句引大人們哈哈一笑的傻話，所以在家中享有這陪坐的唯一特權。

這大院裏，也沒有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和我一起玩。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種並沒有愛，沒有玩具，沒有友伴的無光的世界之中。

相反相成，這反而促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對愛、對玩具、對友伴十分敏感，有着異乎尋常的追求。

譬如對玩具。當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時候，我和妻子的工資都祇有三十幾元，加上各種補貼不過一共八十元出頭，孩子的哺育費至少花三十五元。就這樣我們還是要擠出一些錢，給孩子買些玩具，雖然達不到富裕人家的高水平，但也不低於中等水平。當生活有所好轉，更是如此。記得八一年初，我們住的樓房遭火災，孩子大舅從新加坡寄來一百元，我當即想到的不是添置什麼傢俱，而是全部用於給孩子

買了一輛五羊牌的小折疊自行車。我和我妻子都決心，自己再苦再難，也要讓我們的孩子，享受到我們倆童年都沒有享受到的一切樂趣。

童年的「朋友」

如果勉強要算朋友，在小時有過二個。

二哥有二次做過我的朋友。第一次，是在跑跳時，不慎摔斷了小腿，祇好臥在床上。媽媽怕他呆着煩，在單人床上套了一張長桌，讓我陪他下軍棋，我不會玩，他很讓着我，玩得蠻開心，他成了我好朋友。第二次，是爸爸死了，媽媽替班去了，每天我這九歲的小男孩作飯，作好飯之後，先到汽車車站等媽媽，等她回來炒菜，然後再到附近早已上了燈的新華書店裏，把二哥從書的迷宮裏叫回這個世界。他總誇我對家務事很能幹，但他自己又把時間忘了，向我表示一點無聲的自歎自責，使我很得安慰。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小時的朋友。

我小時的另一個朋友，叫李福根。我四十多年來，接觸過許許多多的人，能記住名字的，至多不超過幾十個。我很愛不知不覺地抹去不必記憶的事情。但是，這李福根的名字，并非有意，我却牢牢地記住了。他是我父親的勤務兵，實際上在我家作伙伕的工作。他很喜歡我，幾乎每天都要帶着我出去玩。他怕我走累了，走着走着就把我放在他那寬闊、堅實的雙肩上，我們常走到縣城去趕集，走過那座旱橋，他總喜歡買那種又鬆軟、又熱乎的芝麻燒餅給我吃，那燒餅的香味我至今不忘。他不怎麼跟我說話，可能我太小，不會和他對話，也許這位貧苦農民出身的老兵不苟言談。

一般孩子不是在父親的寬闊、溫暖的肩膀上長大，也享受過這種溫暖的寵愛，可我却從

未享受過這份幸福。但我從這位善良的老實人寬闊、堅實的雙肩上，享受到了這種溫暖。所以雖然我們並不怎麼交談，但心却相依着。他是我童年的朋友，一直到全國解放。也不知今日他還在人世否？又在何方？我想念他。

我這老朋友，當年的年齡可能有五十歲，爲了掙幾個微薄的軍餉，寄回去孝奉孤寡的老母。我真爲他這麼大年歲還當兵，還那麼窮而不平。

人世間的不平，在我幼小的心靈上，還會劃過一道更深的痕迹。

那就是金家大院不遠處的地棚。這棚呈三角狀，乾樹叉上搭着破席，蓋着草，難民們就祇隔着一層稻草，睡在地上。在有陽光的日子裏，難民們就脫下他們唯一的破棉衣，捉虱子，捉到放在嘴裏咬得嘎嘎響。這地棚雖不是年年有，在那十年有九年滂的黃淮流域，却是常見。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金家大院。濠縣是個小縣城，除了有琅琊山、醉翁亭這名勝之外，是窮縣，可金家房子却是西式的二層洋樓，有寬敞的大陽台，有許多房間，我們二大家子住，還空了許多。後院是花園，一個排球場。這在整個舊中國的鄉村，恐怕也是數得着的一等私宅。特別是到收穫季節，推着「江洲車」來交租子的隊伍，像條長龍，祇見頭，不見尾。這就是人世間的不公平，它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靈上。這對我日後的性格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我在日後的生活，稍見不平事，就極容易激動，一激動又往往難以平復，非要幹點什麼不行。

第一啓蒙人

我的童年幾乎全部是在戰亂中渡過，總是

搬家，我們家的孩子都從小練就了整理東西和網打行李的本事。

我也記不清上過多少小學，轉過多少次學，我從小沒有可以稱得上開蒙的老師。

我自認爲能算我人生的啟蒙老師的，是我二位早已去世的親人。

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外婆。

我爺爺奶奶在父親年輕時就已去世，與我們最親的隔代長輩就是這位孀居的外婆，我們都尊稱她「奶奶」，現在我尊稱她是「聖奶」。因爲她常說的那些極普通的話，却極靈驗、正確。過去，她對我們說，任何人不能夠看不起有各種難處的人。她說：不做姑子（尼姑）不知頭冷。是啊，事隔三十年，我這個囚徒總算嚐到了我母親四十做寡婦的艱辛，因而自責自己過去對母親的敬孝不周。

聖奶生長在農村，從小做農活，養成了她終生勤勞、善良、愛整潔的品德。年至八、九十也不肯讓別人替自己整理房間和身邊瑣事。她八十三歲還能不戴花鏡，爲她三個最喜歡的隔輩人作棉坎肩，我、小表弟、大表哥一個人一件。她年近九十的時候，還給大表哥照看過二個才一、二歲的曾孫。

她老人家最值得人崇敬的品德是極寬厚、極仁慈。在我和她共同生活的三年裏，從未見過她生別人的氣，也從未見過她讓別人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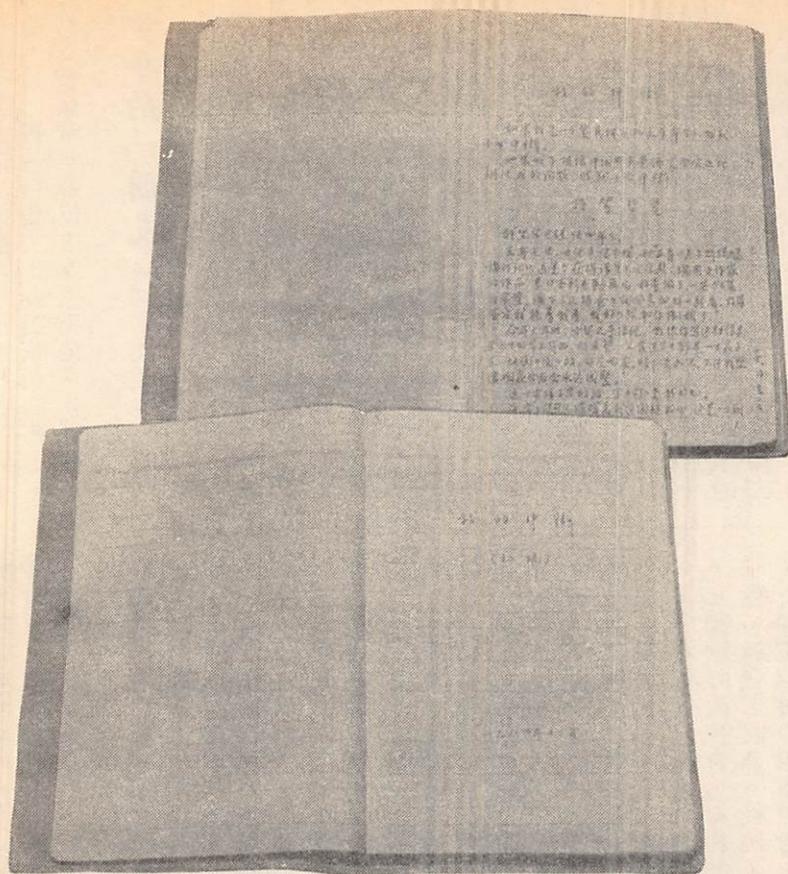
她嫁的是城裏望族胡家，即與名揚四方的「胡玉美鬻園」的胡玉美是家，姑嫂妯娌許多。據說，逢我外婆有了不舒服，出了嫁的姑奶奶們都專程回來幫她照顧孩子，這在那封建禮教甚濃的社會是不多見的。這就是她爲人的魅力和吸引力。

她一輩子生了十二個孩子，孫男嫡女，親戚朋友，從未有二人說過她的不是。她又不是

那類「和事佬」式的老好人，是非十分明白，常常調解糾紛，勸慰受欺者，批評欺人者。她總是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擺得公公平平，無不悅服，無人對她有所嫉恨。相反大家都敬她愛她，當她姪子得知她回到安慶，立即從幾十里外趕來接她老人家回家看看。她姪子五十多歲，又跛腿，讓他兒子推着「江洲車」載着姑奶奶，自己一瘸一跛、畢恭畢敬，在旁伺候，又行了幾十里才回到家。其誠其敬，我至今不忘。我也是那次平生第一次回到皖南的鄉間：那厚實的稻草覆蓋的草屋，屋頂上站立的那半

人高的五光十色的蘆花鷄，漂亮極了……她是年滿九十，得了子宮癌去世的。去世前，她極不安地對她一手照看大的孫女說：「奶奶這前世造的什麼孽哦，老都老了，得了這麼個病，讓你跟着受苦！」原來她不是爲自己的病痛難過，是難過要讓孫女每天爲她洗血褲，這是她從未有過的事啊！

她死的時候，她住的那條街的家家戶戶都送了幔帳和花圈，出殯那天，全街傾室而出。出殯的隊伍頗壯觀，行人還以爲去世了一位什麼知名人士哩，沒想到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



載有徐文立獄中著作「我的申辯」的筆記本。

上：「我的申辯」正文第一頁。

下：徐文立題在全文之前的「我的申辯—初稿」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字樣。

太婆。不！她不普通又普通，她就是中國式母親的典型。她就是她人生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正是她教我做人要寬厚、勤勞、善良。

我和她老人家生活在一起的三年，是我少年生活最愉快、最難忘的三年。我就是從她老人家口中知道了，中國推翻帝制的英雄們的業蹟的。她特別講過徐錫林的死。她說：徐錫林也算你們的本家了，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未遂被捕的。被砍頭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的身子，貼滿了紗布，騎着重鎗，走過安慶的青石板路，死也不肯低頭。聽說，對他執行的是叫「披麻戴孝」的酷刑，一片片連肉地撕下紗布，叫「凌遲」，然後才砍的頭，真慘哪！我都聽呆了。這就是我聖奶在我的腦海裏樹起的第一位英雄。

後來，她對我說過秋瑾，所以我的女兒也取「瑾」爲名，便是對秋瑾女士的崇敬和紀念，和對奶奶的深深懷念。

第二啟蒙人

我的爸爸堪稱我的第二啟蒙人。

爸爸青年時是熱血人，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不幸被軍閥政府逮捕入獄，家人將他保釋出獄後，遂即送鎮江上學。他畢業於鎮江醫學院，留任助教、講師。七七事變，醫學院向大後方撤退，他當時出於抗日的愛國熱誠，經同學介紹，棄教從軍，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在江西前線的野戰醫院任軍醫，因他醫道較高，工作負責，很快提昇爲醫務長，抗戰結束前昇任院長。在這次全民抗戰中，我們家獻出了三個孩子的生命，其實當時並沒有得什麼大病，祇因缺醫少藥，爸爸一心撲在工作上，即使任了院長，是凡大一點的手術都必由

自己親自動手，最長的手術能達六、七個小時，無暇照顧自己的孩子，又不肯隨便動用軍醫用品，三個都已三、四歲、五、六歲的孩子，就這樣相繼死去了。如果爸爸果真像後來「三五反」運動中，無端指控他是貪贓枉法的人，他身為軍醫院院長，我這三個兄姐是斷然不會全都死的。

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發動內戰，爸爸因此對國民黨大失所望，他多次拒絕參加國民黨，後來醫院國民黨特工利用一次開會，照全體相，突然宣佈所有照相的醫護人員集體加入了國民黨，這樣他才成的國民黨員，可能後來還硬性任命了他一些什麼職務。內戰爆發後，在反對內戰的思想指導下，爸爸在滁縣國民黨後方醫院任院長時，私自放走了二名剛剛醫治好的受傷被俘的新四軍高級幹部。我那時雖小，在旁聽他和媽媽的談話中知道的（此事需進一步核實——立註）。那時，他每天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坐馬桶，同時跟媽媽談話，幾乎每天都要罵院裏的特工搗蛋。有一次就談到那件事是如何遮掩過去的，那是朋友們多方幫忙，偽稱新四軍幹部是自己逃跑的，特工查不出我父親私自放人的實據，當時戰事日緊，還需要爸爸當院長，所以祇給了一個失職降銜的處分。直到國民黨軍隊全綫潰敗，大舉南撤時，爲了籠絡人心，才給爸爸一個少將軍醫銜。此銜并未實授，「文革」中我二哥無辜受審查，外調人員從敵偽檔案中發現，我們才知道爸爸是少將軍醫。爸爸私放新四軍幹部的消息，過去我們家人從未提過，我估計爸爸解放後也沒有提過，以免有邀功之嫌。可是，「文革」給人的教訓太深刻了，過去的歷史不論是好，是壞，都應實事求是地講出來，不然救人者和被救者都很容易被人蒙上不明之冤。

自從爸爸放人以後，就處處受到醫院特工的刁難、掣肘和監視，也促使他對國民黨更加不滿。一九四八年，爸爸醫院奉命撤退，本應迅速撤到福州渡海去台灣，後勤歷來先行，爸爸在一些部屬的支持下，清除了特工人員，遣散了醫治好的傷病員，故意讓醫院滯留在福建南平一帶，等候解放軍的到來。當解放軍先頭部隊一到，我父親就立即率領全院人員向解放軍三野投誠，並正式移交了全部野戰醫療器械和各種物資。他在解放軍部隊裏接受了一個月的熱情、真摯的款待，才回到家中。由於他當時對共產黨、解放軍缺乏深刻的瞭解，考慮到家屬多，不便隨軍，就辭了部隊首長的一再挽留，由他的老同學，當時任三野衛生部長的葉伯伯介紹到福建省鼠疫防治所工作，全家被安置在與福州西湖一水相連的著名的龔家大院居住。據說，這是一位前清御醫的私宅，耗鉅資仿頤和園的某些格局修建的。此院後改爲福建省的交際處。

解放後，爸爸對共產黨清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的工作尤爲敬佩和擁護，每天回家來，都要高興地給孩子們讀報紙上的新聞，不住地說這條好，那條好……然後與孩子們討論，我雖插不上咀，也聽得津津有味。在他的影響下，大哥一九五〇年主動放棄了投考大學，帶頭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的志願兵，在軍隊服役至今。爸爸當時也有顧慮，一是耽心孩子上了戰場，出三長兩短；二是考慮到大哥功課不錯，又是學生會主席，應該考大學深造。當大哥說，正因爲自己是學生會主席才應該帶頭參軍，保家衛國，他就毅然地同意了。現在回想起來，後來兩個姐姐在學生時代就入了黨，哥哥姐姐都能積極學習和工作，大學畢業後都成了科研戰線的骨幹人才；我也從小養成關心國事

的習慣，都是和爸爸的「飯桌政治」的薰陶、感染分不開的。可是沒想到，防治所在「三五反」運動中，僅因爲他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和舊軍醫，就毫無根據地把他定爲「大老虎」來打，被關到所裏，不許回家。說什麼「無官不貪」、「他當偽院長時一定有貪污」，他不承認就不讓睡覺，面對着大電燈泡烤，叫做「熬鷹」。他實在被熬不過，勉強承認有貪污，所裏就來人抄家，其實家中并無金銀財寶和貴重物品，他們就把我母親娘家陪嫁的金銀首飾、私房和一些稍微值錢的東西當贓物抄走了。所幸的是這股風很快被上級制止了，把爸爸放回來，也沒作什麼結論，抄走的東西也沒退還就不了了之了。爸爸雖覺得冤枉，但對於這一次受審查并無怨言，相反認爲，反對貪贓枉法這種精神總的還是對的。他又很愉快地接受了將他調至古田縣醫院任領導的安排，不久因福州防治所工作仍然離不開他，又調回所裏繼續任細菌室主任的職務。一九五三年初，抗美援朝臨近尾聲，可美國却把細菌彈投到我福建地區，爸爸奉命帶隊，赴閩南細菌彈受害區。他爲了儘快控制受害區，搶救傷病員和採集新鮮細菌樣品回來研究，率領十幾個醫護人員不顧大雨滂沱，日夜兼程。入閩公路坡陡彎急，多臨懸崖；閩江春風乍起，山洪翻滾。美蔣特務爲阻止他前往，狠毒地將救護車顛覆栽入溝澗閩江之中，爸爸與同車醫護人員總共六位一起不幸身亡，時年四十三歲，我才九歲。當時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親自簽發了追認爸爸爲革命烈士的證書（榕字〇〇〇〇一號）。可是，「文革」中一些人出於打擊、迫害老幹部的目的，又把我父親打成了「軍統」特務，取消了革命烈士的稱號，後經我們多方申訴，至一九八一年才得以糾正，爲爸爸恢復了名譽。

爸爸生前幾乎無暇照拂我，但他以短暫的正直、愛國的一生給我留下了最寶貴的遺教。

我母親對我的影響不大。她長得美麗端莊，很像我外婆，可惜我們姊妹們都沒能充份繼承她這一份遺傳。她很內向，性格堅強，樂善好施，她不像解放前那些閒着沒事幹的官太太，她不要打牌，年輕時也不怎麼到處去玩，偶爾看看書。我少年時，她祇是在一件事上，從反面給過我極深的啟蒙。那是在老家安慶，一天我和鄰居的小孩玩耍，吵鬧了起來，我受了點委屈，正巧趕上媽媽從外邊回來。她不分清是非曲直，就到人家吵鬧一頓。其實小孩吵架都是無謂小事，何況我也不對之處，可媽媽絲毫沒有批評我，一味的偏袒我。事後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過去媽媽關照我雖然少，但她在我的眼裏是完美的，我是第一次看到媽媽也會這樣厲害，甚至不太講道理。可怕的是，她讓小孩子看到了母性自私的一面，破壞了母親在我幼小心田中的完整性，我猛然感到與她有距離。現在想起來，她當時可能也有她的苦衷，唯恐孤兒寡母在外邊受人欺負，所以要厲害一點，可她忽略了另一面：小孩子也會思想。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形像是完美、崇高的，不要有意無意地損害它。這也使我懂得，在任何情況下，不能偏袒自己的孩子。

一樂即悲

老話說：「樂極生悲」。可我小時却「一樂即悲」，有二件實例。

四八年初，家隨着爸爸醫院南撤到了南京。夏季的一天，大人帶我去看電影，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電影。電影對於我這個鄉巴佬，自然很新奇，我才五歲，內容是不懂的，依然興

高采烈。好景不長，不到半場功夫，我這個在滁縣曠野裏長大的小孩子，開始受不了這影院的憋悶，恐怕當年也沒有冷氣和空調，我越來越不好受，不由地大叫：「我要吐！」攪得周圍的觀眾老大的不高興，家裏人祇好趕快抱我到休息室去吐。真是：一樂即悲。

無獨有偶。家剛剛搬到福州，伯父的朋友便高興地帶我去南台玩，那時騎自行車與帶人，我就坐在前橫樑上，坐得很累了，才來到南台。天色已晚，南台的燈火齊明，無數的霓虹燈閃爍着。哦，真好看，好開心，我竟然在車上手舞足蹈起來，車頓時失去了平衡，祇聽「啪」一聲，我、車、大人一齊摔倒在地，更不幸的是我的右腳丫被前護泥板划破了一個三寸長的大口子，深可見骨，我也不知痛，也沒哭，祇見血流滿地，到了醫院縫了二十幾針，一夜功夫血染透了墊腳的枕頭，至今我的右腳留着一個嘴巴大的疤痕，它時時提醒我：樂能生悲。

一場惡夢

我睡覺不愛作夢，但畢竟作過不少夢；「一夢斷難尋」，幾乎沒有記住的，但小時的一場惡夢却記住了。

那是剛到福州不久，住在龔家大院的時候。我家住在一個二層的中式樓房裏。此樓青磚青瓦，油漆彩繪，古色古香，大飛檐寬敞廊，室內屋高六米以上，一明四暗，檀木雕花間壁，樓前有假山、小橋、流水，不遠是主人家老

夫人拜佛的水中禪堂，遠眺可見秀麗的西湖。七歲的那年我出疹子，白天昏睡時，突見牆壁上一個人頭，瞬間，人頭越變越大，大得十分怕人，他手持一根大針向我扎來，我大叫

一聲「啊！」這驚恐的聲音喚來了所有的在家人，媽媽趕緊哄我：乖，不怕，媽在這兒。這時我心才定下來，媽問我怎麼了，我告訴她看見一個怪物要扎我，媽媽趕忙告訴我：那不是真的，是夢。說也怪，自從這夢過後，體溫也降了，身體也慢慢復元了，但這個夢却忘不了。

見義勇為的反遭殃

在我身上留下第二處傷疤的，還是在福州。當時我剛上小學，下午沒課，午睡之後，就從大姐手裏接過一個大西紅柿，站在門口一邊吃，一邊望呆。這時祇見一隻小狗很厲害地在追逐一群上學的小孩，嚇得孩子們狂奔，那小狗還緊追不捨。我忙從當時每家門口都有防空襲的「防火沙箱」裏，抓起一把沙子，就朝那小狗砸去，沙子剛剛出手，就不知從哪兒竄出一條大狗，撲向我大腿，咬了一口就跑，當我嚇呆時，那狗早已無影無踪，我便嚎啕大哭起來。大姐聞聲跑來，見我被狗咬，抱起我逕直往醫院跑。當醫生問我，咬我的狗是不是夾着尾巴的，并告訴我姐，瘋狗才夾着尾巴，人被咬後要得狂吠病的。可是我却說不清，這狗對我來說，幾乎是來無影去無踪。後來，鄰居們又說，要是讓瘋狗咬了，可不得了，肚子裏會長小兒，人要瘋，直想往牆上爬，嚇得我全家不知如何是好。那時爸爸又死了，祇好趕快請在福州協和醫院當會計主任的伯父想辦法，伯父找遍了全福州市大小醫院，總算找到了幾十針「狂吠疫苗抗清」。這倒霉的「見義勇為」，害得我屁股挨了半個多月的扎，一天二針，左右開弓，打得走路都走不了，以致日後一見打針就緊張得不得了。可是，我並沒有吸

取教訓，以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見義勇爲、打抱不平而吃虧。

福州，這美麗的榕城，自然不會祇給我留下這二塊傷疤的記憶。

福州，美麗的榕城，我忘不了那鮮美的荔枝、龍眼、特大的西瓜；我忘不了龔家大院那亭台樓閣、西湖的碧波千頃、鼓山的神奇泉涌。我更忘不了，閩江入海口處的一對大脚似的巨石，因為是它們，挽住了我爸爸那在洪水中漂蕩了七天七夜的可憐的遺體，而不致被魚蝦吞食。

爸爸一身中山裝完好無損，派克金錶、懷錶也都在。據有經驗的漁民說，這是奇迹，一般都會被洪水沖剝得一乾二淨。大伯不讓我和媽媽去看，祇帶大姐去收殮了遺體，并安葬在福州烈士公墓裏。我爸爸的遺體就這樣神奇般回到了家在的福州。這雙脚巨石我雖未曾親睹過它們，我却怎能忘記？我相信，我終有一天要親眼看看它們，親手撫摸它們。

難忘的羞耻

我的小學是在不斷搬家、不斷轉學中度過的，光在福州就搬了四、五次家，四、五年又從福州搬回老家安慶。我上過的小學的名字祇記得一個——安慶的墨子巷小學，小學的同學也祇記得一個名字：翁開捷，是福州的，我回到老家與他通過信，可是與他的友誼是怎樣建立的却全然忘記了，對於友誼竟如此健忘，實在對不起朋友。至於恩師嘛，實在談不上，祇有一位老先生在安慶小學時，講的一個故事却記在腦海裏了。他講，從前有一個讀書人，讀了一輩子書，也失意了一輩子。臨死之前自己立了個碑，上面刻道：生不逢時，奈何！奈何！

看來，人不但要好好讀書，還要生逢其時。

然而，我這個小時頗爲頑皮的孩子，小學的書就沒有讀好。那時，上初中的競爭不亞於現在上高中，我第一次考初中，却名落孫山。初中都考不取，這實在太打擊人了，也太羞耻了。這羞耻我背了二十多年，直到爲了鼓勵自己孩子好學上進，才鼓足了勇氣在獄中寫信告訴她，作爸爸的曾有過不用功讀書而落榜的羞耻。從此長期背的包袱這才放下。人，有點自信的人，內心驕傲的人，要公開承認自己的一點醜事真是頗費周折啊！

初中沒考上，媽媽把我送進一個補習班，補習班有許多農家的子弟，是爲了考城裏中學特意到城裏補習高小功課的。這些同學生活條件都很艱苦，讀書却很用功，他們每月才能回家一次，然後帶來米自己做，就着鹹菜、辣椒下飯。他們的刻苦、用功給了我很大的促動。

羞耻和促動使我懂得要發奮讀書了，所以我後來到了東北就很順利地考入了當時長春的第一流中學——長春師大附中，前身即東北師大附中。



離家遠行

我補習一年，大姐來信決定讓我去東北上學，由她負擔和管教。

媽媽是在爸爸去世後到所裏接的班，可她因爸突然去世打擊太大，身體一下子整個地垮了，二次大出血，動了二次大手術。那二次，我等在車站久久不見媽媽回來，真是心焦無主，欲哭無淚。每次都到了很晚很晚才盼來了媽媽同事，來帶我和二哥到醫院去看媽媽。媽媽這時已難以支持工作了，就申請病退，領導上祇同意按提前退職處理，媽媽拿了幾百元退職金和爸爸的撫恤金，帶着我和二哥，又接奶奶回的老家。坐吃山空，媽媽又祇好把安慶近聖街一所三進一樓的祖居賣了，以維持我們奶孫三代人的生活費和二個上大學的姐姐的零花錢。五七年，媽媽已無力獨自撫養我了，就同意我去東北已工作的大姐那兒上學。

我離家那年是十三歲。離家頓然使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奶奶特意給我買了一個鋁飯盒、小電筒讓我帶着，真是送一個出遠門的。當時，我并不知道捨戀地離別了奶奶、媽媽、故鄉，走向了人生。

第一件荒唐事

離家的時候，媽媽把我拜託給一位到天津看女兒的老先生。

江輪順利地靠了南京碼頭。成人之後，我才懂得江輪最舒服，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可少年的我，當時却不曉得充份領略。下了船，來到了休息室，放在心頭很久的主意鼓動開我了：對，到了南京一定要去看看大嫂，那是我自己的親大嫂啊！我知道她在市糧食局工作，

那就坐車到城裏找人問問！又怕老人不許可，我就自作主張，來個不辭而別。倒還順利，上車一問糧食局在哪兒，售票員就把我引到了新街口，找到了糧食局，人家說早下班了，可不是，一看天已黑了。好在大嫂一位熱心的同事，自告奮勇地把我領到了大嫂家，這可把剛過門的大嫂嚇了一跳。大嫂長得很漂亮，能唱一口好戲，個子矮點，但顯得小巧玲瓏，聰慧敏捷。她父親早去世，老母故亡不久，獨自帶了一個傻呆的弟弟生活。那天我見到了他，他不停地用手撫摸和拍打他姐姐的銅床上的立柱，從那立柱有一截被打摸得特別光亮，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磨戀他姐姐的。他姐姐爲了哄他去後屋睡覺，又是給他奶糖吃，又是給他香蕉吃，他都不稀罕。大嫂說：「他全讓我給慣壞了，一點不聽話！」後來我才知道，大嫂對這個傻弟弟的溺愛和寬容，難怪每逢大嫂到大哥部隊探親，把他送到他哥嫂那裏，他就大鬧一場不肯去。他雖傻，心裏却明白誰愛他、疼他。大哥，在我的心目中是陌生的。祇記得他有一身當年看起來很威武的藍呢軍服，和他帶回的遼東香蕉蘋果，最香最甜。可大嫂的高尚、美麗却在我心中深深地生了根，我尊敬她。

當大嫂知道我是私自跑來找她的，真是哭笑不得，立刻叫了一輛人力三輪車趕往水碼頭。路上，她問我：「沒吃飯吧？餓了吧？」我要強的說：「不餓。」她急了，說：「你這孩子，這麼小就這麼多規矩，我是你親嫂子！」她讓車先停停，去給我買吃的；我不肯，她又說：「哦，你是怕我不吃有豬肉的東西，我這回民嫁了你哥，雖不吃也不怕。」她不容我拒絕，硬是買了許多吃的，再帶我趕路。趕到水碼頭，不見那位老人，又往火車站趕，才看見老人正翹首以待哩！老人見到我說：「哎呀，

你去哪裏啦！怎麼也不說一聲，把你給丟了怎麼得了，再說車這就要開了。誰知老人買的是船車聯運票，差點誤車。經大嫂一再解釋，老人才不數落了。後半程，老人一直生氣，嚴加防範，押着我直到分手。

也難怪老人生氣。要一位老人理解一個少年的心，本來就不容易的，何況又不是自家的孩子。

冷的長春

這麼個冷地方，却叫長春，也真是怪。我大姐對於我也是冷的，自從我到了她的麾下，她除了開始每週爲我洗衣服之外，便是管教、管教，再管教。後來她忙於寫情書、結婚、度蜜月、工作、自學，也就慢慢地把我給



遺棄了。我這個家裏的小不點，沒有享受過溫存的母愛，但對愛却異常敏感，大嫂的熱和大姐的冷恰成鮮明的對照，這在我稚嫩的心靈上留下的痕迹太深了。以後當我知道大姐因爲和黨總支書記等幾個黨員，在組織會議上，向那位在「文革」初頗聞名的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當時在東北人民大學後調南京大學）的生活作風、工作作風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黨集團，若干年之後才平了反這件事，雖然能諒解當時她對我的冷漠和理解她當時的內心煩惱，可是當時的我畢竟是初次離家，遠行千里來投奔她的小弟弟啊！我雖然過去不用功，補習過一年，不是已經考上了第一流中學嗎？入學以後我的功課也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啊！她對人的看法，也太一成不變了。這類人，是口頭上的辯證法，事實上的形而上學。

有恩不報非君子。我雖然總想在她的孩子身上報答她對我的多年的養育之恩，可我心裏却不感激她，也不愛她，因爲我知道她心底裏看不起我，也不愛我，祇是盡不得不盡的義務而已。

我初中這三年幾個假期，哪怕短暫的寒假，我也堅持要回家渡假。自我上東北之後，二姐工作分配到北京水電部設計院，二哥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家就搬到了北京。我要回家，一是北京有吸引力，但實際上也沒有錢到處去玩。記得天壇還是在北京上學時才去過一趟，當時覺得從六鋪坑到天壇好遠啊。二是我想家，媽媽總比大姐對我親。那時的火車，逢寒暑假擠得要死，我又矮小，搶不着座，晚上就坐在過道上睡，有次險些給圍着我的人群擠得背過氣去，至今想起坐火車就發慌。那，我也寧肯忍着，我不能忍受自己親姐姐那種沒有愛的冷臉。

一強一弱二朋友

我在初中的二個好朋友，是截然相反的二種典型：一個是典型的強者，另一個是典型的弱者。這弱朋友姓宋，名字記不得了，他一支腿因小兒麻痺，失去支撐力，杵一根拐。小孩子的心有時是既純潔又冷酷，不少同學叫他「宋瘸子」，拿他開心。我從不，而且總是護着他，他跟我最近，我倆又住在一個宿舍，真是形影不離。你別看他杵根拐，可靈便了，也一樣很淘氣，他能一攔一拐地和我一起打籃球。冬天，下了晚自习，他還敢和我一起，去扒拐彎慢行的「磨電車」哩！冬天，電車的窗子結了一層厚冰，售票員看不見外邊，我們就大膽地幹這扒車的把戲，扒一、二分鐘到了宿舍胡同口才下來。宋就這樣和我大嫂的傻弟弟一起，成了我心中的少年朋友。正因此，我生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虐待，特別是對殘疾人的要笑和嘲弄。我甚至一看見殘疾人，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惻隱之心泛起。六九年，我一次見一個孩子，跪在人行道內側，伸手向人討錢，當我注意到他是失去雙膝的人的時候，人已走過去好幾步，可不知為什麼，一種無形的力又把我牽回到他的跟前，掏盡了我身上僅有的幾毛錢，給了他，才安心離去，不然我很可能會覺得犯了什麼罪，當然實際上那幾毛錢對於他也祇夠一天的飯錢罷了。

那位強者朋友，叫朱延豐。我從沒有見過像他那樣絕頂聰明的人，一雙大眼，開闊高揚的前額。他和我在班裏是學習上的競爭對手，可我們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並不怎麼用功，可門門五分，不論大小考、臨時性的突然抽測也考不倒他，照樣五分。他的學習完全是融會

貫通式的。我最不行的外語，對於他却毫不費力，他能熟練地背誦全部英語課文。他父親是當年的吉林軍區政委，他是延安時代的孩子，他從不自誇，也不傲視他人。他是我所認識的幹部子弟中傑出的典型那一類人。他知道我家不在長春，就經常邀我到他家作客，待我親如兄弟，我以後回到北京上學一直還和他保持着友誼。後來雖不知他的音信，我的心却始終懷念着這位少年時代的好友，盼着哪一天能在有所作為的人物行列中，聽到他的名字。

難忘的一課

我初中時，正是提倡勤工儉學的時候，那時的勤工儉學很受我們同學歡迎，我學過作木工，作五十門電話交換機，還常到學校自辦的農場勞動，我們農場有汽車、拖拉機，還有三頭十分漂亮的高頭大馬。一次勞動回來，迎着夕陽回學校，快到學校的時候，在十字路口上，我親眼目睹了一場悲劇。我們同年級的一位女同學被一輛軍車撞倒壓死了。我和幾個同學嚇呆了，驚呼着奔向了死者，死者的肺和腦漿，粉紅色的、火熱、撲撲地作響。我們認出她是吉林軍區司令的女兒。因為我們是見證人，被留下來作了證詞，很晚才回宿舍。我們惋惜這女同學的不幸，也關心着那司機的命運。因為我們親眼所見，這事故不怪司機，他為了躲那位突然出現的不幸者，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事情的結局，給我上了終生難忘的一課。女兒的噩耗剛剛傳到司令員家裏，二位老人大為震驚，並且不相信，但得知確實如此之後，二位久經沙場的老人幾乎昏厥過去，母親痛不欲生，父親沉默無語。是啊！怎能不悲痛，活生生的女兒，多聰明、靈利、漂亮的一個

女兒，臨死前的一聲慘叫還是叫「媽」啊！這是從戰火的硝煙下保存下來的孩子啊，竟然這樣早上出門，晚上就回不來了呢！難以接受：司令員最先走出了痛苦，詢問了全部經過，又關切地問了司機的情況。然後對妻子說：孩子已經死了……，不可挽回了，祇怪我過早地讓她騎車上街。現在的問題是那位司機，聽說已經把他嚇壞了，正被關押着，××軍準備把他交軍事法庭處理。可是我想，現場的證詞和勘察都證明不能怪這個司機，這是個農村來的孩子，我們不能讓這孩子去受審，這樣作也不利於軍區和野戰軍的關係，妳看呢？

他期待着他的老戰友、妻子的答覆令他滿意：那就快讓他們把那孩子放了吧，別讓他膽小，我們不會責怪他的。

這樣素的話語浸人肺腑。司令員和他妻子的崇高形象使我永誌不忘。不論是在那「文革」中的日子裏，還是某些人以權謀私十分囂張的時候，甚至我深陷囹圄的日日夜夜，正是這二位老夫妻的形象，使我絕不會動搖對老一輩革命者的信賴，對正直、無私的共產黨人的信念。因為這不是任何人給我上的一課，而是我親自目睹耳聞的事實。

第一名

初中畢業後，我投考本校的高中部，考了一個第一名，三門二百九十多分，創了我學業史上的最高紀錄。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是，這次升學考試，不考外國語，讓我這個最怕死記硬背的人躲過了難關。再者，這次語文考試，作文佔六十分。我曾有一篇作文很得老師的欣賞。它記敘的是我和幾個同學為「大煉鋼鐵」盡一份力量，爬到長春市

下水管道網裏，收集當年日本人佔領時留下的廢舊鐵管的曲折過程。經老師反覆幫助修改，成爲範文在校內流傳。考試的時候，我幾乎是原文一字不漏地用了這篇現成的文章，得了罕見的六十滿分，可能正是這個緣故才使我名列第一，居然考在了朱延豐的前面，這是我始料不及的。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長春師大附中，的確是所好學校，不愧是全國有名的重點中學，正是它爲我人生道路奠定了堅固的基石。

這個學校的教師全部是師範大學的高材生，年紀輕，事業心極強。老師們每天除了上課，還陪着我們上早自習和晚自習，自己的小孩都託給別人代管。寬敞的教學樓和健全的文體活動設施，陰雨體育室，在全國也是第一流的，尤其校舍搬進了原師大歷史系之後，同學大多數住校，宿舍還專門配有生活老師管理。在這所學校裏，我真是得益不淺，不然我這樣一個雙親不在身邊的孩子，怎麼可能從一個考上初中的學生成爲第一名呢？

這個時候，北京在向我招手，少年的心總是趨往最強的誘惑。我謝絕了老師們的一再挽留，決定轉學到北京上學。學校特意爲我開了評價極好的介紹信，希望我能轉入北京師大附中，可是當時北京已經開始實行分區就近入學的制度，我祇得入了北京七中讀高中。

入團

剛到北京的第一年是平淡的。

第二年的班主任語文老師申學敬，開始注意了我的能力和在班上的威望，他有意在班上的一些活動中讓我嶄露頭角，於是高二的時候，我被大家推選爲班主席。我們年級有團支部

，人數很少，可當時擔任班主席的幾乎都是團員，因此我成了重點培養對象。我功課和工作都很好，我們班開始從一個後進班逐步成爲全校很活躍的一個班，祇因爲我爸爸有歷史問題（實際上算什麼問題！）我又不肯昧着良心，不顧事實地去一味批判自己死去的父親。那位女團支部書記，她的功課在全年級數得着的差，就憑是工人家庭出身（實際上解放前是賣炸油條的小商販），特別想在我入團問題上顯示她階級立場堅定，因此拼命從中作梗，經過反覆覆討論了三、四次，直到引起其他團員的衆怒，學校團委又出面干預，我才算入了團。

休學

六三年，高中畢業在即，在我一生中出現了巨大的轉折——我決定退學，自學馬克思主義。

我在離畢業僅有二個月的時候，突然作出這樣一個對於我一生意義巨大的決定，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我自初中開始愛讀課外書，最入迷的時候是初二。有一次竟在課間操時，躲在老師的講台裏面看小說，老師來上課了，我都不知道，等我不得不出來的時候，把那位女老師嚇了好一跳。高中之後，我主要讀傳記小說，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馬克思傳、恩格斯傳、馬克思青年時代、列寧的青少年時代這五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我敬佩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的遠大抱負，和爲此不惜犧牲一切的奮鬥精神，認定自己就應該像他們那樣渡過自己的一生。我在他們的經歷中發現，他們四個人之中有三個人沒有經過高等教育，馬克思在大學也是學法律的。他們創立馬克思主義，或繼承、或發展

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通過社會實踐和自習而取得的，因此我也就認定要想真正學懂馬克思主義，必須在社會實踐中自學。

二、我對當時基本上是「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十分反感，我認爲它窒息了青年人生機勃勃的精神。老師灌、學生記、回家背，簡直不叫學習，學生無疑成了祇會背書的機械人。當時據我瞭解，大學文科的教學方式也大體如此。儘管當時我的功課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可我對考大學一點也不感興趣，而且暗自下了決心決不考大學，我要到火熱的社會實踐中去自學。

三、中蘇關係公開破裂，中蘇之間開展了公開的大論戰。這場論戰把我深深地捲進了政治的旋渦。

當時這場大論戰爲人們稱作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三次大論戰，是百年難逢的好時機。我眼前亮着強烈地吸引我的光。我當時祇有一個念頭：要想學習馬克思主義，錯過這個時機簡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於是，我正式向學校黨委提出了：退學自學馬克思主義的申請。這種情況，在中學生中可能是絕無僅有的。校黨委和全體老師、同學大爲驚愕，除少數幾個同學支持外，絕大多數人強烈反對。剛剛從南昌奔外婆喪事回來的媽媽、二姐對我大失所望，一致反對，其他三個兄長也異口同聲表示不可理解，讓二姐全力阻止我這樣作。

面對二姐這個對手實在讓我難辦。二姐身材頹長，亭亭玉立，幹練、敏捷，待人誠摯、熱情。在我的諸兄長中，如果說我對二哥是尊敬，對二姐則是喜歡。她對我不僅規勸，施展了她作爲技術幹部兼黨務工作者的全部能力，還特地帶我到北京大學她老同學那裏，讓那聞名中外的高等學府來吸引我。可惜，我是屬於

打定了主意，決不輕易改變的那種族類的人。爲了使我和二姐之間的友愛不致被破壞，我就以書面的形式與她辯論一番，就是那篇以二姐爲假想對立面，題目叫『我要自學』的終身宣言，全面說明了在許多人把學習大本大本馬克思主義厚書看成是不可思議的時候，我爲什麼突然決心退學自學馬克思主義的理由。經過反覆地辯論、談話，終於達成了妥協：學校批准我暫時休學一年。

當然事隔二十多年，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的中蘇論戰的功過是非，已經可以看得更冷靜、更清楚了。但這畢竟是今天才可能得到的。也許未來的歷史學家還會進一步修正今天的看法；也許會爭執不休，然後才可能得出較爲正確的結論；也許永遠得不出完全一致的看法。

今天看來，當年的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那場論戰中，可能在潑掉髒水的同時，把可愛的孩子也一起摔傷了，以致發展成爲「繼續革命理論」的荒謬。但是正是他們，在蘇聯某些（今天應該承認有功績的）領導人霸權作風面前所顯示的不屈品格，和堅持當時自己認爲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所表現出來的無畏精神，無疑是值得後人理解和肯定的。今天的人們，一定會在潑掉髒水的同時，更聰明地把可愛的孩子保護、培育起來。

這就是我，一個當年毛澤東的追隨者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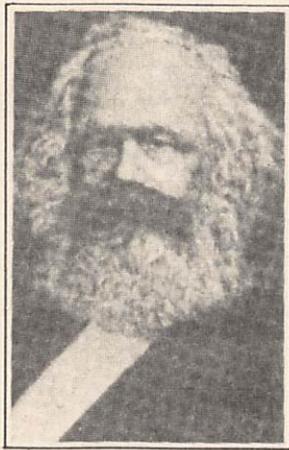
那休學的一年，我按自己擬定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書目，進行了自學。記得當時我在擬定的書目的封頁，寫了這樣幾句話：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嘉也。

這一年，自學了馬克思主義原著；閱讀了

大量有關第三次大論戰的資料；到河北東鹿的鄉村去考察了一次；每週週末到學校廚房義務幫廚一個上午。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現在的我居然被人指控爲反革命份子。在我們這個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的國度裏，誰都知道，衷心擁護、勤奮學習、努力實踐，並不斷追求馬克思主義之真諦的人決不會是反革命份子。

有人可能會說，你當年自學馬克思主義，祇能說明你的過去，現在你變了。（變成了反革命份子?!）



馬克思，在近代人類史上影響極大的人。

我不禁要問：一個人要從本質上起變化，那麼容易?!尤其是一個人自覺自願確立的志向，特別是這種志向是在少年時代就發自內心確立的。這種人本質變了，你見過很多嗎？質變？談何容易。

還是請繼續看事實吧。

摯友

一個人能在青少年時代，交上幾個真摯的朋友，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北京七中期間，我有幸結交了四個好朋友：敖德煥、王殿元、王東復、何延忠。其中的德煥就是對我的自

學的決定，首先給予了最深刻的理解的人，我覺他是我朋友中唯一能夠完全理解我的一個人。他是高二時的插班生，來自玉門，隨父親轉到北京的。他父親是我國石油界的元老，我國石油開發最早的基地——玉門的總工程師，調石油部任總工程師。他從來不對我說這些，我們之間幾乎相交了十多年了，都還不很清楚各自的家庭的情況，關於父輩的情況都是後來逐漸在無意中知道的。盤問對方的家庭情況，似乎沒有必要，又似乎不禮貌。友誼不需要前提，祇要它在我們之間存在這就足夠了。他到我們班上不久，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好像我們早就相識，早就是好朋友，不要共什麼患難。倘若，共過什麼患難，那也祇是加深友誼的問題。他不苟言談，我們雖談的並不多，但我甚至敢於在他面前批評他的母親有點「官氣」。當我後來知道他是怎樣深深地愛自己的母親時，我恨不得嚴厲地檢討我這個批評的偏頗。我們之間好像有什麼默契，如果自己不接受對方的友誼，簡直是罪過。這可能就是人們備加稱道的「神交」吧。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中，朋友間說話都往往有所戒備，但我們彼此也是無顧忌的交流。他長期從事文藝工作。思想解放運動剛剛萌芽的時候，我曾冒很大的風險寫信對他說，我認爲祇有徹底批判那份主席曾批示過的江青主持搞的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文藝才可能獲得解放。他也冒了很大風險回信表示完全贊同這個看法。過了二年這個看法已經是文藝界許多人的普遍看法了。

如果說我和德煥、延忠、東復的友誼有一點客觀原因，我們住家都在六鋪炕，相距很近。那跟王殿元的友誼，那就完全是淳樸的心心相印。他家當時住在新街口，却常和我們在一

起。他比德煥更不善言談，幾乎一天沒有幾句話。祇要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做什麼事情，都是爲了大家，默默無聞、任勞任怨。對別人，他真夠得上魯迅讚揚的那種「孺子牛」。他還是一個令人感動的孝子。他老母「文革」中被遣回百里外的小湯山。當他媽病重時，他星夜騎自行車趕回小湯山，再騎車返回北京，向單位借了三輪平板車，再急匆匆趕回小湯山，再一個人蹬車把老母送到北京就醫。這一次往返近四百里，他寧肯這樣死苦自己，也不肯告訴我們去幫助他一下！你別看他愛說話，說起話來有點口吃，可朗誦起詩詞却能把那一字一句的深意，準確、清晰、形像地送進你的腦海裏，當時他最喜愛的是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詩。他對我們的友誼特別表現在嚴格上，他常常是在對我發表不同意見和批評意見時，才異常激動地對我說話，即使我有時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却總是在內心引起震動和深思，因爲那一字一句無不中肯。他是極自愛自重的人，可我這一次却可能讓這位無辜的老實人在警察、居委會、鄰居的眼中蒙上了不白之冤。雖然這對於我來說是萬不得已，受騙上當，可我總覺是我牽連了他這絲毫不知內情的人，欺負了他這個地地道道的老實人，對他犯了罪。我真覺得今後再沒有臉面去見他，儘管我知道他任何時候對我都是寬容的、誠摯的，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這樣對待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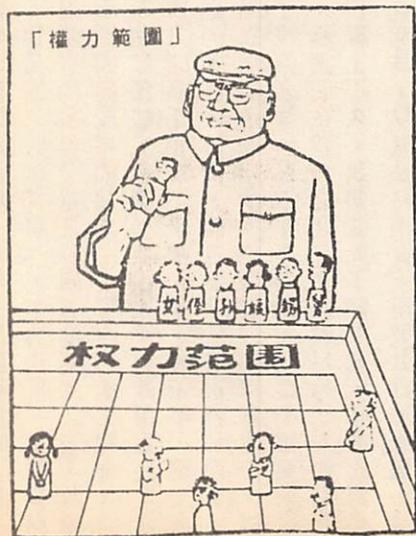
延忠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沉默者。他從小愛聽古書、看古書，可他非但沒有愛看古書的少年常沾染的俠氣，反倒像是入了佛門的出世人，他對人世間的事似乎都很麻木，唯獨對我們幾個人古道熱腸。學生時代，他家境困難，到什麼地方去玩，我們從不肯讓他花錢。等到我和殿元有了家累，他倒無事一身輕，就充份

地來顯示他這「獨身富翁」的慷慨，和他那獨特的細膩的友情。「有福之人不用忙」，倒是我和我妻子比他更忙於爲他完婚。我妻子將自己一位賢惠的表妹介紹給他，并在我家爲他辦了喜事，渡過了蜜月。他還官星高照，成了我們五個人中唯一當了科長的人，想起來真是有意思。記得七五年，「四人幫」相當猖獗的時候，我在一次「家宴」上，忍不住抨擊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我深爲周總理的處境憂慮，并認定「滙報提綱」的方向是正確的，引得他這位保衛科長大爲驚訝。他當時雖認爲不可理解，回去倒也沒有滙報，不然我早就遭殃了。說明他雖麻木於世事，心却明如懸鏡，是個相當內在的人。

說來也怪，我這麼個愛說好動的人，偏偏交的幾個朋友都近乎「啞吧」，也許是「異性」相吸吧。也不盡然，那位王東復比我更好說愛動。我們倆是五個人中的活動因子。他是一個天賦極高的人，在中學時代就才技橫溢。別看他個子矮，善打籃球，更踢一脚好足球，是校隊的右邊鋒，數理化門門精，外文、中文在班裏也是拔尖的。在演話劇（如「火燒趙家樓」等）、化粧晚會上，更是我好幫手和好搭檔。他當時的繪畫，尤其是漫畫，從構思到成圖，我看不亞於當年的漫畫家方成的水平。難能可貴的是，他這些本領都是無師自通的。他是我們五個中唯一的大學生，畢業後主動報名到大興安嶺落戶，他在那兒寫來的信，我們都當作優美的散文詩來傳讀，他有很深的文學造詣。可惜這早年就燦爛閃光的天才、林學院的高材生，竟淹沒在本應造就他的林海之中了，不知現在的命運如何？

談到同學和朋友，却有這麼一個人值得一提。他不算我的朋友，他却認我爲他的朋友。

他叫李長順，雙鼻孔有點缺陷，朝天長着，與大家不合群。當時他家境很不好，曾隨一些小伙伴去行過一次竊，他當放哨的，被抓住了，在公安局關了幾天。這在六十年代的學校可了不得，學校幾乎沒有出過小偷，一下子他的事成了頭號新聞。念其初犯，很快被釋放了。他是我們班的，我當時任班主席。當我瞭解他已知羞愧，我特別在他尚未回班之前，召集了全班會議，希望大家不要歧視，要比以往更關心他，更歡迎他。同學們都很擁護這樣做。當他回到班裏，大家都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非常真誠地對待他，我又特別幫助他補習功課，他在大家平靜的愛護下渡過了難關，順利地畢了業。他後來被分配在一家保密廠工作，他參加工作，我正在休學。他特意到我家來看我，他說我是他的好朋友，很感激我，并表示再也不會犯過去那種錯誤了。我也很感動，其實我和同學們並沒有爲他作什麼，祇是創造了一個平靜、友善、溫暖的環境，讓他自身的良知在其中復活。（未完待續）



海南的今天就是中國改革的明天？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揮 戈

中共在今年九月特別代表會議以前，披露了海南經濟特區的汽車倒賣案件。這一案件主要係海南經濟特區的負責人，利用其免稅的特權和國家的外匯，大量進口日本的汽車，然後倒賣到內地各省，從中牟取大量利潤。

海南案件發生後，一個嚴厲整頓「不正之風」和打擊倒賣的運動正在大陸更加深入展開，並採取了一系列行政組織措施，如撤銷了海南政府負責人雷宇的職務，收縮特區的對外開放，緊縮外匯與貸款，重振黨政紀律，等等。鄧小平還在最近講話中強調：「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爲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霎時間，海南經濟特區一片「紅色恐怖」。海口市這個一年以前呈現出突然性繁榮景象的港口城市，重新變得死氣沉沉，恢復了多年前的舊樣，市面一片蕭條，街道寂寥，旅館停工，公司歇業，外國投資者更是疑慮重重，開始緊縮銀根，並懷疑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穩定性」。

海南案件發生後，當然要追究責任，查處有關的負責人。但是，人們記憶猶新，一九八二年中共大反不正之風，打擊經濟犯罪，除了抓出了幾個小幹部作替罪羔羊外，並未打到什麼「大老虎」。這次海南案件也一樣，只把雷宇等幾個幹部作替罪羔羊，撤職查處了事，並沒有觸動上面大一點的人物。但是，明眼人一

看就知道，在中共現行管理體制下，像海南倒賣汽車這麼大的一件事，決不是雷宇等人所能作得了主的，不經過上面高級領導人的點頭認可，雷宇等人是決不敢膽大妄爲的。事實是，海南經濟特區是在鄧小平提出「海南島二十年趕上台灣」的指導方針下，中央於一九八三年十月正式下達文件，才批准設立的，並給予大量的優惠條件。趙紫陽還給新上任的海南一把手雷宇以特別的主權，可以自行簽發汽車、電器、建材等十四種商品的進口許可證並免繳關稅。胡耀邦則說，只給政策不給錢，你們放手去幹。雷宇等人正是在領得鄧、趙、胡幾位大人的「尚方寶劍」後，才於一九八四年簽發了十萬輛汽車的進口證，再轉手賣給內地，發了大財。現在海南的汽車交易成了不正之風和非法行爲，主要責任在下面還是在上面？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嗎？！然而，目前海南倒賣案件的主要責任，似乎只算在下面雷宇等人身上，實在是很不公平的。

海南的不正之風，不在於未接受黨的領導，而在於「法治」不健全。

那麼，釀成海南倒賣汽車的不正之風的原因何在呢？據中紀委對「海南事件」負責人雷宇的處理意見中說，是因爲「……他所主管的政府經濟工作，從未提交區黨委和政府黨組討論。……」中共對過去「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已批判了好多年，如今在改革中遇

到一些問題，又想借屍還魂，走回頭路，實在是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我們認爲，海南的不正之風，不在於雷宇等人不接受黨的領導（難道鄧、趙、胡等人的指示不算黨的領導，而區黨委和政府黨組才算黨的領導嗎？！），而是在於「法治」不健全，立法不完整，使人們無法可依，無法可循。例如，按規定可進口、倒賣舊車，然而，什麼叫舊車？使用一、二個月的算不算舊車，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再如，中共近年來曾三令五申關於「嚴禁國家工作人員經商」的問題，是由於體制改革一放開，官商之風即趁機襲來，而中共長期以來，對商業社會的運作規則極爲隔膜，似乎不知道公務員不准經商牟利乃是世界之通例，因而未向各級領導打過招呼或防患於未然，更不用說制訂出比較完備的法律來加以禁止了。

在推行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中，不能因爲出現了海南和深圳的不正之風，就因噎廢食，否定改革，企圖使改革的歷史車輪後退。目前，以陳雲爲首的恢復派，利用海南、深圳經濟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向改革派大舉反撲。將來等待時機成熟，恢復派是否會對改革進行全面反攻呢？所謂海南案件，是否僅是這種全面反攻的前奏呢？我們將拭目以待。

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共在體制改革中，經常處於矛盾狀態。爲了加速經濟發展，必須借助於改革，而爲了堅持馬列，就必然要排斥改革。因此，中共的政策經常是在放與收之間搖擺。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也經常在各種問題上進行較量和磨擦。但是時代的步伐必將向着改革和開放的方向前進，我們支持胡、趙改革派繼續推行改革。保守派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不得人心的。人心思改，改革是大勢所趨，是中國歷史前進的必然。

台灣人可在大陸買地，大陸人為何不可？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揮戈

最近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決定：為鼓勵台灣人在福建投資，發展大陸的經濟，可允許台灣同胞在福建某些地區購買土地。從這條消息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共又放寬了對台政策，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突破了過去國有制的界限，允許台灣同胞在大陸擁有土地所有權。

但是問題在於，既然台灣同胞可以在福建某些地區買地設廠，為什麼大陸人不能在本國的國土內買地？為什麼大陸人不能在國內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追溯到過去歷史，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從取得政權的那一天起，就把全部生產資料（包括土地）收歸國有，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且，根據斯大林的理論，消費資料是商品，可自由買賣；而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只能在內部進行計劃調撥。在斯大林的這一理論影響下，給各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帶來很大的危害，例如產需不銜接，貨不對路，造成大量積壓，等等。前幾年，大陸經濟學界突破了斯大林關於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說法，主張所有生產資料都應與消費資料一樣，通過市場進行交換與流通。同時，在實踐上，也在進行改革，不斷擴大通過市場進行交換和流通的生產資料（主要在工業）的範圍，而不斷縮小通過內部計劃調撥的生產資料的範圍。問題是，既然在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能進行自由交換和流通，為什麼農業中的生產資料——土地就不能自由買賣呢？

中共在前幾年，批判了農業中的極左路線，打破了過去農業中幹活大呼隆、分配吃大鍋

飯的制度，實行了農業生產責任制，從而發揮了農業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其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增產潛力也是有限的；而且由於農民沒有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就不能做到關心愛護使用土地，保持土地的肥力，甚至出現掠奪式使用土地的情況；今後隨着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尤其是農村社隊工業的發展，都要求突破這種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使用土地的狀況，因此，施行土地自由買賣，是農業改革和農業生產發展勢在必行的重要一步。

在中國大陸，過去由於土地不能自由買賣，在廠礦、企業徵用土地方面，造成許多矛盾，並助長了不正之風。廠礦、企業在徵用所在生產隊的土地時，生產隊往往趁機大敲竹槓，除了索取高昂的地價外，還要求廠礦、企業為其子女、社員安排就業，賠償損失，並為生產隊供電、供水，等等……社隊與廠礦企業在經濟利益上也經常鬧糾紛，給企業的正常生產造成很大威脅。因此，大陸有些廠礦、企業的領導人反映，他們用在徵地方面所化的費用，實際上要比他們買地所化的費用高得多。由於大陸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不能自由競爭買賣，廠礦徵用地所在的生產隊，對土地就有一種壟斷，可以據此進行敲詐勒索。因此，從解決廠礦企業的建設用地來看，也要求進一步實行農業改革，允許土地能自由買賣。

中國大陸東南部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口

密度高，人多地少；而在西北部地區，經濟尚待開發，人口密度低，人多地多。為了開發西北部地區的資源，發展這些地區的經濟，今後必然要求將資金和勞力由東南部經濟發達地區向西北部經濟不發達地區轉移。但在這種資金和勞力的地區轉移中，如果仍固守一家一戶使用土地的制度，土地不能自由轉移和買賣，那麼，就不能形成土地的兼併和集中化，從而就給資金和勞力的地區轉移帶來困難。因此，土地的自由買賣，和由此而產生的土地兼併和集中，是實行資金和勞力地區轉移的客觀要求。

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現代化的逐步實現，農村鄉鎮工業必將有一個大的發展；同時，目前大陸城市集中化過程比較快，大城市數目多，這些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北京、瀋陽、廣州等，由於工業項目安排過多，生產過於集中，已暴露出許多矛盾，諸如基礎設施不足，交通緊張，住房擁擠，用地矛盾突出，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求一方面控制大城市的發展規模，限制在大城市發展工業；另一方面，要把目前在大城市過於集中的一些企業，或適於在農村發展的企業，進行搬遷，向農村擴散。而無論是農村鄉鎮工業的發展，或城市工業向農村擴散，都要解決用地問題。但在目前情況下，解決用地問題是有困難的，祇有進一步實行農業改革，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才是解決用地矛盾的正确途徑。

綜上所述，要加速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在農業方面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允許台灣同胞在大陸某些地區購買土地，而在於進一步實行農業改革，突破土地國有制的框框，在大陸內部能自由買賣土地，使大陸人民擁有土地的所有權，這樣，才能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加速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喜聞土地政策突破

評土地承租權轉讓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趙大吉

據可靠消息，中國正在考慮對土地政策作重大修改，使房地產租用權可以買賣。這是一則一倡百和順天應人的大喜訊。

遠在今年二月初出版的「中國之春」廿一期的社論，就已明確指出：「售地於民，勢在必行！」大力鼓吹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

「中國之春」雜誌的一些作者，大都是海內外的一些青年民主派。他們有的到海外學習，親眼目睹了多元民主國家物質的豐富和城鄉的繁榮，真是國富民強，一片上昇興旺的景象，能不感慨於今而爲此苦思冥想、出謀劃策、扣馬而諫嗎？

值得慶幸的是：趙紫陽總理的參謀班子中，有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也是由一班立志改革的青年民主派所組成。他們爲補偏救弊，提出了土地承租權可以轉讓的變通方案。而且，遼天之幸地被趙紫陽、田紀雲等決策人物所接受。這是一個土地政策的較大突破，也是專家們窮原竟委研究了事物的現象與本質

的一個進步。歷史將會表明，「中國之春」的許多主張，往往是改革的論壇先聲，許多發揮的論點，也會越來越多地被當權派改頭換面的接受。

祇是，土地承租權可以轉讓的進步，在社會發展變化的里程碑上，祇不過是踏出了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當局還應跨進一步，不僅允許承租權轉售，還應允許土地私有。

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完全是廉價售土地給私人，由私人來開發經營的。大量的荒原、林莽、沼澤地，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變成了肥沃的良田和菓園。崛起的城市多不勝數，工商業發達，旅遊業興旺，看過去，到處是繁榮、美麗、富饒的仙境勝地。至今在美國，人人都以早期的西部牛仔精神自豪，那是美國人民（包括華裔在內）勤勞、勇敢和進取的優良傳統。美國的建國歷史這麼短暫，但二百多年超過了黃河長江流域的五千多年。同時，美國各州也還在繼續前進和開發之中。例如，美東南的

佛羅里達州，氣候宜人，風景秀麗。但由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開拓發展的不平衡，地廣而人稀，沼澤地、原始叢林密佈，農場雖然也有不少，但一向祇是亞熱帶柑橘農作物的產地。近二三十年來，紐約州和佛羅里達州兩個州政府，攜起手來聯合同佛州移民，繼續土地的開發利用。佛州的州政府，非常聰明地先在州的中部，修建了華特狄斯耐世界樂園，造成了每個月平均至少有二百萬遊客的旅遊勝地聲望。然後，排沼澤的水，造人工湖，出售狄斯耐樂園四週的已築好水電裝置、架好了電話綫的住宅地。土地易手給私人，政府收入了大量的資金，土地房屋可以買賣，政府又可以由此抽取稅金，進一步又獲了利。移民遷入新宅，城市會壯大，工、農、商業也都會改觀。這一個「新西部」移民計劃，正吸引着許許多多的新移民，其中有不少是各行各業的能手。所以看起來，佛州的前景必然會像第二個西部一樣燦爛輝煌。這樣的事，在神州大地開發西北或大西南，本來也是可以如法炮製的，但由於土地公有制的障礙，根本完全不可能辦到。私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都應該服從於努力使國富民強的大目標。政黨的前提既是造福於人民，又爲本末倒置，死抱住馬列主義的三墳五典不肯放手呢？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神州大地九千六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其中的九州膏腴，都是炎黃子孫世世代代四肢着地背負青天，好不容易地辛苦慘澹經營，才化洪荒爲沃土，變不毛爲良田。正像俗語所說的：「千年田地八百主」，這其間土地的主人，經社會自然法則的淘汰，不知幾經易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不論誰人，祇要作了土地的主人，就必然會具有「有片田，頂片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圖為黑龍江省的一個國營農場。假如大陸農民無權擁有大量土地，農業走上現代化是極為困難的。

的私有心理。唯其如此，也才會節衣縮食地下苦力深耕細作，保土施肥，血一點汗一點地辛勤經營管理，把生地開成了熟地，把瘠土化成了肥田，幾乎可以說，田陌之間的每一把泥土，都摻和着祖祖輩輩古老陳年的斑斑汗跡。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領導了初期土地改革。然而，農民的土地證到手印璽未乾，馬上就土地合作化公社化，農民空歡喜了一場，等於又失去了所分得的田地，而淪爲了附着於公有土地（農村戶口不得遷移）的奴隸。於是，農民失去了對土地的興趣，糾纏於人事的拍馬溜鬚，先進的所謂勞動模範，畢竟是極少數。九州膏腴經三十年耕作的粗放管理，土地的地力已逐漸在嚴重的消耗損失之中。如果不是現代化科技的引進，水產、化學肥料和消滅病蟲害的功勞有補，恐怕人不動，地也懶，肥田沃土早就會減產無收，使祖祖輩輩傳下的沃腴之地大大地老化了。

然而，化肥不僅對人體有危害，對土地的顆粒結構，也是有損傷的。田地本身的有機質在粗放管理下已逐漸外強中乾。暫時也許還看不出端倪，可對子孫後代却已是大大的不利。反之，私有的土地，却能喚起農民對地力的保護與熱愛，千方百計保持土地的青春，用各種有機肥料給土地補營養，用各種措施施種輪歇，就苦經營。這幾年農村經濟政策的改革措施，就雄辯地說明了：祇要農民懂得了現在是爲自己幹，不是爲集體爲公社幹，那個勁頭，就大大不同。白天黑夜，老老小小，都把心思用在生產上頭，從而大大改善了二三十年日漸貧乏的供應。祇是，土地承包三十年，畢竟還是太短太短了。中國人和其他種族略不同處，又恰恰是在「甘爲兒孫作馬牛」上。三十年，土地祇夠傳給兒子，不能傳給孫子，這對農民來說，

是絕對不會滿足的。農民必須在有了土地所有權之後，拿到了真憑實據的土地契紙，才會心甘情願地掏出自己最後的潛力，把全副心神撲到土地上去。也祇有這樣，農業才会有大發展。

今年二月出版的「中國之春」廿一期社論指出，土地所有權如可自由買賣，農業發展的規律應該是：個體戶（小農經濟）——專業戶（土地逐漸向耕種能手集中，非耕種能手改從事其他職業）——農場主（土地集中，然後是機械化的大農業）是很有道理的。蘇聯的集體農莊開了多少年，市場仍然食物短缺。美國的大農場，操作人手并不多，但一個人的勞力，足以供應近百人高水平的需要。市場農作物和副食品之豐富，真是琳琅滿目，五彩繽紛。農場主發愁的祇是賣不出產物，市民關心的也多半是如何減肥，而不是油、肉、雞、鴨、小牛肉分配定量。

土地私有，售地於民，這是急需向前大跨的一步。現在的政策祇許農民經營三十年，但三十多年地力的損耗，將難以挽救。正如民間俗諺所說的：「前人土地後人收，還有收人在後頭」，若是再不高瞻遠矚，因勢利導地進行根本性改革，大跨一步，售地於民，而仍然拘泥於共產黨人以鐘平私有制爲天職，土財佬式的唯恐土地公有易手，置國運民祚於不顧；或說由於運動太多的條件反射，存有個人得失的考慮而寧左勿右，那是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的犯罪。歷史是嚴酷的，政權在歷史的過程中，點點滴滴，一得一失，究竟贏得多少正分數，多少負分數，後人自有公論。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筆者奉勸神州大地的農業決策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并補購「中春」廿一期社論一讀。

許家屯的「脫黨聲明」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趙大吉

香港新聞界最近出了一樁亂子，有家一向并不重視政治的報紙——「快報」，公佈了許家屯在香港中華總商會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的秘密講話，內容有關他在香港任新華分社社長兩年多，虛心學習得出的一個結論：「資本主義生命力強大，有兩大優點，能夠緩和社會主義制度所不能緩和的矛盾。」

「快報」的獨家新聞剛剛播印出，香港新華社就立即四處出動，發稿予以澄清，嚴厲指責該報報導「不實」和「歪曲」。冷眼旁觀的其它報紙評論指出：許家屯是中共不久前卸任的中共中央委員，如果認為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優越，他就應該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資格做共產黨員了。所以，這個講話的實質，不啻是一張「脫黨聲明」，也許對許家屯先生來說，也是大大出於意表，噫，莫及的當頭一棒了。

參加過此次內部會議的一個香港政協委員徐四民出來補充更正，指出報導「有偏差」，容易招致「誤會」。他說，許家屯在當天講的原話是「以往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已屬垂死階段，但實際上仍極具生命力，主要是資本主義能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故生命力很強。此外，資本主義能緩和自己的內部矛盾，如資本主義的福利措施，解決了職工與資本家的矛盾便是。」還說，許家屯由此又談到，基於這一認識，資本主義在香港，肯定可保持六十二年，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資本主義相對來說，就可能

存在更久。

這一補充更正，可謂「越描越黑」。它更加證實了許家屯先生的講話，的確承認了資本主義制度比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快報」的報導，也絲毫沒有「不實」和「歪曲」。祇是，從更正的尾聲來看，許家屯先生完全有可能是有鑒於香港的大老闆和高級知識份子，這兩年紛紛向美國或是歐洲、澳洲逃亡，風聲鶴唳，落英繽紛。為此，他不得不掏出兩年多研究的「一己心得」，用三寸不爛之舌，解除會上的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大老闆們心中的疑懼，希望他們能安心留港等待九七年的到來：

許家屯任駐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已兩年有餘，對香港這一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親身體會自然不少。作為共產黨員，素來都是以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自居的。但基於這兩年的研究與分析，他這才發現，資本主義并非垂危老朽，而是風華正茂，生命力旺盛得很！反是社會主義頗多內部矛盾，無法緩和。這在我們看來，正如十兆個圓圈，永遠湊不成一個四方一樣，科學是來不得一絲半點虛假的，真理昭然若揭。神州大地馬列主義的理論，在實踐中已是顧此失彼，黔驢技窮，難以自圓其說。許家屯先生自嘲為「謬論」地說出了心裏的老實話，是一件大好事。這比起國內那些死啃馬列、一口咬定了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積卅五年之痛苦經驗，仍然瞞心昧己地宣傳四個堅持好的人

來說，他不愧是一員「年過半百，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老將。作為中共中央委員，他已是自動告退辭去了。作為中國共產黨員，脫黨也能，不脫黨也能，祇要能為後代子孫負責，肯說入木三分的大實話，而不是玩弄權術，那就畢竟是一個真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令人尊敬！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究竟哪個優越？關鍵在於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相應的情況。生產關係如果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生產關係就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落後事物。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卅五年以來，農村的生產力，從一九五三年統購統銷後，就一直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大躍進的畝產萬斤糧，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神話謊言。報章雜誌年年宣稱形勢大好，大豐收，可工農公務員和知識份子的生活水平，仍然掙扎在貧困綫上。重工業、輕工業雖有所發展，但應該看到，時代在前進，歷史在發展，發展進步是帶有世界性的潮流。龜兔賽跑，不能說龜停止在原地沒有動，移動了一尺半寸，沒有什麼可驕傲的。兔子的飛躍前進，龜不能閉眼不看，充耳不聞。生產關係既然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就不應該以強權硬要宣傳部門，為四個堅持的「效果」塗脂抹粉。

真理越辯越明。能夠棄短取長，承認自己的錯誤與落後，其本身就是認識的進步。但許家屯先生如果祇是想以苦口婆心的策略，虛與委蛇地來說服香港中華總商會秘密會議的與會人物能留守香港，而政策依然是朝令夕改，言論又令人噁若寒蟬，沒有民主，那倒是請君入甕而自食苦果了。但願今後神州大地對「脫黨」的看法，不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敵我界綫，不受群眾運動的相當於刑事的處罰，筆者為許家屯先生今後命運的平安祝福！

愚忠的悲劇

——也評劉賓雁的

《第二種忠誠》

(中國大陸作家·美洲)王亦令

歷史上的包龍圖和 今天的劉賓雁

中國大陸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因為發表了《第二種忠誠》而受到壓力，鬧得幾乎要退出文壇。

不管他是否退出文壇，這不是關鍵。關鍵之點是：一、劉賓雁寫了《第二種忠誠》；二、引起了左派的強烈不滿；三、而且受到了各方面的圍剿——幸而這圍剿並非黨中央所發起的運動，看來劉賓雁不致於重新戴上「右」冠吧？！

近幾年來，劉賓雁實際上已由專業作家，變成一個「青天」的形象。專門為民請命，伸冤理枉。宋朝的包拯總算還有皇封誥命，名正言順，不妨稱為專業青天。而劉賓雁則是自說自話地玩票下海的，只好稱為業餘青天。無論這個「劉青天」是由群眾促成的還是自動擔當的，無疑都屬於民營性質。以民營青天而去揭公營官場的老底，其作用和結局決不會比千年前的包青天更好，這是可想而知的。但無論客觀效果和下場如何，對於歷史上的包龍圖和當今的劉賓雁，我都絕對崇拜他們的人品風骨，這一點是不必細說的。

「第二種忠誠」 ——一篇說真話的佳作

本文着重在於《第二種忠誠》這篇作品的評論。《第二種忠誠》這篇作品確是大陸上幾十年來少有的佳作。不僅是「報告文學」中的佳作，在整個大陸的文學界也難找到如此真誠的作品。有些老作家數十年來隨聲附和、俯仰隨人，當然根本不值一提了。即使有人近年來天良發現，翻來覆去唸叨一句口頭禪「說真話」，這比起那些風派文人來確已高了許多籌，但也只是口頭禪而已，除了罵罵「四人幫」、罵罵「文革」外，又能真地說出什麼了不起的真話來呢？

《第二種忠誠》三萬餘字，才是句句真話。作品中記載了兩個主人公——陳世忠和倪育賢，都是在共產黨紅旗下成長的，對共產黨一片忠誠，置一己安危於不顧，直言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指出黨的事業中隱伏的危機，企圖力挽狂瀾於未傾，結果呢，理所當然地都以「反革命」罪論處，幾乎丟了性命。最妙的是，那位倪育賢是在全國上下一片雷厲風行的「批鄧

」聲中，挺身為鄧小平辯護而鋌鐺下獄的，下獄之後並未立即判刑，判刑是在鄧小平復出之後的事。你說怪嗎？在大陸上生活過的人，熟悉大陸官僚體制運作的人，是一點也不以為怪。

像陳、倪這二人的事蹟，大陸上雖不能說成千上萬，但也不能說屈指可數，只是沒有作家肯去寫、敢去寫而已，而劉賓雁却有這勇氣寫！這是董狐式的史筆。這篇《第二種忠誠》的價值就在此。

共產專制制度的冷酷，

比之漢、明封建皇朝， 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作品主人公——陳、倪二位——的勇氣更為敬佩。他們在上書之時，都是明知這會罹下大禍的，而猶勇往直前，至死無悔。須知，這比漢朝的清流之士或明代的東林黨之類還難能可貴啊。因為，歷史上那些直士忠臣，犯顏直諫之後，禍是闖了，人是關了或殺了，但民間私下對其本人及其家屬，完全可以表示同情和敬重，非但從來沒有什麼「劃清界綫」「站穩立場」那一套邪門歪道，而且「忠良之後」這頂帽子對於兒孫講來乃是無上的顯赫和尊榮，這都使那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者在內心獲得極大的精神支助和慰藉。但在共產黨的一統天下，則滿不是那回事，由於每個人都被劃入一定的階級，連鞋帽都對着號，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社會上反革命份子的家屬跟殺人犯的家屬一視同仁，而在監牢裏反革命份子比殺人犯還低一等，往往反革命必須接受殺人犯的監督。誰若不服，要申辯，罪加一等。這就叫「無產階級專政」。最糟糕的是，在這個是非標準皆依附於政治需要的社會裏，殺身者必不

仁，捨生者必不義，誰若血性剛烈、義無反顧，其本人固可一死百了，家屬和親友慘矣，聲討反革命罪行和清除反革命思想影響，可說是沒完沒了。因此，《第二種忠誠》中描寫的陳、倪二人的種種殘酷遭遇，完全是能夠理解的，也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實際上，其根本原因在於整個制度的冷酷和不合理。

陽奉陰違，口蜜腹劍，

是共產黨慣用的手法

爲什麼會那麼冷酷和不合理呢？這就是劉賓雁所沒有回答的問題了。我認爲，主要由於該制度所奉行的指導思想是行不通的，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任何人如果真心實意相信了它，必定倒霉。它擺明着只需要你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的。衆所週知的事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是審查問案時三翻四覆交代的政策，但誰如果真的相信了它，和盤托出，一定嚴處。再有一個例子，「共產黨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是平時和運動中反覆唸誦的，誰若相信了它，也把自己心裏話掏出來開誠相見，正好中它圈套，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共產黨人能夠永遠說真話的，周恩來在「文革」中手捧小紅書追隨於林副統帥之後時，是否隱瞞了自己觀點？鄧小平口口聲聲說「永不翻案」、「擁護華主席」時，是否隱瞞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賢者尚且如此，自槍而下更毋論矣。

劉的人群劃分，

高于階級論的分析

劉賓雁在《第二種忠誠》的最後，把依附於共產黨周圍的人，大致分析爲三種。第一種

是老實聽話、不敢立異的人，第二種是像陳、倪這樣真心信仰馬列主義、不惜忠誠獻身的人，第三種則是永遠獻媚於當時當地得勢路綫的人。

這分析不錯。劉賓雁對人群的劃分，比「階級論」的分析，高明了一千倍。但我要追問一句，爲什麼在共產黨統治下，許多年來，佔上風的往往是最後一種人，而第二種人總是遭殃、受迫害的對象，何也！

「第二種忠誠」

是損己不利人的愚忠

這一點，劉賓雁沒講，我來講吧。就是由於第二種人信仰的東西本身就是虛偽的、百孔千瘡的、沒有價值的。他們這些人，要想爲國王新衣式的真理去忠誠獻身，何來好結果？陳世忠是如此，倪育賢是如此，劉賓雁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據說，鄧小平對《第二種忠誠》也不喜歡。我看，這並不奇怪。鄧大人怎會喜歡呢？因爲鄧大人到目前爲止也不想拋棄這件國王新衣呀，怎會喜歡別人對此刨根問底呢？儘管我承認陳世忠、倪育賢、劉賓雁在品格上都屬於正人君子，值得人們肅然起敬，但在信仰上，都屬於盲人騎瞎馬，我不能附和他們的信仰。

劉賓雁認爲那第一種人是愚忠，而盡情謳歌了這第二種忠誠。殊不知，唯上級命令是從的第一種人無非渾渾噩噩混飯吃而已，骨子裏無忠可言；而正是第二種忠誠，恰恰是很可惜的、損己不利人的愚忠。這就是陳世忠、倪育賢二人的悲劇。又似乎還不僅是劉賓雁一個人的悲劇，而是當前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

（乙丑霜降次日寫於美國加州棲雲閣）

●台灣專欄●

「中央日報」何不

關門大吉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鳴鍵

不久前，一位來自中國大陸某省社會科學院的朋友說，中共中央宣傳部會通知中央社會科學院、各省社會科學院及各大學文科研究所可以通過有關駐外機構訂閱「中央日報」，但內令不准任何單位訂閱「中國之春」。

「中央日報」本是國民黨的喉舌，是台北當局的機關報，然而中共竟能爲之小開綠燈，這是中共的開明嗎？

事實上，國內的內部圖書館裡都有「中央日報」，因此，中宣部的通知似乎多此一舉。但主要地還是因「中央日報」上的反共八股文章對中共來說已是無關痛癢。如「中央日報」上的「大陸透視」一欄的文章，不是抄襲於中共的刊物，就是杜撰盲猜，遠離事實，遠離理性，甚至出現許多名詞、邏輯之錯，以致有時令大陸讀者啼笑皆非。這樣的「中央日報」既已對中共毫無威脅，當然中共不再懼怕。

在我接觸的一些台灣留學生中，我曾見有人接到「中央日報」後，看都不看就丟入垃圾桶裡了。我問他爲何這樣，他則說：「八股文章十足！」我問他「人民日報」上的「今日台灣」一欄如何，他則表示欄中文章還較爲客觀。有人說，國民黨當局把「中央日報」已辦成這個樣子，還不如令其關門大吉好哩。這樣做至少可以把節省的一筆錢，用來向大陸多放幾個汽球，讓大陸人民在田頭休息時能夠觀賞一番哩。

先苦後甜的中美鴛鴦

——記曾驚動中美政府的

衣錫工與莉莎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郭城綺



衣錫工夫婦

在舊金山西南方一百多英里的聖它克魯茲郡(SANTA CRUZ)的一套瀕臨海濱公寓房間裏，我們見到了浸潤在自由幸福柔情蜜意氣氛中的一對夫婦——這就是生長在美國的莉莎女士和來自中國大陸的衣錫工先生。他們的命運和中美關係波折變化息息相關，經受了監獄看守所的洗禮，三年多不通音訊的好事多磨，然而，堅貞的愛情，頑強的鬥爭不息，有情人終成眷屬。在今年二月十五號美國印第安納州舉行的婚宴上，美國總統雷根夫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韓敘，都給他們拍來了賀電，祝賀他們新婚幸福。

弄假成真，雙雙入獄

莉莎，今年三十二歲，但看上去仍然像一個含苞初放的少女，輕盈、苗條、婀娜多姿，五官端正而纖巧，使人十分驚異的是，她是德裔第三代移民，出生在印第安納州，却會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據她說，由於她的祖母會畫

油畫，祖父又喜歡收藏東方藝術的繪畫、雕刻以及各種體現東方智慧的工藝品，她從小就受到祖父母的薰陶，嚮往東方巨龍的中國。十六歲的時候，由於學習成績優異，被學校派送到馬來西亞學習東方語言，以後回到美國，又在丹佛大學以「中國馬克思主義下經濟價值規律的特點」的論文得到了經濟學碩士的學位。一九八〇年六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外語學院聘去教授英語，由於閱讀中文報紙困難，經人介紹認識了衣錫工，作她閱讀中文的老師。衣錫工當時還是北京經濟學院的學生，二十九歲，而莎莉那年是二十六歲，所以交往兩年，就情投意合，遞上了結婚申請。但不巧申請書還未批下，一九八二年五六月間，中美關係惡化。十分戲劇性的是：莉莎小姐住的友誼賓館，組織外籍人士前往北京監獄參觀，藉以表明神州大地司法制度的進步，莉莎參加了參觀團，兩天沒去上課，外語學院的學生誤以為她坐監獄都為她耽心，第三天下午她去上課時，學生們鼓掌歡迎她，并問了她：「WENT TO PRISON」，莉莎當時糾正了學生的文法錯誤，說這樣的問句，變成她去坐牢了，應該問：「WENT TO PRISON TO VISIT」并且把這文法正確的句子寫到了黑板上，想不到弄假成真，當晚她果然受到了逮捕。罪名之一是她閱讀了波蘭副總理奧塔西克來華，在京作的關於經濟改革的中文演講稿。莉莎一向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係有研究興趣，拿到該演講材料時，也并不知道那是內部材料，按照美國的情況，學校據有的材料都不是機密，所以，很難服罪，并且感覺這是對她和衣錫工婚姻關係的迫害。衣錫工在莉莎被捕的那天，恰去承德旅遊，回來後也立即被逮捕，互相無法傳遞信息。莉莎被北京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on your marriage.
May your love for one another grow even deeper and may
your future together be filled with every happiness. God
bless and keep you.*

Nancy and Ronald Reagan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Mr. and Mrs. Yi Xigong
c/o The Wichser Family
213 Orchard Boulevard
Noblesville, IN 46060

美國總統雷根親致的賀函(左)及韓敘大使的賀信(右)。

TH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300 Connecticut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08

莉莎·威克瑟女士
衣錫工先生：

我高兴地获悉你们即将于六月十五日举行婚礼。由于是日我已预先有活动安排，故不能出席你们的婚礼，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希望你们今后能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作出贡献，并欢迎你们将来有机会到中国参观访问。

謹 祝

幸 福

韓敘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市公安局拘留所關了一個星期後，即被勒令四十八小時內離境。她終日以淚洗面，祇想在離開中國前能見衣錫工一面，但中國當局拒絕了她這完全正當的合理要求。她在回到美國以後，由於不明衣錫工情況，每天翻閱報紙，最注意看的就是中美外交關係問題。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去南韓，使她心裏忐忑不安，唯恐影響中美關係；胡娜事件發生後，又唯恐中美斷交，使她和衣錫工這一對情侶天長地久地不能見面。她深深感覺，她個人的命運，和中美兩國的外交關係緊密糾纏，息息相關。每天讀報，都注意美國有哪一位議員或政府官員，對遠東問題比較關注，她就立刻掛去長途電話，請求援救她的愛人衣錫工，她的父母、祖父母，也都為這個女孩子難解難分的癡情焦慮萬分，給白宮寫信，請求雷根總統給予幫助。莉莎本人，以前就是科羅拉多州(COLORADO)美中友好協會的主持人，而如今，這美中友好問題，也與她個人情之所鍾，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緊密不可分割。為此，她四處呼籲，為自己呼籲，為美中關係呼籲，以致印第安納州的參議員 RICHARD LUGAR 一拿起電話，就聽得出她的聲音，笑問又有什麼情況？

中美關係好轉，衣錫工被釋放

一九八四年四月，雷根總統訪問北京，國務卿舒爾茲帶去了印第安納州參議員 RICHARD LUGAR 和紐約眾議員舒拉爾效的兩封信，轉遞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內容都說美國有一個很苦的女孩子莉莎，她想念她在中國的未婚夫，請求中國政府能夠關心這一對相親相愛的情侶，讓他們能

夠結合團圓。這個時候，作為未婚夫的衣錫工，却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關了半年，又被判在市郊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體重減輕了三十多磅，每天做了苦工下來，也是在拼命翻閱報紙，提心吊膽於中美關係的變化，唯恐千里姻緣一綫牽的這根細線，在國際政治風雲中突然折斷。雷根總統訪華後，又經過半年多時間，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號，中美關係好轉，衣錫工才突然被釋放。勞改農場的領導當時祇向他說了非常簡單的一句話：「你可以去了！」這「去了」兩個字，到底是宣判無罪釋放，還是提前解除勞動教養，情況不明。衣錫工也不敢問。回到北京家中，左思右想，不敢輕舉妄動，唯恐隨時隨地，又把他抓回去，繼續勞動教養。

越洋電話，情意交融

衣錫工雖然也同樣苦苦思念着莉莎，但不敢貿然寫信，因根據他的結婚申請，逮捕前未批，但也未說不准這一條，去向外交部請示，外交部接待人員第一次回答的是：必須請示領導，第二次回答的也是必須請示領導，但又指明他和莉莎的結婚申請遞上去已有三年之久，雙方又未通信（莉莎怎敢給衣錫工去信，再連累於他使他加刑呢？），誰知這個美國姑娘如今是否另有所愛，已經變了心，又誰知她是否還願和他這麼一個勞教釋放犯結婚呢？

衣錫工想到這些，眼淚祇有往肚子裏流，他想既有此疑問，也不必再寫信通過信件檢查拖延時間了，索性掛越洋電話，直接問他的未婚妻。公安部門如果認為這不合法，他可以向外交部請示滙報。於是，他奔到電話局，掛了長途越洋電話，那一天，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二十號，莉莎正在她弟弟家準備過聖誕節，當電話轉接到她弟弟家時，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她想不到今生今世，還能有和心中所愛的人對話的時刻，她在電話中起誓，她永遠愛他，願意嫁給他，在太平洋的兩岸，這兩個手執電話機的情侶，在那同一的時刻，都哭了。

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衣錫工在得到了莉莎的肯定答覆希望他去美國結婚之後，立即向有關部門交涉畢業文憑問題。他是在面臨畢業的前一個月，已經交上畢業論文之後，被公安局逮捕的，有關部門起初留難，但衣錫工在學校也是成績優秀的高材生，論文通過毫無問題。經不起衣錫工據理力爭，請示領導到一九八五年三月，終於發給了衣錫工大學畢業文憑。學士證書始終沒有給他，他實在無心也沒有時間去糾纏了。三月十三號，衣錫工從太平洋彼岸飛來美國，莉莎一刻也不肯耽誤，三月十五號，他們在聖塔羅薩（SANTAROSA）登記結了婚，在法律上成爲夫妻。愛情是不分國籍、種族的，人類的正義終於得到了勝利，地球之上，天空之下，奮鬥了三年多的這一對有情人終於結成了眷屬。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衣錫工和莉莎又在印第安納州補行了婚宴，州的美中友好協會人員全部趕來慶祝。莉莎的九十二歲的祖父，一直耽心自己年事已高，會見不到這個華裔的孫女婿，在見到了衣錫工後，開玩笑地向孫女兒說：「我不喜歡他，但我愛他！」八十六歲的祖母開了車，帶了孫女婿兜風，參觀印第安納州的名勝，兩個老人家對家中豐富的東方藝術收藏又增添了一對景泰藍鑲珠寶的龍頭拐杖工藝品，也十分高興喜歡。

神州大地，法治人權何在？

莉莎爲了營救衣錫工，爲了堅持愛的結合，在這互不通音信、無法通音信的三年多中，掛出了不知多少長途電話，發出過多少信件，郵資用去多少不講，光是長途電話費一項，就超過了兩千美金，使他們至今還負債。這兩千多美金的電話費，不是一個金錢數字，而是他們之間愛情力量偉大的見證。偉大的愛情，雖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但這一對情侶的故事，却使我們不能不深思：人世間傳統觀念多麼可怕？神州大地的法制與人權何在？沒有充份的罪證材料，輕易地逮捕拘留，沒有任何罪名就隨便判決勞動教養，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爲，使人們在與美國的自由、法治、人權、民主相比較時，正負分明。在美國，人民能隨意找議員幫忙，議員關切普通人的生活幸福，這在中國是可能的嗎？筆者在問到衣錫工，是否曾將逮捕拘留的不合法上訴時，衣錫工回答的是「怎麼敢？」是啊！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人們已習慣於逆來順受，習慣於被踐踏人權，老百姓中間，甚至有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天賦人權」這四個字。十年浩劫，四人幫所以能夠橫行無忌，以法西斯手段，假社會主義的名義而行，正在於此。「你可以走了！」這幾個字，當然是莉莎三年奮鬥的結果，但如果沒有國際的制約，輿論的影響，衣錫工也許至今仍不能走，莉莎對自己再去中國的「不過」兩個字，個中辛酸滋味，恐怕也祇有讀者自己去體會和思索。因爲，至今她認爲他們的故事，是一個悲劇，祇是添了一個喜劇的結尾而已。

祝願他倆幸福，也祝願天下所有相愛的人幸福！

太子黨面臨的新挑戰

(北京)柳平

共產黨仍搞世襲 老百姓極表不滿

近幾個月來，中共在幹部的新老替代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效，不符合「四化」的大批老幹部被迫辭退，符合所謂「四化」的大批黨、政、軍幹部子弟紛紛接班。年輕人接老年人的班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中共選拔的接班人，很多都是幹部子弟，這對廣大的平民百姓來說，是極不公平的。不錯，有些被選拔的黨幹子弟也很優秀，他們有資格接班，但在廣大的平民百姓中也有很多青年才俊，他們也有資格接班，只是由於他們的老子不是黨員幹部，所以他們接不了班。難道許多有志的青年才俊，要為國為民出力，就必須入黨或必須有一個做官的老子嗎？

幾十年來，中共震天價響地向人民宣傳，說什麼社會主義制度是至今人類史上最先進的制度，說什麼我們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等等，以為人民愚昧可欺，事實上，才不是哩。對於統治者的那一套，人民向來是心知肚明的。不久前，我出差路經某地，聽到當地老百姓新流行的順口溜：「朝裏有人好做官，老子權大兒上天。」充分表現了人民對中共接班制度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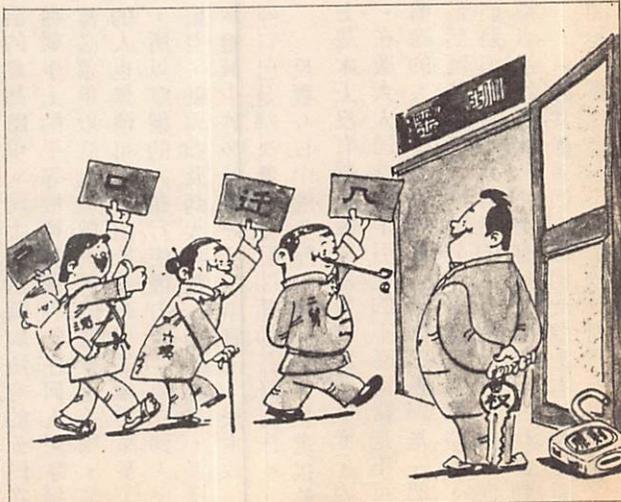
後來我也在北京的市民中聽到有人發牢騷說：什麼接班人啦，第三梯隊啦，全是騙人的，都是為本質上的世襲制度巧立名目。說穿了，這種接班制度還不如封建統治者所推行的科舉招賢制來得公平哩。在科舉制度下，一般平民百姓憑着才學，通過考試，至少還能得到個平等競爭的機會。今天可好，一切都要憑老子的餘蔭，老百姓連個平等競爭的機會也沒有了。老百姓不滿的情緒，由此可見一斑。

貴公子飛黃騰達

賴老子權隆勢重

中共這種選拔幹部的制度，不僅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滿，而且也引起了大批未能升官的幹部子弟的不滿。

據北京一個部級機構大院的調查資料，最近幹部子弟中，獲大幅度提升的不足百分之二十，約百分之八十的大多數幹部子弟升不上去。其次，北京軍區所轄的一個軍，從軍部及其支屬機關到團部營部，十三級以上的高幹子弟計有八十多人，最近升至副師級以上的只有十一人，僅佔約百分之十四，可見未升官的佔大多數。在這權力至上的國度裏，這一大批未得封侯的幹部子弟，對黨在權力分配上的不公，當然極為不滿。



“打开后门迎亲人”

锡龙

有一天，我和北京軍區大院中的幾個未升官的朋友一起喝酒，有個朋友滿腹牢騷地說：「哼！打江山是我們的老子一起打的，可升官時，只有他們幾個，而沒有我們這些弟兄們，這叫什麼同甘共苦？」

「是啊！」第二個朋友插話說：「論學歷，我是軍事院校的優秀畢業生，論軍齡，我不比他們幾個人低，可我升官就升不過他們。」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自有權謀」，至今已長成多年，可就是有謀無權。」

第三個朋友喝得略有醉意，不以為然地說道：「誰讓你不會拍馬屁哩？誰讓你不會迎合上司的心意哩？誰讓你的老子不權隆勢重哩？你看我不具備這些條件，根本不想那臭官，不也是自我感覺良好嗎？哈哈！來，乾一杯弟兄們！」

無官做牢騷攻擊 各自謀從商出國

這一批未升官的幹部子弟中，有些人除了暗地裏向黨的政策大發牢騷和攻擊外，却也有幾個趨向：

第一個趨向就是從商。近幾年來，在鄧小平大力提倡人人「向錢看」及宣揚「萬元戶」的影響下，「金錢」確實呈顯了它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從未有過的引誘力。許多幹部子弟，既然升不了官，也就只有退而求其次，改行從商賺錢了。軍隊中的有些幹部子弟，已不再留戀昔日被稱為「獨立王國」的軍隊，而是鬧着要求退役。他們從軍人改成了商人或企業主，成立了各種名目的公司，主要類型有諮詢公司、貿易公司及綜合性公司，其中有許多都是「皮包公司」。他們憑着其老子的權力關係，到處大搞倒賣進口物資和一些緊俏物資，進行買空賣空，有人確實也賺了不少錢，甚至發了大財，或成了萬元戶。

有一位經商發了財的幹部子弟曾得意地聲稱：「今日他們抓權，我們則要抓錢，等到金錢萬能時，說不定他們還不如我們哩！」

不過將來金錢萬能時，那些升了官的幹部子弟亦不會只有權而無錢，因為今日許多在職的黨政軍機關幹部都是亦權亦商，既抓權又抓錢哩。

第二個趨向是出國。近幾年，國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大陸人民的引誘確實很大，出國簡直成了一個最時髦的事情。若聽說某人將要出國，馬上，週圍的人都會向這人投送極為羨慕的神情，真是「士將別，則刮目相看」！有些未升官的幹部子弟，當然也不會放棄這個令人羨慕的途徑。有些人沒有海外關係（親友

關係），就借用其父母的職權與外國人拉關係，如有時一些單位幹部與外國商人簽合同時，就要求外國人幫其子女出國，否則合同簽不成。總之，要想盡一切辦法出國。

有些出國的幹部子弟，基本上有三種打算：一是有人要做紅色資本家；二是有人在國外渡過金後，再返國當官；三是留居外國，為自己的家庭創造一個可靠的海外關係，有這種打算的人對中共大多都已失去信心。

據說有些已出國的幹部子弟，先通過內線打聽自己是否已被圈定為第三梯隊人選，若已被圈定，那當然要回國當官；否則，就設法留在海外，做紅色資本家。

第三個趨向是遷居特區和香港。近幾年，有一個順口溜在大陸人民中廣為流傳，即「工農兵學商，人人都經商；東西南北中，個個去特區」。就拿深圳來說吧，深圳原來只是一個幾千人口的小鎮，被設立為特區後，大量人口湧入，現約有五十多萬人。越是這麼人人嚮往的特區，對人口的遷入的限制當然很嚴，一無關係二無特權的一般內地老百姓要想遷入是不可能的。但特區還是有那麼多人遷入，其中當然有不少幹部子弟，因為幹部子弟可用「特權」這把「鑰匙」打開一切「原則」的「鎖」，然後推門而入。

除了進特區外，也有的幹部子弟通過各種關係進入香港，儘管遷居香港要比遷入特區難得多，但有權的人畢竟有辦法。

太子黨雖步青雲 新挑戰却是難免

從上述可見，少數太子黨雖登上權力的寶座，但也面臨着新的挑戰，這新挑戰不僅來自老百姓，而且來自黨內的幹部子弟。其根本原

因就是中共權力的移轉沒有民主制度化。

任何政治體系的中心問題，歸根結蒂，是權力的分配和行使問題。在任何政治社會中，想掌權的人總是很多，但能掌到權的人總又是少數。在權力的金字塔上，越是往上的權位，競爭越是激烈，一旦到了塔頂，一般在一個時期內只能有一人會坐上這個權位。因此，掌到權的與未掌到權的總會有或明或暗的矛盾發生。事實上，這種矛盾在人類歷史上是層出不窮的。在一個具有封建特色的專制國度裏，掌權的人在行使權力時往往又是強制的，不顧民意的，因此，原有的矛盾更被激化。

在解決權力分配問題上，近代西方的民主國家做得較為成功。他們知道要實現權力分配上的絕對平均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却可使權力分配盡可能平均，並以民主選舉的方式，使權力的交替民主制度化。這就是今日西方民主政治的最高體現。民主政治賦與所有的公民在各種競爭上的平等機會和權利，任何人想掌權，都必須爭取到大多數人民的選票，否則，落選的人也無情可怨。由於執政者的權力來於人民，所以掌權的人在行使權力時就要受到人民的監督，就要顧及到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這樣自然會減少許多社會矛盾。事實上，民主政治在今日已是解決權力分配問題的最好方法。

反觀今日中國大陸，由於中共在選拔幹部上基本上沒有擺脫極為落後的世襲制度，因此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引起的不滿情緒是不可能消除的。其中黨內幹部子弟的不滿則是一個較為活躍的因子，一旦到了某個適當的時機，他們將與同有不满情緒的老百姓聯成一塊，向掌權者進行挑戰，甚至有可能引發大的社會動亂。

新的當權者們，我們的政治有這麼嚴重的問題，為什麼還不改革政治而實行民主呢？

國共和談

中國走向民主多元的契機

李兆陽

作者簡介：李兆陽，男，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某大學主修理工科，但對社會科學亦有廣泛涉獵。

爲什麼說第三次國共和談是中國走向民主多元的契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需回答實行民主政治的決定性條件是什麼；然後我們再分析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看是否中國已具備這種條件；若是具備了，那麼我們將如何把這條條件應用到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上；最後，我們再論述國共兩黨如何談判才能開啟中國走向民主多元的契機。

多黨政治是民主制度的 的決定性條件

一個國家是否能走向民主，無疑其因素是很多的，如語言、種族、宗教、文化、地理、經濟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

自馬克思學說問世以來，許多人便以經濟基礎決定論來解釋相應的上層建築。於是，許多人認爲至今中國之所以沒有實現民主，乃因中國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經濟落後，等等。於是，許多人將中國的希望寄托在當前中共的經濟改革上，認爲中共的經濟改革成功了，必然會促使政治上的民主化。

筆者針對上面諸說進行了一番研究後，發現上述說法有很大的錯誤性。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當上層建築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政府迫於人民的壓力，較能及時地來調整上層建築，以使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在一個集權專制的國家裡，政府往往不給人民表達意願的自由，統治者把人民當作愚不可及的阿斗，因此人民不能把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反映出來，統治者也不會自願地去改變上層建築。只有到經濟面臨崩潰時，統治者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才不得不作出一些改革，但這種改革往往是皮毛的調整。因此，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無疑有頗大的影響，但無必然的決定性。

有人說民主是工業發展的產物，經濟落後的農業國不可能或難以走向民主。這種說法是否正確，讓我們先看一看一些民主國家的歷史事實吧。瑞士、瑞典、挪威、丹麥、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等國，都是民主國家，但在它們於很多年前開始實施民主政治時，其經濟都是以落後的農業爲主。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經濟不會比今日中國的經濟發達吧，但美國已實施民主政治近百年了。事實勝於雄辯，經濟落後的農業國也可實行民主。

近來出現一些憲法論者，認爲中國之所以不民主，乃因中國沒有一部充份反映民主的憲法做基石。他們認爲中國若有一部像美國或法國那樣的憲法，走向民主是沒大問題的了。

不錯，一個國家要實施民主，需要一部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憲法作基石，但不要因此忽略了使憲法條文生效的權能因素。也就是說一部民主憲法制定出來後，關鍵要看執行憲法的權能機構是否民主，或行使憲法的權能機構是否有其它的政治勢力的監督和制衡，否則，憲法猶如死的文件，本身無任何的約束能力。蘇聯憲法「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部份中的條文，寫得多麼民主，多麼漂亮，然而蘇聯則是一個鐵板一塊般的集權專制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亦賦與其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權，但事實如何，人人皆知。反觀英國至今並無一部完整的成文憲法，但英國是一個最早走向民主政治的國家。

一塊石板，上置重大物體，若將支點平均三分，石板或可支撐；但若將支點移到中間，餘則抽掉，當物體的全部重量都集中在一個支點上時，石板則顯得脆弱不堪，一壓即破。同樣，在一個一黨集權專政的國家中，憲法這塊

基石亦是極其脆弱的。

那麼維建民主制度的根本力量究竟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政治權上的各種制衡力量。縱橫當代各民主國家，其政治力量幾乎都是多元的。這種政治上的多元具體表現在多黨共存、平等競爭、彼此制衡等方面。如英國、美國、法國、瑞士、瑞典、日本、丹麥、挪威、意大利等民主國家，都是實施多黨政治的。例如日本自民黨，幾十年來雖是一黨獨大，但它與一黨集權專制不一樣，因它獨大的同時，其它小黨仍有平等機會與它競爭，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日本各小黨在議會中都有不同數目的議員。反觀不民主的中國與蘇聯，都是一黨專政的國家。

當代民主國家中，有些國家的制衡力量來於各政黨之間或來於民眾和壓力團體等，但也有制衡力量存在於政府機構之間或政府機構之內。但主要的則是政黨之間的制衡力量。因此，筆者認為，中國要走向民主，就要朝多黨政治的方向上發展。一旦形成政治上的多元後，必然會帶動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多元化的發展。有人講多黨政治是民主制度的橋樑，此話是不過分的。只有在多黨政治的力點下，民主憲法的基石才更堅固可靠。

中國正具有多黨政治的條件

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至今仍保持着國共兩黨隔海相峙的政治局面，再加上兩岸新政治勢力的興起以及香港可能出現的新政黨，都為多黨政治提供了組織條件。這真是天意，是中國人民的一大幸事。試想中國假如不存在香港和台灣問題，假如不出現一個文革浩劫，那麼，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則會像蘇聯一樣的鐵板一

塊，那麼中國要走向多黨政治，走向民主，則是難上加難。

在文化意識等方面，中國人向來較能獨立，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精神較強，因此，一旦中國人認識到自己民族的利害關係後，總不乏有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出現，將中國引上正確的方向，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君不見近年來中共一再宣揚民族英雄們嗎？當然，任何時候都可能有民族的敗類出現，但他們早晚會被人民唾棄的。

今日，相峙中的國共兩黨，以及新興起的政治實體，猶如一堆建築材料，要想使這堆材料共同組成一個房子，還需請建築師傅來建造，把一些材料該鋸的鋸，該接的接，以便適應所設計房子的要求，這房子的架構就是多黨民主政治的架構，這房子的建造過程就是國共及其它政治實體的共同談判過程。中共現在不是在為「統一」而要求談判嗎？國民黨可以說，好，不過只咱們兩個「材料」不夠，還要其它的「材料」，然後還要設計一個多黨民主政治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上，完成「統一」大業。有人會說，中共的目的是只談統一，不談民主。但我們應要求中共先談民主，後談統一，中共若不答應，必招致更多的輿論壓力。若答應，則可引勢利導。須知世界上許多事物發展的結果往往與其初衷相違，歷史猶如河流，開道可引其流向。何況今日民主的潮流，早晚會衝破專制的堤岸，奔向歷史的遠方。

中共會改嗎？

有人說，中共本質不改，國民黨就不可能與其談判。我要問，中共若能自動改其本質，

走向民主，那麼國民黨的存在對中國人民來說還有多大價值？中國民主運動還有那麼必要嗎？古今中外有幾個專制統治者會主動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但在外在的巨大壓力下，並非沒有使他們還政於民的可能。英國從君王專制走向民主政治，是英國君王不戀權嗎？不是。是貴族和人民向君王施加壓力的結果。日本從天皇軍國主義走向議會政治，是日皇自願的嗎？不是。是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使然。國民黨到台灣後不也改了很多嗎？中共近幾年來不也改了一些嗎？這都是形勢所迫。

不錯，中共本質難改。然而正因其本質難改，才需我們聯合各種民主力量，抓住各種機會，去積極接觸它、影響它、進而改變它。只靠隔海叫口號，讓它放棄四個堅持，是不可能的。

還有人說，大陸經濟太落後，統一條件不成熟，不能談判。我認為，正因大陸經濟落後，國民黨才應談判，因國民黨這時可拿自己在台灣的政經成就作為談判的法碼。再說大陸經濟落後在大陸，談判總不會降低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吧。

願望與現實

有人認為，國民黨若與中共談判，台灣人民會因恐共而亂起來，會擔心國民黨出賣了他們，或擔心上了中共的當，以致國民黨為了免於亂局，為了偏安，堅持「三不」政策。不過，這種做法真能保障國民黨在台灣偏安下去嗎？幾十年來，台灣朝野都心知肚明，一個集權



蔣經國



鄧小平

專制的中共，始終是對台灣的最大威脅。這種威脅，近年來不僅存在於軍事方面，而且也存在於經濟等方面。不消除這些威脅，誰也不知道台灣能偏安到何日。如何消除這些威脅呢？最好方法莫過於去接觸它、影響它、改變它。中共在延安窯洞裡的時候，所受的威脅多麼大，但中共藉着談判把威脅消除了。

不錯，與中共談判，會冒一定的風險，但這些風險，國民黨是應該有能力、有辦法預防或避免的。例如，國民黨可先把各種利害關係向台灣人民詳加解釋，並聽取人民的意見，然後表明自己的立場，並耐心說服人民，讓人民認識到，一味的恐共是不會消除威脅的，消除威脅的最好辦法則是勇敢面對現實，積極去改變中共，在談判桌上迫使中共接受有關實施民主政治的方案，大陸走向民主後，威脅也就消除了，台灣人民的安全也就有了保障了，等等。所以，談判不是投降，絕不會損害台灣人民利益。當然，談判時能有台灣民意代表參加，台灣人民則更會放心了。另外，國民黨為防中共的陰謀顛覆，在必要時期內，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相信台灣人民亦會諒解，只要向人民解釋清楚。

有人會問，根據前兩次的國共合作和不久前「中國之春」公佈的中共有關統戰的機密文件，證明中共從來沒有談判誠意，你為什麼還要主張與之談判呢？我認為，前兩次國共合作的時代背景與今迥然不同，加上經驗教訓，今日再談不應再上當受騙；今日中共仍無誠意，那國民黨則可來個變假成真；中共要談的內容是政權上的統一，那麼國民黨則可避實就虛，來個順手牽羊，不談政權問題，先談民主政治。

須知願望常是美麗如意的，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無情的。台灣朝野是該面對現實的時候了。

國民黨的兩個法碼

在與中共對等談判時，國民黨至少有兩個法碼可用，即經濟成就和民主程度。這兩個法碼對大陸人民都有一定的份量，不過這種份量也只有在最近幾年才能顯示出來，因大陸最近幾年正缺少這兩方面的成就。反觀中共現在有什麼法碼呢？口號雖然響亮，却無貨真價實的法碼。至於民族主義，由於時代和平的發展，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那種號召力。因此，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是沒有理由怕談的。

幾個名詞的不同含義

我發現許多人往往把「和談、合作、統一」三個名詞混同起來講，好像這三個名詞是同義詞似的。例如，我若主張和談，准會有人說現在條件不成熟，不能統一。嚴格來說，我主張和談，絕不等於我主張現在就統一。同樣地，亦會有人說前兩次國共合作，國民黨都吃了虧，所以不應再合作了。這種人無疑錯把和談當合作了。

和談（Peace talk）一般是指對峙中的雙方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而作出的和平談判。和談成功，雙方可能會化敵對為友誼，化衝突為和平共處，也可能使雙方走向合作、走向統一戰綫，但也可能產生其它結果。和談失敗，當然也會產生與雙方願望相反的結果。我這裡之所以主張和談，是期望藉和談開啟中國走向多元政治的契機，而非合作或統一。

合作 (Cooperation)，顧名思義，即聯合起來共作某些事情。較鬆散的合作意即彼此互不敵對，互不搗亂，但彼此和平競爭，即為合作。民主國家的政黨大多都有這種合作。較緊密的合作如國共兩黨的前兩次合作，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保守黨、勞工黨和自由黨的合作 (Coalition)，這種緊密的合作的特點是，彼此不再競爭，而是一致對外，組織運作基本上統一步調，彼此失去了較大的獨立性。事實上，這種緊密的合作已近似於統一戰綫，但不等於統一。

統一 (Unification)，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元統一成一個單元，一般意旨領土和主權上的統一。但統一與統一戰綫 (united front) 不同。

至此可見上述三個名詞既不是同意詞，又不是近意詞，更不是反意詞，而是各自獨立的三個詞。它們之所以被人們常混起來稱，乃因三詞在幾十年來的中國史上有一定的關係。例如，要想以和平方式統一中國，必須要經雙方或多方共同和談。但和談也可能會產生其它結果。

現在我們該清楚了吧，主張和談的人並不等於主張現在就統一，也不等於主張兩黨再合作。既不與中共搞政權上的統一，又不與中共在組織上的合作，而只是與中共和談，相信不會有太大風險吧。

至於國共合作，和談若能成功，我則主張較鬆散的合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但我反對較緊密的合作（除非特別需要外），因現在不同於前兩次國共的緊密合作時的背景，據英國人對英國政黨平常時期的緊密合作也不滿意的經驗，一般還是不作緊密的合作較好。另外是政黨之間在平常時期的緊密

合作有害於民主的發展。兩個物體結合的越緊密，彼此之間的磨擦力也越大，政黨關係亦如此。

和談——民主——統一

近幾年來，中共拉民族主義之大旗作虎皮，大喊祖國要統一。但不幸的是，這個大旗確也罩住了不少被私利沖昏頭腦的人，他們只看到「統一」這個名詞，却看不到中共所謂「統一」的實質，更看不到更為中國人百年來夢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真是「一旗當面，不見泰山」。中共所謂的統一是什麼呢？中共早已表明，統一後，台北政府可作為一個省政府存在，可以保持原有的制度和軍隊等，總之台北國民黨只要掛起五星紅旗就行了。鄧小平曾於一九七九年表示：「我們對台灣別無他求，只要求他們變更中華民國稱號。」多麼一廂情願。集權專制的大一統觀念多麼明顯！可見中共的民族主義口號是空泛的，專制主義才是中共所奉行的。否則，中共為什麼不以「民主主義」為號召來達成統一呢？豈不知只有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中華民族才能振興嗎？

中共為了在政權上達到專制的大一統目的，把和談當作一種手段。圍繞其目的，在談判時中共所要談的必是國號、國旗等問題。中共的統戰程式是：和談——統一（政權上的）。針對這種程式，國民黨不妨來個新程式：和談——民主——統一。中共不是要談統一嗎？但統一要有個條件，大陸經濟落後暫不談，但要先談談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問題。我們可以把祖國統一作為一個長遠目標，把中國的民主事業作為一個近程目標，所以我們要先談如何達到這個近程目標，而非談國號、國旗等遙遠問

題。通過成功的談判，經過數年的實踐，各方認為這個近程目標確實達到了，那麼到達下一個目標也就不難了。

圍繞上述近程目標，國民黨和民意代表在談判時究竟要提出什麼要求呢？筆者認為，首先要迫使中共讓大陸人民切實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集會等自由權，讓海內外中國民運團體在大陸合法活動，允許他們出版並發行有關宣傳品、釋放獄中所有民運人士及政治犯。也要迫使中共從憲法上刪掉「四項原則」，「四項原則」可作為一般教條而存在，也可僅作為中共黨綱內容，但不能作為國法，不能強迫人民去堅持。有人如果堅持，他可以個人的自由權去堅持，但不能迫使別人去堅持，人民有不堅持「四項原則」的權利。中共也不能以自己的學說、主義或教條去排斥他人的學說、主義或教條，所有思想學說都應共存。因此，國民黨亦有權去大陸宣傳自己的主義或思想學說等。為了使中國走向多黨政治，中國人民應有和平組黨的合法權利，全國各黨派，不論大小，都應和平共處，平等競爭等等。

不過，國民黨若真能這樣做，當然也要在臺灣好好地實施自己的民主政治了。中共若真能接受並實施上述要求（暫不管我們是否一廂情願），那麼過上幾年後，讓各方代表和人民鑒定兩岸的政治是否達到預期目標。若已達到，則可讓商召集制憲會議，重建民主的中國政府，到時國號、國旗自會有新的產生。從此中國永遠統一、永遠民主。

國共兩黨若真能作出重建民主中國的壯舉，相信人民必能恕其前過，再次支持兩黨。中國的歷史河流，又流到了一個分水嶺，在這歷史關頭，誰能引導歷史走上民主的河床，他的功績就將與歷史永存！

愛國主義與「集體治療」

美國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教授／孫隆基

讀了貴刊七月號張諄的「巴黎的狂思」，有一點感想不得不說。該文敘述張諄在巴黎「中國之春理論討論會」上公開反對愛國主義，遭到與會者一致抨擊，甚至有人高喊「中國榮就代表中國文化」作為證據！

我不至于相信所有「中國之春」的群眾都是這樣，但這十幾年在海外却的確看到一種現象，那就是：身在海外的中國人有將政治運動當作「集體治療」的傾向，至于在表面上抓到那一種意識形態，則有賴時代的偶然因素。如果在七十年代中共當紅之時（甫入聯合國，尼克森前往「朝見」，中國在第三世界聲望如日中天），有「集體治療」需求的人就會蜂擁而成「左派」，在八十年代之今日，大多數人對中共幻滅了，同樣性質的群眾也有可能依附到民主運動身上來。

無論如何，這類「集體治療」總有一個不變的基調，那就是「愛國主義」。在七十年代，我就親眼看見這多數人在愛國主義外，還附會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在他們身上却如水過鴨背。蓋這類「左派」在骨子裏可以是大中國主義者，法西斯式的血緣論者，甚至可以是希特勒崇拜者（例如，有些人對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滅種，心中有一陣莫明奇妙的快感。然而這些老中本身既非「金髮獸」，亦非猶太「

次人類」，却以第三者身份而對此慘劇快感一番，可見祇是崇拜強權的一種「意淫」。令我感觸的一點是：同屬攻讀碩士或博士班水平的第三世界學生，他們搞起馬克思主義來，就從不至于像這些老中那般呈現出如此幼稚的感情構造。

具有同類「集體治療」需求的人，到了時移勢易的八十年代，自然也會攀附上另一種政治運動。但不論表面的外套如何變換，這些人總跳不出如下的「心路歷程」，亦即是：隻身來到海外，在洋人的國慶中感到「孤冷得很」，自己也沒法確立生存的目標，於是就參加了自己人的一種團體，並感到「終於找到了家」，而恰好那個時代流行某一種意識形態的風尚，於是大家遂一起找到了一個可以「回歸」的娘胎！

「集體治療」與美國式的個體治療有最大的一個不同點：個體治療是當個人感到自己生命出現偏差時，試圖找一種方法將心中積鬱的情緒予以疏導，並發洩出來（let it out）。而「集體治療」的發洩方式却有異於此，那就是個體形式的生命力根本無力（也不敢）發揮出來，却一味躲在集體之中，大家結合起來借一個抽象的（亦即是抽離了個體生命層次的）渠道作懦夫式的宣洩。而平常吃癩的個人，也就在集體這面哈哈鏡的反映中，獲得了扭曲的惡性膨脹——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合群愛國

的自大」。

我並非說：愛國主義基本上要不得。微結在於：如果不是正值國難當頭之時刻，却把它搞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感情寄託，一種宗教的話，那就有點問題。的確，如果一個人每天淚光閃爍地唱：「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我們就不禁懷疑：該人在個體生命層次上是否有點「太監化」！

今日的美國就有愛國主義抬頭的傾向，雖然還不至于淹沒了他們的個人主義，但筆者總認為有點不健全，至少六、七十年代反戰與民權運動時代的美國人的氣魄是消沉了，代之而起的是種族歧視的死灰復燃。

至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亦多非理性表現。例如，今年北京足球賽中國隊輸了給香港隊，就激發了義和團式的暴動。在一九八二年，我於香港也目睹當地人杯葛日本文部省篡改侵華歷史的行動，這應該杯葛，但香港在從英佔轉移回日佔的三年零八個月的那一段歷史，在平常大家都是漠不關心的，不用說沒有設立陳列館，甚至連一部小冊子都沒有出現過。香港人平常對中小學校教科書中「鴉片戰爭」被篡改為「通商戰爭」也從未吭過聲。然而，中國人一般是可以氣得過西方人，就是氣不過同屬黃種等級的日本人。因此，如此「杯葛」法，也可以算是吃癩了的個體找集體渠道宣洩之類。

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前途，對國家的起碼關心是必要的，但在正常的環境下，任何愛國主義的惡性膨脹却總會更接近法西斯式的情緒。問題在於：中國人儘管可以談各種「主義」，但絕少能提煉到理念的層次，而往往總不免下墜於情緒化的大泥沼。談「民主」固然絕非犯法，但得視是否達到申請搞民主的「駕駛執照」的年齡。

我對評價毛澤東的看法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方庸魯

毛澤東畢竟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跡。



編者按

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一稿，作者方庸魯先生在附信中言及，他作為自費留學生，既無黨票，也不是文革受益者，但身處異國，不無愛國憂民慮華夏之心。對本刊總廿六期某些文章，認為毛本人是一個「具有農業社會主義和帝王思想」的封建皇帝說，雖然同意有許多事實作為證據，絲毫沒有懷疑，但又認為作為評價統治者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文章，仍是不足的。為此，願在反映幾個歷史問題的評價上，闡述自己的看法，以期拋磚引玉，並要求本刊給他一點「民主」，發表此文。我們認為這個題目很好，文章觀點也很鮮明。毛澤東的功過問題，在中共「十二大」會議期間，雖有人曾提出「建國有

功，治國無方，文革有罪」，黨內的討論是否充份地各抒了己見不知，但黨外群眾的看法，至少並未在報章雜誌上集其大成，甚至未略見一斑。而其實，在中共卅多年專制統治下，人人歷經大小運動，對領袖的功過，內心各有己見。文革中，人人被強制跳忠字舞，朝請示，晚報告，為了生存背誦語錄，心中也難免各有所想。文革三中全会以後，街頭巷尾，議論紛紛，見仁見智，意見大相逕庭。為此，我們希望在本刊發表方先生一文後，能收到讀者踴躍來稿，如可能，或開闢專欄，集思廣益，展開討論。如毛澤東的千秋功過，也該由民間眾人來評說。當代人評述當代，也許有局限性，只是，當代人不評，史料失傳或失真，後代更有何說？不知讀者們以為然否？

一、不應帶着個人感情

評價毛澤東

關於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評價問題，實質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關係到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外政治評論、歷史敘

述很多。一般分為兩大觀點，批判或是頌揚，有人並且以此作為劃分個人政治立場的標準。目前，輿論界的傾向是批判多於頌揚。但是，如何站在歷史的角度，用客觀、公正的態度去評論毛的歷史地位，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怎樣的態度才是客觀、公正的呢？

我以為，衡量一個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應該看其在歷史行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不要帶着個人的感情或遭遇去論證。我不否認，許多歷經苦難磨煉的歷史人物，他們對政治問題的實質、見解往往是深刻的。正如法國作家小仲馬描述過的那樣，只有經歷過死的痛苦的人，才知道生的價值。在貴刊上發表文章或講話的作者，有許多都是在毛的政權下受過煎熬，自然有許多深入肌膚、切身的體會。因此，貴刊多數文章反映出一個共同的觀點，認為毛的政權是「專制制度」，毛本人則是一個「具有農業社會主義和帝王思想」的封建皇帝（中國之春月刊第廿六期第卅二、四十九頁）。在毛的統治下，中國人民「受過無邊苦楚」（中國之春月刊，同前七頁）。這一觀點的確立，是有許許多多的事實作為論據的。根據的主要來源是作者本人的親身感受和耳聞目睹。我絲毫沒有懷疑這一點，並且還可以提出類似的例子作為佐證。但是，某些個人或集體，甚至是某些民族受到壓迫的事實，並不能代替統治者在歷史上的全面作用。這裏我想起了拿破侖。他發動的侵略戰爭摧殘了多少萬歐洲的生靈，他的統治踐踏了多少萬臣民的權利，最終還是個失敗的英雄，死于遠離法蘭西的聖赫那拿島上。但是在一千二百部各國歷史學家撰寫的專著中，拿破侖並未因為其發動的戰爭和嚴厲的統治，而削弱他在歷史上的偉大地位和巨大作用。拿破侖建立的共和制取代了路易王朝的封建制，雖則一再失敗，仍代表進步的歷史潮流；拿破侖雖稱帝仍是一代偉人；拿破侖進軍的雄壯樂曲「馬賽曲」至今仍是法國的國歌，作為整個法蘭西民族的象徵。我以為，評價毛的是非功過，也應該秉承這種客觀的態度。為什麼當代人常常不能準確地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

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整風報告。



物？為什麼歷史學家總是嘲笑當代的局限性？其根本原因還是缺乏這種歷史科學態度，導致偏頗的觀點。

二、毛澤東「神化」的徵結何在

其次，關於毛的「自我聖化」的意識問題，也值得討論一下。貴刊有些文章認為「毛澤東的自我聖化的意識在建國前就存在，源于舊的道德意識……」（中國之春月刊總第廿六期

五十頁）這裡必須指示的是強調「自我」，也就是毛本人極權的思想發展，形成個人神化的結果。這一觀點恐怕與事實有出入。研究是「自我」是主要根源？還是客觀氣氛形成的？這需要剖析當時黨內的政治生活。解放前的這一段時期，可以認為是從延安時期到建國初期這段時間內。眾所周知，延安時期的中共實行集體領導，特別在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加強了這一領導作風。這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诺和後期一些外國記者的筆下都有或多或少或少的描述。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負責協調國共和談的美國代表赫爾利，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也肯定了這一點。反映在具體問題上，可以追述中共關於當時毛和江青結婚的決定上。這都是有案可查的。正由于毛的民主集中制，中共才能取得團結各派政治力量的成功。但是到了將要奪取大陸解放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七年西柏坡召開的中共黨的「七六」會議上，黨內的一些人懷着各種各樣的目的，人為地逐漸形成將毛神化的氣氛。當時在黨內權位並不很高的劉少奇，首先提出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並且正式寫進黨章。這一變化，不能不認為是明文確立神化個人的開端。擁兵自重的林彪支持這一提法，以後又發展提出了「一貫正確」。建國初的一九五〇年，毛將赴蘇聯爭取簽訂友好條約的前夕，著名文學活動家郭沫若在歡送時率先提出人間有兩個太陽的溢美概念，一個是自然界的太陽，另一個是人民的「紅太陽」。這種出現在輿論界的阿諛奉承之風，是從思想文化界的知識份子那裏開始的，對毛本人和人民群眾的影響極壞。其後，有許多進一步將毛神化的事實，已是路人皆知了。而且，當一個新政權誕生之際，形勢也需要個人作為象徵出現。因此，如果斷言毛的

神化是「自我」形成的，恐怕難以使人信服。依我看，倒是他人的因素佔主導地位。沒有中共在內戰中取得的勝利，沒有中共黨內一些人的需要，沒有思想文化在社會上的捧場，對毛的神化是不可能的。這裏並不存在「偌大一個中國共產黨，眼看着他們的最高領導人一步步的神化」的問題。所以，要追究神化毛的責任，應該強調的是客觀條件，而不是主觀原因。另外，以傑出的個人作為歷史的象徵，恐怕也不能一概否定。中國人民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三日無君、惶惶不可終日，這種精神空虛的狀態都是確實存在的，正如貴刊有些人談到的那樣，「永遠希求一個好皇帝」。（中國之春月刊總第廿六期七頁）但是，必須把這一問題和人民群眾對述出歷史人物的熱愛區分開來，不能用民族虛無主義代替民族對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嚮往。就是在美國，一談起華盛頓、杰克遜、林肯、羅斯福，美國人的自豪感和敬意也會油然而生。正像美國的歷史與這些傑出人物分不開一樣，中國的歷史也必然與許多傑出的人物緊密相聯。

三、毛澤東的功過與現階段改革關係

對毛的功過與現階段改革的關係，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許多人都認為，文化革命是毛晚年的一大過，是其罪惡之最，說得一無是處。在中共召開「十二大」前夕，有人為了全盤否定毛後期的政治活動，曾提出毛是「建國有功、治國無方、文革有罪」的觀點。這恐怕與事實不符。在國際關係上，雖然文革前由於政治、經濟的部份繁榮，已逐步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但是真正扭轉外交上被動局面的是一九

七一年的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和一九七二年的中美關係的解凍。在中共黨的「九大」以後，文化革命初期的動亂，已進入相對穩定階段。面對着用毛思想建立的新的政治力量，國際上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另眼相看。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曾說，他發現毛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的組織形式。「九大」前在中國東北珍寶島發生的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作為蘇聯的武裝試探，並沒有使中共政權分崩瓦解，也說明了這一點。這段時期內，是毛巧妙地利用美蘇平衡戰略，主動通過法國戴高樂總統向尼克松做出和解的姿態。這在當時，中共高舉繼續革命的旗幟，在全黨談右色變的局勢下，實行這一外交突破，是和毛的魄力和領導能力分不開的。只有毛，才可能作出這樣的戰略決策。如果沒有文化革命中的這一事實，恐怕也不會有今天的中美關係。國際上普遍都承認，中美關係的新篇章是由美國總統尼克松和中國毛澤東主席共同拓開的。

在國內，毛去世前已經奠定中國社會的現代政治體制。這一體制包括國體、政體和中共黨的領導體制。雖然有些體制帶有蘇聯模式的陰影，但已很少有雷同之處。應該承認的是，毛所建立的這套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修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也基本上是完整的。當然，正如許多國家一樣，有些機構形同虛設，名不其實；也存在有些機構重疊、黨政不分開的弊病，但畢竟是完整的政治體制。在經濟領域裏，儘管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很慢，但毛維持了與中國經濟發展對稱的低消費水平，從而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國庫庫存。這些方面的事實，至少為今天鄧小平的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礎和物質基礎。在思想領域，文化革命教育了許多老幹部。不可否認，文革前的許多老幹部確

實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人民群眾早已深痛惡絕。對那些老幹部的教育是符合人民群眾願望的。當許多老幹部受到衝擊以後，才理解到現在要特別重視民主，才體會到民主是人民權利的保障。因此，在他們重新工作後，能夠注意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但是，文化革命後，一些重又掌權的老幹部，老毛病重犯，照常我行我素，成為改革的阻力。由此看來，不下重藥，頑症難治。前不久下台的中宣部長部××，當年在牛棚裏對四人幫的極「左」路線不也是痛恨之極嗎！一朝權在手，又把令來行，拿個報紙的副總編輯開刀，導演了一場流產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差一點把改革引入歧途。因此，把老幹部受打擊，作為劃分毛政治活動的一個是非標準，恐怕難以服人。為什麼經濟犯罪份子可以打擊，而貽誤國家的官僚主義者就不能打擊呢？他們有時造成的政治或經濟損失遠比犯罪後果大得多，危害性更大。當然，教育幹部的方式不一定都用批判鬥爭的方式，不一定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擴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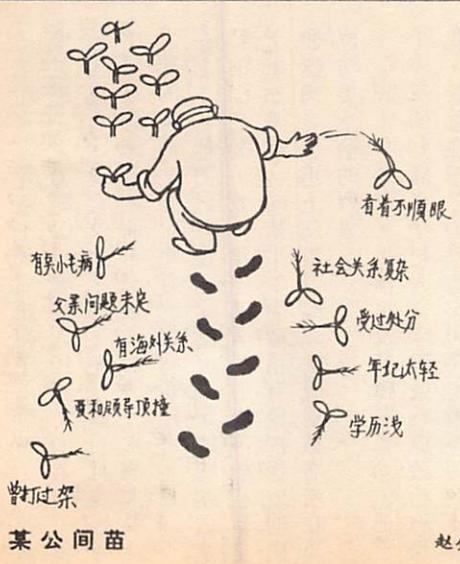
四、毛澤東的用人問題

在用人問題上，毛強調德才兼備，不強調學歷，也不無道理。對目前國內狀況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目前的提升第二、三梯隊的工作中，確實實實選拔了許多知識份子擔任了各級領導幹部。中宣部一再下達的文件中，都強調選拔對象必須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這種政策肯定是對的，能夠使中共幹部知識化、專業化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但是，在具體工作中，往往簡化成只看學歷。如此千篇一律，造成很大的片面性。其根源在於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現狀還沒有充份的瞭解，有點依葫蘆畫瓢的味道

。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知识份子的特点与欧美的不同。有些知识份子担任领导工作后，儘管他們過去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又在牛棚勞改，現在却左得可愛。前些日子反精神污染，許多這樣的人大為起勁，甚至有些知識份子的大學校長，帶着人去學生宿舍禁穿牛仔褲、禁跳迪斯科。有些知識份子上任後，其謀私用權的高明伎倆大大表現出來，重又出現許多新型的「武大郎開店」例子，真正有點才華的人才，反而受到輕視。這就是目前正在出現的「內行壓內行」的現象。爲了用發展的眼光愛護新上台的知識份子幹部，這裏僅舉一些黨內老的知識份子幹部的所作所爲，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對人體特異功能討論的三次圍剿中，黨內一些老的知識份子幹部，爲迎合政治形勢，不惜否認事實，把一場科學現象的研究硬是作爲政治鬥爭，加以公開的批判。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動黨報，大小會點名，凡是他們所痛恨的四人幫的「手法」幾乎都用上，就差一點沒有掛牌子鬥爭了。爲了表明這場研究是真實的，討論者只得請這位或那位首長的親屬到會觀看，官司一直打到黨的總書記那裏去。好在敬愛的胡耀邦明察下情，批示小範圍裏繼續研究，討伐者才息兵偃鼓。討伐者當中的佼佼者，久負盛名的于××、錢××也在知識界聲名狼藉。說也可笑，那位錢××還是留法學生出身，號稱居里的學生，當年還曾發現原子的三分裂現象。這類例子舉不勝舉，主要是由中國知識份子的封建性造成的，一是爲虎作倀，二是文人相傾軋。對比之下，美國的學者則是你好，我還要好，既承認人家的貢獻，自己又努力提高，力求超越他人。如果忽視中國知識份子的封建尾巴去放手使用，很可能適得其反，對他們能否領導中國現代化，還要有待于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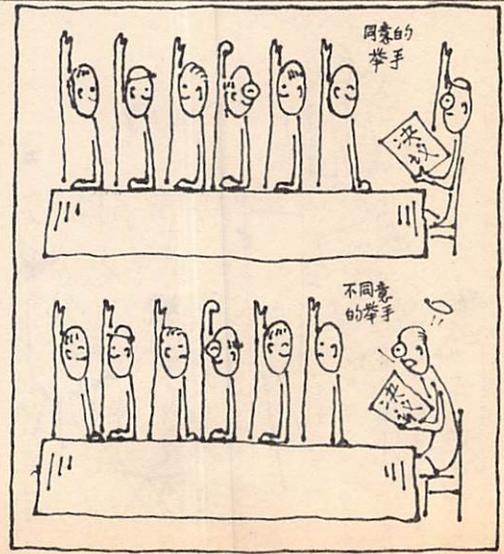
史來回答。從世界各國的近代史和現狀來看，從事領導負責任的應該是大批的職業政治家，他們應具有領導工作的戰略眼光，可以是學士、碩士甚至是博士，也可以是沒進過大學，只受過普通教育的人擔當。衡量和選拔的標準是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效果，而由此反映出的事業獻身精神，並不在於有怎樣的經歷和學歷，這也就是毛的德才兼備。更重要的是，要產生一大批職業政治家，必須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擺脫封建時代造成的愚昧、落後狀態。具體地講，應該實行義務教育和各類成人教育。這些措施並不一定要去提高教師的地位和待遇，而是用法來強制實行。在中國，不僅僅教師要提高，各行各業的各種人都要提高地位和待遇，只有提高整個國家民族的地位，提高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才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就是在美國，教師的地位和薪水也不高，要賺錢的人是不會當教師的。當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以後，大批職業政治家則孕育在其中了。因此，中國目前需要強化基礎教育，可以參照美國、日本的經驗，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實行。我以為，毛在用人問題上的觀點，還是比較全面的。儘管在具體執行時有偏差，那只是時代的局限性。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一開始提出衡量統治者的兩個標準之一即爲「用人」問題，是很引人深思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作爲一代偉人，是無可非議的；他晚年發動的文化革命，並不能也不應該全盤否定。毛像許多歷史人物一樣，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當代人應從歷史的條件、客觀、公正地去評價他的一生。中共黨的「十二大」會議決定黨承擔文化革命的責任，是符合事實的。爲了繼續目前的改革，整理毛在各個領域裏的遺產，我以為還是有必要的。



某公間苗

趙金榮



習慣成自然

趙世英

毛毒何時了?!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洲) 曲元

「偉大領袖」衣冠禽獸

我曾在「中國之春」發表了幾篇批毛的文章，原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和參加批判。但「中國之春」九月號（總廿七期）有某讀者却主張批毛要分清功過。他的說法似乎很公正，不過以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看，給毛評功擺好，實在不必要。姑無論毛的所謂「功」與「好」是真正屬於他的還是他剽竊自別人的（最近香港明報揭露了張玉鳳事件，可見道貌岸然的偉大導師，隱藏着不可告人的醜惡面）。而且，我還認為，我們應該不要辜負了直到今天仍然只能在海外才有的徹底、公開批毛的「特權」！為推動中國的改革掃除絆腳石。

對此，我十分慚愧。局限於本身的條件和水平，我對毛的批判極不深刻。我只盼那些知道內情的人（尤其是那些良知未泯的中共高級黨員）和那些水平比較高的學者專家，從我囉嗦的陳述中，能理解我之所以喋喋不休、鏗而不捨的批毛用心。再接再勵，為求徹底解放中國人的思想枷鎖而共同努力！

褒揚正義，討伐邪惡

不久前，有一段新聞觸發了我。據說：著

名的甚孚名望的作家劉雁賓宣告退出文壇，不再寫作了。後來經證實劉雁賓並未封筆，但他確實受到了極大的壓力。這是毛之「左」毒的影響。

我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不管在朝在野（除去部份天生有奴顏媚骨者外）大多富有憂國愛民，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豪情俠義。（例子不必舉了，可讀讀文天祥的正氣歌）。中國的傳統文學，從詩經、古文、史記，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至「五四」時代的新文學創作、新詩、雜文、話劇……等，那些流傳至今，家傳戶曉之作，無不是題材廣泛，深入反映當代民生與社會的疾苦，且有強烈的褒揚正義、貶責邪惡、抑強扶弱的精神。

文藝講話，是套在中國作家身上的精神枷鎖

一九四二年，劃時代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問世，毛澤東就按他的意志，給中國的知識份子和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劃地為牢，只許照他的規定，為他與他的政治歌功頌德，筆伐異己。

為數不少的、在「講話」發表前便已頗有

成就的作家們（除已去世的魯迅），變得幾乎一無是處：胡風……等，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丁玲……等戴上了右派帽子；曹禺……等誠惶誠恐，大力刪改已廣為人民喜愛的舊作；茅盾、巴金、沈從文……等，不是改行就是停筆；只有郭沫若遛寵，寫些應景的「兩個太陽」之類的東西。至于年青一代的新作者，更加不在話下。他們只可在「講話」圈定的範圍內進行創作活動，並一律把其有限的成績統統歸功于學「講話」的結果；少數稍有離經叛道的出頭露角者，馬上就災難臨頭，成為被各所在單位黨委整治的對象。

三十多年來，毛澤東及其極左集團，把千萬萬的知識份子打入文字獄或劃成政治思想犯，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今天，中國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大都受教育和被改造得十分聽話了。近年來，新的文藝創作



劃地為牢的文藝創作。

也不少，但在質和量上，却總達不到「講話」發表前的水平，更惶論與輝煌的古典文學巨著相比了。

到文革十年，可憐的十億神州，可讀的只有一本「金光大道」；可看的只有八個樣版戲；可聽的只有一大堆不成音樂的語錄歌；可誦的只有一套毛詩詞。如今回顧一下，這教訓難道還不明顯嗎？還不夠深刻嗎？

清除政治僵屍， 迎接文學藝術的春天

但就是有一小撮躺在毛留給他們的「權勢溫床」上的既得利益派，和另一些深中毛毒而不自覺的「好心人」，依舊繼續嚷嚷「堅持」、「高舉」。

正是這些人說趙丹臨終的衷心話是放了一個屁……。

正是這些人說周揚覺今是而昨非的「異化論」是精神污染……。

正是這些人批白樺、批戴厚英、批吳祖光……。

也正是這些人禁民主牆、禁傷痕文學、禁民辦刊物……。

「這些人」，他們肯定只佔中國人的極少數，他們也沒有甚麼創造性的理論，可他們為什麼敢？為什麼能？在已證明是錯誤了的「文革」式的思想專制的路綫上繼續飛揚跋扈？

究其根源，就是天安門前那具僵屍！試問，除却全民起來，還毛澤東一個遺臭萬年的本來面目，還有什麼其他辦法，能更迅速摧毀人民頭腦中的桎梏，使政治思想的改革，跟上和配合經濟開放的形勢呢？！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鄧小平預計八七年退陣

(國內) 楚青原

中共於九月在北京召開的黨的特別代表大會已經結束一個多月了，鄧小平在中央高層權力上的安排已成了定局。升了官的自然是揚眉吐氣，未升官的不免要愁眉不展，真是「一輪明月照北京，幾人歡樂幾人愁」。樂愁人生尋常事，但鄧小平心中的隱憂却不能不令人關注。

鄧小平在九月黨代會上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迫使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保守派辭退，此種目標若達到，那麼鄧小平則可安心地退去，對胡、趙等年輕的改革派也就可放手不問了。但偏偏事與願違，這個責任感極強的保守派首領陳雲就是不退，陳雲不退，李先念及彭真等人則有所依附，也就不退了。而鄧小平爲了制衡保守派，結果是欲退不能。這是鄧小平感到這次黨代會結果美中不足的地方。

保守派首領不退，就意味着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政策仍將面臨着頗大的阻力，爲了克服這阻力，鄧小平仍要付出頗大的心血，這對於年高八十一歲的鄧小平來說，確實也是一個頗大的代價。

其次，是誰先死的問題。鄧小平若是死在陳雲之後，在陳雲辭退之前，欲付出代價來制衡陳雲還有可能。但假如鄧小平萬一先死，而陳雲還未辭退，那麼鄧小平縱有諸葛亮的韜略，恐怕也奈何不了陳雲，死人總不能再鬧活人吧。這個假設若成真，那麼到時陳雲就有可能扭轉經濟改革的方向，把經濟這隻鳥收入他的「小鳥籠」裏。當然，鄧小平並不希望這個假設變成現實，我們也希望如此。但假如如事情的發展與我們的願望相違，那麼我們又有什麼辦



陳雲不退，正是鄧小平的隱憂。

法呢？就如鄧小平這樣炙手可熱的權威，活着時曾叱咤風雲，曾力挽社會狂瀾，曾下令逮捕魏京生等，但鄧小平却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死。死，對任何人都是無情的。在今日仍然實行人治的中國，鄧與陳誰先死，才是鄧小平真正隱憂的所在。

據內部消息透露，鄧小平已作好下一步的方案，即在一九八七年的第十三次黨代會上，鄧小平一定要迫使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人退下來，當然，自己也要退下來。然後，讓胡耀邦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任國家主席，李鵬任總理，胡啓立任黨總書記，田紀雲任人大常委委員長。

鄧小平的這種安排是否能夠兌現，我們只有拭目以待。



張俠教授

台灣的權力繼承問題

(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 張俠

近三年來，關心台灣政局的觀察家們——尤其是香港和美國的華文報紙——對台灣的權力繼承問題一直頗感興趣。最近，不僅是華文報界，連國際性的權威雜誌美國「時代週刊」(TIME)也對此很有興趣。(註一)

這種興趣反映了人們對此事的關注已經超越了純粹好奇的範圍。政治學家一般都很重視最高層權力繼承的處理方式問題，因為從一個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中，不僅可以明白地看出其政治發展的水平，政治體系的成熟度，而且還可以明白地看出這個國家的穩定性和合法性。

就台灣的中華民國而言，誰是總統的繼承人，這個問題的影響不光局限在以上這些比較抽象的事情上，而且對台灣的內政、與大陸的統一、以及東亞的安全和美國的利益等問題，都會產生影響。

台灣在權力繼承上面臨問題

由於民主國家已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故此

權力繼承很少成問題。然而對世界上很多國家來說，這却是一個問題。雖然，一般都有明文規定，但這些規定通常不是名存實亡，就是基本上一開始就有缺陷，引致決策權不是操縱在獨掌大權的領袖手中，就是操縱在黨內核心人物手中。最不幸的結果，則會演變成派系鬥爭或政變。

以台灣而言，由於蔣經國的年壽和健康原因，正是關注這些問題的時候了。蔣經國在一九八四年第二度當選總統時已七十五歲，等到第二任期滿(一九九零年)他已八十歲。從他健康狀況來看，他能否做滿這個任期是令人懷疑的。雖然未經官方承認，但一般相信他已患上重型糖尿病，引致他在最近四年間至少動了三次眼手術，最後一次是在今年八月施行的，而其中以八二年的一次最為嚴重，使他約有半年不能全面視事。今年他的健康甚有好轉，所以公開露面較多。不過，他的行動仍有困難，閱讀的數量也受限制。

當然，權力繼承在台灣有憲法明文規定，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凡在職總統不能完成任

期，由副總統代理，直至任期終止，然後在國民代表大會上另選新總統。從理論上說，凡年逾四十的中華民國國民，皆有可能依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當選總統，但問題却出在國民代表大會。

雖然，國民代表大會在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宣佈的臨時動員勸亂條例中被定為國家主要的民意代表機構，但實際上此法却使國民代表大會受到凍結，自一九四七年選舉後還未曾有過新的選舉。今天的國大代表大多是四七年中共接管大陸時隨國民政府來台的。雖然在六九年及七二年曾舉行部份選舉，以擴大台灣省的代表性，產生了六十八個新代表。但今天的國民代表大會跟其原來的宗旨相去甚遠。首先，與四七年相比，國大代表的人數已減少，由於變節和自然消耗的原因，已由原來的二千六百九十一人減至一千一百五十二人。其次，真正由台灣人民選出的，被認為真正能代表台灣的祇佔百分之五點九(即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中僅六十八人)。鑒此，我們很難不作如下結論：今天的國民代表大會并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和民主性。

由於國大代表無代表性，國民大會已變成國家政黨的附庸。再加上百分之八十五點八的代表為國民黨員，所以選舉全照著國民黨意願，這就是為什麼蔣經國能以百分之九十九點〇二壓倒性優勢再度獲選的原因。換言之，說台灣因為有憲法規定所以不構成權力繼承問題，等於是完全避開這個問題。從最壞方面來說，這是欺瞞無知者的做法。

可能的解決辦法

在此種情況下，在蔣經國的權力繼承問題

上台基本上似有以下兩條可行途徑：

一、恢復憲法內容，解除戒嚴法，重新進行全國性的（指台灣）選舉，以選出新的國民代表大會——一個能真正代表一千九百萬台灣人民的新國會。但這辦法祇有政治上最天真的人才認為會有實行的可能，我想這樣說不算有失公道吧。

二、繼續實施戒嚴法，但同時用現實的態度正視問題。這樣做就很可能要求台灣採納專為獨裁政體——包括馬克思的極權政體——所採用的方法：獨裁。即由蔣經國來選擇和推薦繼承人。

這個策略實行起來也不容易，因為無法保證前總統引退後事情會按着他以前的願望和計劃發展；另外，領袖也會因本身受到既定接班人的威脅而改變初衷（正如毛對待劉少奇和林彪一樣）。但是不管怎樣，這總是解決接班人問題的一種嘗試。

就台灣而言，蔣經國似乎兩種辦法都不會採用。

蔣經國有意安排

「分而治之」的局面

看來蔣經國準備做的——或者按目前這件

事來說，是他不準備做的——就是不指定繼承人。根據一切迹象，包括他對「時代」雜誌所作的證詞，他既不公開也不私底下在培養繼承人。最佳例證是三個曾經呼聲最高的人：王昇、孫運璿、孫運璿總理及秘書長蔣彥士等都一個接一個的被排除出局。

王昇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就是蔣的忠實部屬，八二年至八三年間，他出任總政戰部主任，達到了政治生涯的頂峯。但在八三年五月，在事前沒有任何迹象的情況下，被突然調任無足輕重的聯訓部主任。這次調任普遍認為顯然是降職。此後不到五個月，即在十月份，又匆匆調離聯訓部，乾脆出國轉任巴拉圭大使去了。

孫運璿則在李登輝被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為新的副總統時（八四年二月），心臟病發而辭去行政院長的職位。即使孫不因心臟病而被迫辭職，他亦不會成為總統的候選人。把李選為副總統，蔣經國實際上就使孫氏不可能成為總統。因為就算蔣經國在任內逝世，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李亦會繼任總統直至任期屆滿。換言之，孫要是想做總統夢的話，也得等到一九九〇年，而那時孫已經是七十七歲了。

蔣彥士曾是第三個呼聲最高的而最近被排除的人。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八五



王昇



孫運璿



蔣彥士

從王昇、孫運璿及蔣彥士三人相繼突然的調職和辭職的迹象看，他們三人顯然已被排除總統繼承人之外了。

在二月，他突然「辭職」，而由七十七歲的馬樹禮取代。他的「突然辭職」甚至連忠於職守的政府官員及黨內高層人士都承認出乎他們的意料。所有這些都顯示蔣彥士乃是由蔣經國授意辭職以代替撤職。

由於權力繼承的情勢是如此的令人困擾，某些觀察家便相信蔣經國在繼承人問題上一定已有秘密的安排。而這秘密安排就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

觀察家有此論斷乃是基於國民黨的基本性格：即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感染，表面上有一個現代政治制度，實際上却是世襲制。還有一點就是蔣經國生前的最終目標：作一個蔣介石的孝順兒子，以紀念他父親。而所謂孝順，就是要忠於他父親的幾點原則：一、永不與共黨談判；二、反攻大陸，好讓先父遺體得以重埋故土。要實現這兩點心願，則政權必須保留在蔣家。外人不可能堅守蔣介石的原則，祇有蔣介石的孫兒才可以完成這些遺志。

這些觀察家是有一系列理由支持其論點的：他們指出，蔣經國指派其蔣孝武為國家安全系統首腦是深具用心的，就如蔣介石在五〇年任命蔣經國位居同職一樣。外面盛傳自七八年開始，蔣孝武就已出任為國家安全會議執行秘書。這個機構，不但神秘，而且握有實權。

另外還有人說，在過去一年裏「宮廷派」（註二）勢力的崛起，其用意即在為確保蔣孝武接班作準備。蔣孝武當選國安會的執行秘書是因為沒有其他可抗衡的人選。蔣經國的長子蔣孝文已癱瘓，三子蔣孝勇未足四十歲；而庶出的章孝嚴和章孝慈可能因名份不正而無法繼承父職。

但這一連串的推理却因如下幾個理由而不能使人信服。首先，蔣經國沒有充份時間來培

養蔣孝武，蔣經國在廿九歲時開始其政治生涯，到蔣介石死時，他已有卅六年的從政經驗。他在六十八歲當選總統，在此以前已從其父處獲得充分的領導經驗。他不但在臺灣社會中建立起其既深且鉅的影響力，同時也把這影響力擴展至黨、軍事、安全單位及行政系統上。這些深廣的影響力保證了蔣經國能穩坐總統寶座。但蔣孝武目前的形勢和其父是明顯不同的。即使外傳他已在國家安全組織上擔任非正式職務，但這也祇有七年從政經驗，而要成功并且牢固地繼位國家最高行政首長，這點點經驗是不夠的。

即使蔣孝武與江南（劉宜良）命案無關，他亦不可能成爲一個讓人信服的繼承人。因爲他不是個光芒四射的人物，而且也不得人心。他沒有足證的才華，學業成績無突出之處（註三），祇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學院取得學士頭銜。他的工作紀錄也非常平庸。最主要的是：他在國民黨中並沒有職位。他既非中央常務委員，亦非中央委員。因此，很難想像國民黨會選擇這麼一個資歷尚淺的人作爲總統。

基於上述原因，由蔣孝武（或蔣經國另外一位公子）來作總統候選人，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蔣經國或許私下願意蔣氏家族在政壇永保勢力，但他并不笨，他知道他不可能讓兒子來繼承他。（註四）

從一種非常現實的意義上來說，蔣經國是歷史的受害者，他被捲入一個悲劇的困境中。另一方面，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合法性是建築在她宣稱她對於整個中國大陸擁有主權，而她又是一個合法的統治者。這種宣稱，或稱自吹，使中華民國不可能進行普選，而選出新的國民代表大會。因爲這會永遠切斷她和中國大陸的聯繫。這事造成的後果是中華民國政府無

法解決在民主社會裏不存在的權力繼承人的問題——即真正能反映民意的總統選舉。

另一個方式是選定繼承人，但蔣經國不能這麼做，這等於承認台灣是個不民主的社會而不是「自由中國」。最糟的是，選定繼承人等於說她與其在大陸上的共產黨敵人在某種程度上（如接班問題）是差不多的。

蔣經國處於這種困境，就祇好選擇他認爲是第二個最佳方案了。他一面排斥有實力的著名人士，一面不斷耍弄「分而治之」的手段，一面又使常委會的名額在黨、政、軍及省、地方行政這四大部份間保持均等——一切都是爲了確保派別力量的平衡。也許這就是蔣經國的權力繼承方案，即：用平衡國民黨主要派系力量的辦法，使任何一派的力量也不超過其他各派，這樣在蔣經國去世後，各派就不得不聯手，以形成集體領導。

繼蔣經國之後的台灣

說中華民國現在台灣面臨一個有危機性的繼承難題，并不誇張。她處於戒嚴的本質，使她不得不暫時停止行使憲法，也使她難以有一個民主的政府。這就造成了台灣的政治體系是一個由幾個高層人員爲中心的政治體系，而總統擁有絕對的權力。在此體制下，總統選舉尤爲重要，比美國民主社會的總統選舉還要重要。國際間對台灣繼續增加的不利氣氛，例如外交上的孤立、中國大陸的威脅，與美國關係的惡化等等，迫使台灣需要一個更能幹的人來領導。

在目前形勢下，如果蔣經國明天就去世，衆所週知的副總統李登輝就可依照憲法成爲名義上的總統，直到一九九〇年任期屆滿爲止。

但看情形李登輝似祇可能成爲一個名義上的總統而已。雖然他有那麼多有利條件，如：台灣本省人、年祇六十二歲、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而且以進取明智著稱。但由於他缺乏實力，特別是在軍事及國家安全系統上的勢力，使他多半祇能成爲一個名義上而非實質上的總統。而實際在幕後操縱的，將是幾個國民黨內不同派系的領袖。

蔣經國現在爲其死後各派系之間能忠誠合作而努力。但沒有任何事可保證蔣去世後各派系的勢力會保持均衡。最糟的可能是：台灣會陷入破壞性的權力鬥爭中，甚至可能導致武裝政變。

然而我們希望，理性的一方會佔上風。希望在李登輝的領導下，各派系會聯合起來，以實施集體領導，以他們共同的福祉及國家安全爲念，而非採取互相毀滅一途。

註解：

一、在「時代雜誌」對蔣經國的一次訪問中，記者曾公開詢問蔣關於傳位於其子孝武的傳言。詳見「時代雜誌」八五年九月十六號第四十六及四十七頁。

二、「宮廷派」意味著包括一些這樣的高層人員，如行政院長俞國華、總統秘書長沈昌煥、國家安全會議的秘書長汪道淵、參謀總長郝柏村，除了郝是六十九歲外，其他三人都是七十一歲。

三、蔣孝武是七一年至七五年度任華欣文化出版中心董事長，七〇至八〇年度任行政院國軍退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顧問，七六年起任中央廣播中心董事長。

四、據傳蔣經國故意在八一年四月第十二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將孝武的提名剔除。

劉添財台獨模式

劉添財

一．爛大西瓜

最近台灣各社團出現開明和民主的氣氛，即大家對不同的意見，都頗有容忍力。例如，「台灣公論報」就刊出娃辛郎以及其他意見不盡相同的文章，這是令人欣慰的好現象。在政治思想領域，只有多元化才能做到民主化；排斥、壓制不同的意見，那叫做專制獨裁，如同今天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那樣，都是我們所要反對的。

在八五年十月廿四日「公論報」和十月廿六日「台灣民報」上刊載了謝惠先生的「談『西瓜倚大邊』」一文，文中列舉具體的數據，分析指出了中國並不是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加之第三產業薄弱，文化教育落後，因此，即使其工農業生產總值「翻二番」也算不上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總而言之，中國是一個爛攤子，這個「西瓜」雖然「大邊」，却是一個爛西瓜，一點也沒有值得台灣人羨慕的，台灣人還是應該追求獨立建國的目標才對。

謝先生文中僅只強調中國在物質基礎經濟生產方面的落伍，其實更嚴重的是它的神祕面貌，政治專制獨裁，封建官僚統治，虛偽教條、僵化的說教，社會的動亂和思想的愚昧，人際

間的自私自利，勾心鬥角投機取巧等，這些落伍現象，才是導致中國經濟落伍的根源。台灣人自然不願與這樣的中國統一！

二．析「中共應聲虫」一說

對於謝先生的分析，筆者並不反對，唯他在文中談到中共要使用「中國文化」、「黃帝子孫」、「血濃於水」、「民族大義」諸項法寶來併吞台灣，而台灣要使用「台灣民族」、「台灣意識」等諸項法寶來與之對抗才行。可能這就是針鋒相對的鬥爭吧？對此，我有點異議。既然中共使用的「文化」、「子孫」、「血統」、「民族」等都是封建落後不合理的東西，那麼台灣使用的「民族」、「文化」、「意識」來與之對抗，本質上還不是一樣封建落後不合理的嗎？筆者的意思是說，這些東西根本不重要，不值得大張旗鼓地宣揚「民族」、「文化」的是否相同，這不是決定統一獨立的主要因素，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才對決定統一獨立更為重要。筆者那篇「突破島氣放眼世界」的文章就是希望台灣人不要陷在狹隘的「民族」、「意識」的漩渦中，反而造成內部分裂。想不到謝先生却對筆者此文大張撻

伐，並辱罵筆者為「中共『統戰』的應聲蟲」，「冒牌的台灣人」！

拙文中惹禍的那一句話是：「筆者多次苦口婆心善意勸告台獨和那『台灣意識』分裂人士，想要獨立建國必須要有個台灣內部和諧團結的條件，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客家、福佬、高山，不要刻意強調自己的『文化』，互相尊重融合，這樣才有成功的希望。」這句話被謝先生稱為「劉添財台獨模式」、「偽君子模式」、「似是而非的」、「是幫助中國君臨台灣最有效辦法」。謝先生並未指出這句話如何「是」和如何「非」，難道台灣內部不要和諧團結，不要互相尊重、融合，本省、外省、客家、福佬，高山都唯我獨尊，互相分化，這樣的台獨才有成功的希望嗎？

許多台獨朋友都說我拿了中共的錢。為中共立了功，看樣子拿錢是受之無愧的了！筆者到底有沒有拿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錢，筆者曾多次建議採取「武士道模式」來解決，即台獨朋友如能證明我拿了國共的錢，我立刻割腹謝罪，如果不能證明我拿錢，則請誣陷的朋友剖腹謝罪。至今數年過去了，還沒有一個人剖腹，誰真誰假，還是搞不清楚，胡適先生說得對「理未易明，善未易查。」唉！

三．強調「認同」不利民主

說一句坦白話，近十多年來，與台獨朋友筆戰切磋，真是不打不相識，從中我也受到了台獨理論的深刻影響，修正了我許多封建的、唯民族主義的錯想法。對於中國這個「爛大西瓜」，我也感到非常失望。台灣人沒有理由因為「文化」、「子孫」、「血統」、「民族」之故非要與中共統一不可；即使是我的親兄弟

、親骨肉，如果彼此意見不合，還是要分家各立門戶的。雖然如此，我對中國還是懷有善意的，因為終究它與台灣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我們不能閉着眼睛否認它的存在。

謝先生說：「台灣要真正推行民主政治，非有一個新認同感不可。」其實認同感與民主政治並沒有什麼關係。今日公認的民主國家美國和加拿大，都是由移民混合組成的國家。一般民主國家並不特別強調「認同感」，例如台灣人入了美國、加拿大國籍，生活在這民主政治中，並不一定要在「民族」、「文化」、「意識」上與白、黑、猶、波等人有「認同感」，反而還是與台灣故鄉一千九百萬同胞有「認同感」，但這並不妨害我們成爲美、加民主體制中的一份子，這就是民主制多元化的可愛、可貴之處。希特勒時代的德意志，墨索里尼時代的意大利，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以及當今許多專制的共產國家，他們的「認同感」十分強烈，講究思想一致、生活一致，只有團體沒有個人，但是其政治却一點也不民主，「認同感」反而更助長了專制獨裁。

四· 提倡大福佬主義不能 擺脫中共的統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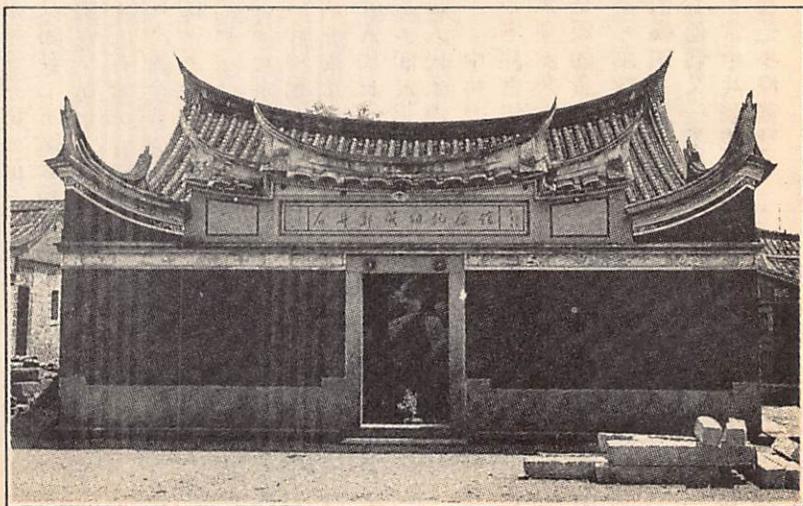
「認同感」對於民主政治並沒有什麼好處已如前述，但「認同感」對於民族自決國家的獨立是否還有它的作用呢？如果在台灣的一千九百萬人，對內果真不分彼此，互相尊重，團結相愛，一致認同；對外，尤其是對中共一致反認同，那當然對台灣的獨立建國有利。這樣，提倡「台灣民族」、「台灣文化」、「台灣意識」也還有一點道理。不幸，目前的情況很

不令人樂觀。對內，「台灣民族」、「台灣文化」、「台灣意識」只刻意強調「大福佬民族」、「大福佬文化」、「大福佬意識」，輕視、蔑視客家人和山地人，卑視、仇視外省人，正好像滿清時代漳、泉、客、番間的械鬥仇殺一樣，結果便宜了滿清帝國，今天無疑是便宜了中共，歷史真的又重演了。

對外，「台灣民族」、「台灣文化」、「台灣意識」的理論，實在不夠周全也太牽強附會。在新思潮的條件下，「民族」與「種族」的定義不同還未能爲世人（包括台灣人）所接受，實際上主張用「台灣民族」的人，本身就沒有認爲一千九百萬人是一個「整體民族」，還是用「種族」、「地域」的封建落後觀念在劃分。而「台灣文化」之主體是淵源於已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要硬說「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是說不通的。

今天，應該注意，中共只要把中國閩南的福佬文化進行比較，就可看出，在所有衣食住行、語言文字、音樂、戲劇、宗教、民俗、生活習慣等方面，都是台灣福佬民族、福佬文化的正宗元祖，台灣大福佬沙文主義也同樣逃不出中共大福佬的掌心。至於「意識」，那是主觀唯心的，不是客觀理性的。既然民族文化都逃不出中共「大福佬」的掌心，那麼「台灣意識」自然也逃不出中共的「大福佬意識」手掌心了。

中共只要在閩南漳、泉、廈等地發動大福佬民族文化統戰攻勢，台灣的大福佬主義就會潰不成軍。目前中共正在將計就計，在廈門建立鄭成功紀念館，並成立台灣研究所，整理閩台間族譜系統，彰化福興鄉粘厝莊的族譜也已發表，原來做了數百年台灣人的粘氏家族，却是滿州人氏。史實俱在，誰也不能否認「大福



坐落在台灣鄭氏祠堂裏的「石井鄭成功紀念館」。

佬」與閩台間福佬人的關係，而提倡大福佬主義更會加強這層關係，因此，台灣人也就更難擺脫中共的統戰了。

五· 最佳的台獨模式

由于中共使用非理性的「民族」、「文化」向台灣進行統戰，台灣人也偏偏故意使用非理性的「台灣民族」、「台灣文化」來向中共進行反統戰，這只是向中共嘔氣和發洩情緒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又在騙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谷仲齡

一種作法，反而忽略了中共現實政治的腐敗，經濟的落後，和社會的動亂等一些重要因素。其不良後果是：會造成台灣內部的分裂、猜忌，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從而只有消極作用。對於中共並沒有起到隔離免疫的防阻作用，反而有助於中共用阮的土糊伊的壁，使它利用台灣內部分裂的矛盾，再使用大福佬主義的統戰策略而併吞台灣。

爲今之計，必須對「台灣民族」、「台灣文化」、「台灣意識」的實際內容做一番調整修改，使它能融合包函今天居台各系的移民成份。爲了一千九百萬同胞長遠的和平幸福，應忘掉過去的一切怨恨，大家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互愛互諒，團結合作，像三合土、鋼筋水泥一樣攪合在一起，才會有一堅強的力量，才能抵抗中共的統戰和併吞。爲了表示誠意，台灣組織也應該打開大門，容納各系居台移民參加。

被謝先生狠批的「劉添財台獨模式」，實在是較爲合理和可行的「真君子模式」，是「抵抗中共君臨台灣的最有效辦法」，更是最切合實際，利人利己，利台利中和有利于世界的最佳模式。謝先生以爲然乎？讓我們大家心連心，手牽手，共同走向「劉添財台獨模式」的金光大道吧！

更具體一點說，「劉添財台獨模式」，就是要保持台灣實質上的獨立，爲此，就不能更換國家的名稱，以免內亂，因爲內部的鞏固、安定和繁榮是最重要的。保持台灣這股實際力量，才能使中共謙虛謹慎，自我反省，改過從善，促進中共加速改革，使海峽兩岸互相制衡競賽，其最後的目標是要使大家都走上民主繁榮之路，從長遠來看，台灣與大陸終究是不能分離的，終究會統一的。

今年十月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一版登載了一則消息，題爲「日商承認三菱汽車不合格，同意更換並賠償中方損失」。以上消息指出，日本三菱汽車公司九月三十日與中國汽車工業進出口公司和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達成一項協議，同意全部更換其出售給中國的不合格汽車，並賠償經濟損失。消息還具體指明，日商承認出售給中國的五千八百二十四輛 P2418 型載重汽車，全部爲不合格產品，同意全部退貨，用重新設計和製造的新車來更換，並賠償中方由於更換汽車等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從人民日報（海外版）所報導的消息看，似乎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由日本進口的這批三菱載重汽車，因有嚴重質量問題，曾引起國內民衆的強烈不滿，中國方面爲此提出要求索賠，而現在似乎一度造成兩個貿易危機的商業事件已得到妥善處理。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官方在商業外交上（當然脫離不開政治外交爲後盾）又贏了一局。這樣既可揚眉吐氣地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使民衆的不滿情緒得到平息；又可挽回因自己缺乏外貿，技術知識所造成的嚴重錯誤而丟掉的面子。

然而，處理三菱汽車賠償案的實際內幕又是如何呢？據來自國內的當事知情者透露：中日雙方（廠方）在人民日報公佈上述消息之前，已達成一份協議「備忘錄」。其重點言明，考慮中日雙方之共同利益，有關於三菱汽車賠

償的具體細節，雙方可以通過協商酌情處理。日方三菱汽車公司爲有此「備忘錄」而歡欣雀躍。因爲有「酌情處理」這四個字，在研究賠償問題的具體事宜時，就會有相當大的彈性。實質是中方在索賠問題上，已暗中向三菱汽車製造廠網開一面，據說只要一「酌情處理」，便可使日方廠家免遭何止上百億日圓的經濟賠償損失。

按理說，中日雙方廠家爲解決一起商業糾紛事件，採取協商酌情處理的方式是無可非議的，考慮雙方的共同利益也屬正當。問題是人民日報（海外版）消息報導的措詞，很有點打腫臉充胖子的味道了；更主要的要害還在於，它向中國人民及海外僑胞，隱瞞了中日雙方達成的協議「備忘錄」的實質內容和真相。因此，人民日報的消息報導，只是一個騙人的障眼法，關於這件事的真相和實際處理結果，恐怕是人民永遠無法知曉的秘密。

中共歷來辦事善要兩面手法，爲了顧全面子，經常對人民講假話。作爲中共的喉舌，當然要誠效主風，時時搞點真偽攪拌的勾當。可是假的貨色終究要露出真相，謊言遲早會被戳穿。而檢舉者往往來自中共內部，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可以想象，當國內民衆與海外僑胞得知他們又一項被欺騙的時候，會是何等的氣憤；當中共發現自己的障眼法被揭穿的此刻，又會是多麼尷尬！

人人起來講真話

(華僑·美國) 黃雨川

在中國之春十月號上讀到崔承玉的自傳「我要自由、這就是我後半生的唯一願望」以及八月號上有關她自殺的報導，令人心情激盪，難以平抑。

一個如此勤奮的物理學者，從小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帶紅領巾，當共青团員，入黨，先後公派留蘇留加，其父親被鬥死，哥哥成瘋，仍能和家庭「劃清界線」跟着共產黨走的虔誠的社會主義信徒，最後仍無法擺脫來自「祖國」的重重壓力，終以一死求脫。

直到她留學朋友將她暗自寫下的自傳公諸於世，才道出了她的真心話：「大陸為什麼這麼窮？大陸為什麼沒有自由？大陸為什麼發展緩慢？甚至倒退？歸根結蒂是制度問題——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

然而這樣的真心話，在崔承玉有生的四十八年中，却不敢講出來。

崔承玉固然不敢講真心話，在大陸的十億人民中，又有多少人敢講真話呢？很少很少，幾乎沒有。因為一句話便可招來橫禍，輕則挨批挨鬥，重則成爲反黨反革命，身繫囹圄。不論夫妻兒女或同學同事，成天價日逼着去搞階級鬥爭——「天天講，年年講」。人與人間的真誠，都被莫須有的階級仇恨面紗埋沒了。過去，我們可把這過錯推到毛澤東的專制獨裁上，毛澤東死了，可以推到四人幫身上，現在四人幫也打倒多年了，又怎樣了呢？可是人們仍然

不敢講真話。身爲全國作家協會主席的巴金，就不敢講真話。他八四年到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時，只向人「提倡」講真話（見該年十月廿二日香港文匯報「巴金笑談創



白樺



劉賓雁

作六十年及紐約華語快報八五年四月八日新獨立評論「講真話」。

白樺只借「苦戀」講了點真話，使得挨批，拍好的電影也被禁映；劉賓雁只報導了講真話的陳世忠和倪育賢，聽說又要挨批，要封筆了。發表這報導的《開拓》雜誌據說也被禁止發行（見八五年十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劉賓雁出了什麼問題」？）。

一個國家的科學家不敢講真話，作爲「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不敢講真話，作爲人民喉舌的人民日報記者不能講真話，這是什麼樣的社會啊！這是「爲人民服務」的政黨所爲嗎？這是以「解放」全人類爲目標的政黨所爲嗎？

現在該是人人講真話的時候了。如果說在國內講真話仍受種種威脅和迫害的話，至少，在海外不受這種威脅的幾千萬華人同胞就得帶頭做起，挺起胸膛，盡一己的良知，有好就說好，有壞就說壞。聽說有位極富威望的科學家只因他在大陸的親人獲分配一組很好的住宅，便以之作爲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證明，他可曾知道這是由於他的大名所致？還有人說，這位學者回大陸看過《苦戀》後哭了。然而却沒有聽到他爲白樺講過半句話，也沒有爲衆多受過迫害的歸國留學生講過話，更沒請當局放這部電影，讓沒有特權的人民也有機會欣賞欣賞。

一個人可以無畏的精神毅力去探求自然科學的真理，而對自己祖國社會方面某些愚昧與專橫却無動於衷，不敢講真話，這是對知識的極大諷刺。

貴刊講得好，要開拓民主事業，首先要做的是開展講真話的運動。當十億神州多數人都敢講真話的時候，專制制度就不復存在了。

喪權辱國，莫甚於此！

(華僑·美國) 晨全中

愚人上當，而不自知

，以建設趕上時代的現代化工程。真是一派胡言，欺人太甚！中共幹部受盡日本人的欺騙、剝削還不自知，居然還恬不知耻地狂捧瞎吹，喪權辱國，莫甚於此。

一九八四年底返祖籍寧波，曾由寧波僑辦派員陪同參觀當地政府引以為榮的北侖港建設，據說這是經由重金禮聘日本專家精心規劃設計的現代化十萬噸散裝裝卸碼頭，而事實上祇不過是配合上海寶鋼進口原材料的卸貨設備，根本還沒有大量的裝散貨物可供出口。他們洋洋得意地一再強調這是國內現代化的偉大建設，我當即站在碼頭的高架上觀看，這那裏是什麼現代化的設備?!這是一套在自由世界五十年代以前的落後陳舊設備。我在五十年代初期隨船(海員)到澳大利亞裝運煤炭，當時澳洲東部的New Castle港的裝卸設備就比這一套進步、效率高。

碼頭禁區的大院內，據說住着一位日本專家領導策劃整個北侖港的建設，這位混帳透頂的「專家」被奉承得意忘形，在我們國土上作威作福，生活享受極為奢侈，除他配有專用的廚司、傭人、司機、秘書之外，還用人民的血汗換來的外匯供他每隔三天搭飛機返日本一次，美其名曰吸收海外日新月異的科技資料

，不但全部機械設備用外匯向日本進口，上了日本人的當(其實這些玩意國內完全可以自製)，而且後患無窮，三十年後必遭我們下一代的批判。因為北侖港附近並無重工業設施，起卸上岸的進口煤炭與鐵礦砂，還得想辦法運送到上海寶鋼去作業。目前，必須另外鋪建一條鐵路以便運輸，這無論在工程上、經濟上都是非常不合理的。將來寶鋼的產品成本將非常高昂，即使用國內低廉的勞動力，也無法與日本的产品競爭，日本人厲害和毒辣的地方就在於此!

「人民公僕」，欺人太甚

一九四九年以前，由寧波到上海的交通工具，祇有乘輪船一項。由於懷舊，這次我決定放棄現在的陸空交通，搭乘輪船由寧波到上海，僑辦替我買了最佳的二等客票。二等客房有雙層舖二張，可住四人，廁所、浴室在下面一層甲板上。啓航後，在走廊上偶而與一船員閒

談，知道船上還有一間專門為部長級以上高幹準備的特等房間，平時不發售客票，因當時船已離岸，可以發售給海外人士，於是我補票款七十元，住進了這間獨一無二的大套房，裏面有專用浴廁，而且可以開小竈伙食到房間裏來進食。據這位好心的船員告訴我，出售給一般旅客的飯菜，都是船員吃剩下的東西，豬肉精瘦部份都是船員自己享用，餘留下來的下檔肥肉、皮骨，方出售給一般旅客，這算不算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呢?!所謂「為旅客服務」這句話的含意，對於社會主義大鍋飯制度下的中國船員，大概另有一種解釋吧!同時，這在世界旅遊事業中，也可算作是一件破天荒的新聞吧!

半夜三點到達上海十六舖碼頭，船在碼頭靠妥，就限令全船旅客必須於三點半之前離船上岸。我會要求在船中休息到天亮，未獲准許，理由是四點鐘船就離岸船港心浮筒。我的天!黑朦朦半夜三更，十二月底的天氣，細雨紛紛，天寒地凍，冷風刺骨，碼頭上想找一個躲雨的地方也不容易，不得已，買了一張到浦東的渡船票，在渡船裏躲一下雨。到五點，客運碼頭開門開放，進休息室再等，六點鐘有一家餛飩舖開門，吃了一碗餛飩，七點鐘才有一租汽車到華僑飯店，辦妥手續，進入房間，體溫已升到九十九度，發燒病倒了。

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國家，連國號也加上人民中國的字樣，人民，人民，把人民當啥玩意?!全世界有客船航行的地方，冬天半夜裏強迫旅客離船上岸，沒有吃的、休息的地方，也沒有交通工具，這是虐待人民，還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那些一向自稱為「人民公僕」的人，如此對待人民，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來美雜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安秉義

轉瞬來美定居已有多多年，在窮於奔波之餘，逐漸地也有一點時間對周圍的事物進行一些觀察。但感觸頗多，未知正確與否，願借貴刊一角與大家進行討論。

新的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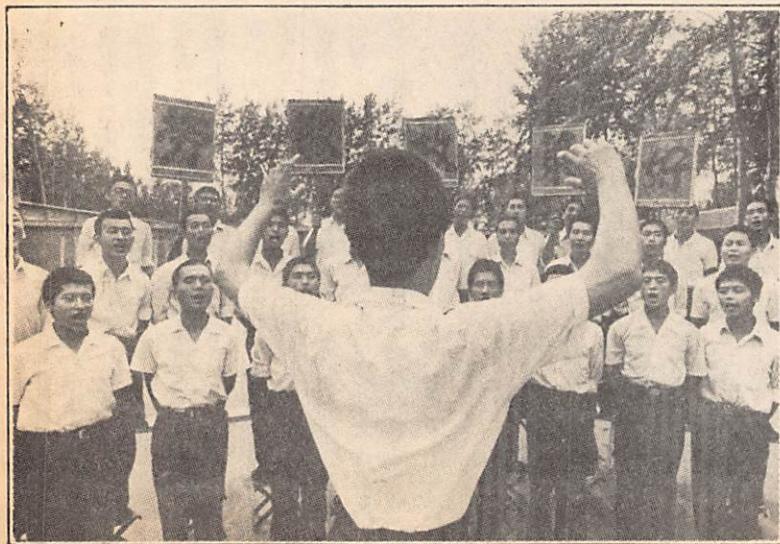
一貫以偉大、光榮、正確而自居的中國共產黨，據說是推翻了三大大山，解放了中國人民，實現了幸福的社會主義。在建國的初期確實哄騙了不少人。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家慢慢地感覺到：舊的大山似乎被推翻了，但新的大山又壓到了身上，而且比過去還重，號稱被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却成了新的奴隸，連最起碼的說話，遷移或尋找工作的權利也沒有，什麼都得由中共這個最大的中國奴隸主來進行分配。打了你的耳光，你還要跪下來向他叩頭，感謝他的恩賜。在所謂大躍進的年代，中共本身也承認非正常死亡有一千二百多萬人，而

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自相殘殺的武鬥，到底造成非正常死亡又有多少人，迄今未敢公佈。由於全國性的停工，生產上的損失也實在驚人。雖然沒有看到統計數字，但是從全國性的赤貧看來，中共所帶給中國人民的損失，恐怕已超過當年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所帶來的損失。在國內經常聽到美國的種族歧視如何，可是到美國後看看，雖然不能說沒有種族歧視，但相比之下，國內的階級歧視遠遠超過了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美國遭受了種族歧視還可向法院告狀，要求賠償，不幸在國內連告狀的地方也沒有，更不用說賠償了。由於中共長期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策略，更利用一些人，特別是黨團員打小報告，來鞏固他的統治，國內人與人的關係非常緊張，舊恨新仇交織在一起，這種「幸福」生活實在太可怕了。當然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沒有錯誤，但做錯了事總該有勇氣承認才行，不能輕描淡寫的說幾句應付過去，更不能將批評自己的人一棍子打下去，判以十幾年的徒刑，甚至槍斃了事

總之中共再自稱偉大光榮正確就大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向壁虛造，色厲內荏，不知椒面汗顏之嫌了！

無神論者人作神

毛澤東在文革中有這樣一句：「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群眾……」這是他做賊心虛，怕別人責問他如何濫用權力時，來個先發制人，中共就是會愚弄人民，迫使人民接受「勞教」了，還要讓人民歌頌「勞教」的「人道」。



制人。實際上群眾被當作阿斗，廣大群眾唯命是從，屁都不敢放一個。一個「人民代表」被「選」了出來，首先是感恩戴德再三感激指派給他當代表的黨，而不是想着如何爲了廣大群眾利益說幾句話。

中共迄今仍維持着它的統治，這不能不說明它愚民政策的成功。它規定在幼兒園、小學開始就要宣傳它的偉大、光榮、正確。在一個人成長的讀書階段，它通過政治教員、黨團員來宣傳它的四個堅持，每學期評所謂「三好學生」，第一條就是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一旦有一個學生的思想被發現越軌，輕的就失去讀書機會，重的就進了監牢。馬列主義本身應該說是一個學說，一個科學理論，雖然沒有經過實踐證明，它畢竟不是宗教。但號稱無神論的中共，却把馬列主義當作了它的教義，把黨的領袖當作了神，對不同見解的人，施以比中世紀宗教狂更厲害的酷刑（如割舌頭、割氣管再槍斃等等）。謠言重複三次就變成真理，這本是戈培爾——納粹戰犯的名言，却被中共採用。它通過它控制的報紙、電台，把中國人民哄得糊裏糊塗。三年大躍進，明明沒有東西吃，偏在報上討論富了怎麼辦？糧食多了怎麼辦？在文革期間，葉劍英元帥還簽發了一個文件說毛澤東可以活到三百五十歲，林彪二百五十歲。真想不到，當時聽傳達的大學畢業生、工程技術人員多數竟非常「高興」三呼萬歲，實在愚蠢之至！迄今我們胡總書記仍然非常聰明，再三強調報紙是黨的工具，爲黨服務，切勿不能「自由化」。因爲這是他們的命根子。

宗教不是麻醉劑

在國內時，宗教被說成是麻醉劑，麻痺群

衆的革命意識云云。但是在美國生活了數年，深深感到上帝的一些格言，却正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譬如說「上帝主張愛人」，而大陸人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爲地劃階級、搞鬥爭，你鬥我，我鬥你，愈鬥愈殘酷，倒還不如在基督教意識比較濃厚的國家裏生活，倒還有一種和睦的氣氛，溫暖的感覺。基督教主張寬容，原諒別人，而中共却主張報復、仇恨，以牙還牙……以至今天舊恨新仇糾纏着每一個人，因爲每一個人似乎都鬥過別人，有的又被別人鬥過，有的又擔心被他鬥過的人又來鬥他……

眞信上帝的人不敢做壞事因他怕他的靈魂日後受懲罰，這在相當程度上使這個資本主義的美國不致太壞。但不信上帝的中國紅衛兵、公安及監獄人員打起人來，其殘忍實在不可想像。且不說往人的死裏打，造成終身不遂等殘疾，就是被打者鮮血直流倒斃於眼前，仍無動於衷，而被打者又何罪之有？

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教給人恨，而上帝的格言却教給人愛，其教育的不同，也就有了苛政與仁政的不同。

評獎不公，矛盾橫生

人們常說，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要搞磨擦。初一聽覺得反感，自己是中國人，未免臉上火辣辣，再一想，得承認這是事實。再想想，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且不說一九四九年以前怎麼樣，因爲我剛誕生不久，實在不知道。但是，我長大後倒覺得中共的一些做法實在值得商榷。國內的一貫做法，無論評勞模，加工資，選什麼先進工作者等等，都是先定下一個百分之幾的比例，然

後要大家討論，那個夠格，那個不夠格。這一討論副作用非常之大，人爲地製造出不少矛盾，等於拿兩個饅頭叫十個餓鬼來分，於是你爭我奪，免不了一場火併。表面上看起來走群眾路線，非常民主，實際是事與願違。現在我們看看美國人如何搞，他們獎勵助教是設立一個箱子，叫學生投票（並說明原因），得票多者爲當選，未得者也不傷感情。另外他們加工資是另一種搞法，對工資不滿意者可以辭職，另謀出路……

頭腦裏面沒有人權

總之我覺得在美國比較尊重人，把一個人當人來看待。你所不願意幹的事，決沒有人強迫你幹，你不願意說的話也沒有那個人來強迫你說。

但是，不幸的是中共頭腦裏沒有「人權」兩字，什麼人在他的眼光裏，只是一個工具，於是有赤裸裸的「馴服工具論」的出現。把一個有頭腦能思索的人說成只是一個馴服的工具，爲實現它的目標而服務的工具。

難怪明明錯誤的東西，能從上而下，一貫到底。這就是它所訓練出來的馴服幹部隊伍，根本不去想想對不對，只要是上級說的，就認爲絕對正確。我曾碰到這樣的老幹部，親口對我說「上級交待的事，你就去幹，別問爲什麼，沒錯。」這就是他們的升官登龍術。

幾十年下來了，這樣的寶貝充斥了各個領導崗位，加上解放軍大批官兒們一轉業多數成了老爺的老爺……

整天想着去解放別人，做拯救別人的救世主的中共，現今似乎需要別人去解放他們，拯救他們了。

胡啓立、李鵬應看的幾封信

(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 伍石村

胡啓立、李鵬兩同志：

讀了「中國之春」第28期41頁的編者短評，無限的憂思又一次使我「陷入」對祖國、對民族那無法從根上斷裂的「心底」。「在中國大陸十億人口中，敢於講真心話的人並不多……一個民族衰敗到多數人在公開場合講違心話的程度，實在是悲哀到了極點。」外國人讀到這段話，可能不太理解它的複雜背景和深刻含意，而我們——在大陸生活了幾十年的人——却深深知道這些話的份量！我相信，你們兩位看到這些話也不會無動於衷吧？！

下面，我想摘錄些近半年來國內親人、朋友的來信片斷，供大家參閱，懇請二位傾聽一下中國老百姓的心聲，讀讀「人民日報」上見不到的新聞。

第一封 父親（老知識份子）來信：

「……三十多年來，我的技巧沒有什麼真正的進步，回想起來，這是由於我沒有深刻認識本專業的全面功能，太「功利主義」了。自然，這也是因客觀條件的影響（甚至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左」的路線確是危害極大，以至像曹禺、矛盾這樣的作家，解放後也沒有寫出過真正像樣的作品。」

第二封 朋友（原部隊文工團團員，現在加拿大）來信：

「……非常高興接到你的信，我們總有一些不能和「鬼子」們交流的事情可以互相傾訴發洩一下。說實在的，除了像我們這些可憐的『大救星』的受害者，誰能理解這個被遺棄、被毀滅的一代的心情呢？！誰沒有一個純真的、憧憬的童年？我們這些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紅色一代』，被個偉大的旗手愚弄的上下下，跟着喊了十幾年萬歲，待到初醒，一切都已過去，成為歷史，我們的『青春』也成了人生旅途上的『過去的歷史』，想來真

棄、被毀滅的一代的心情呢？！誰沒有一個純真的、憧憬的童年？我們這些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紅色一代』，被個偉大的旗手愚弄的上下下，跟着喊了十幾年萬歲，待到初醒，一切都已過去，成為歷史，我們的『青春』也成了人生旅途上的『過去的歷史』，想來真



文革爆發前夕，大陸這一代天真激情的少年先鋒隊員們，怎會預料到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黃金時代都將完全葬送在十年浩劫之中。

讓人痛心。有時候想起兒童時代的少年先鋒隊歌時，那種驕傲自豪感，那種國家主人翁的莊嚴情懷，還歷歷在目，烙在心口啊……『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紀念碑下，莊嚴宣誓的情景還每每激動着我的心：『小伙伴们，前進吧，革命接班人，祖國萬里河山在等着我們……』看看現在，看看這二十幾年走過的路，真禁不住滾滾淚下。……我已申請加國公民了，到時還需要考試、宣誓……」

第三封 國內朋友（某中外合資電影劇組）來信：

「……你是幸運兒，但願從這個好的開端，達到你理想的彼岸，現在聰明一點又有點路子的人都走這條路（出國），因為都對這塊土地的政權失去信心。我們拍的這個戲的作者是個文化界有名的『左老頭』，可他的四個兒子都在外國，說明他一點都不左，左是對外的！明白人都往外走。」

第四封 戰友（解放軍中級幹部）來信：

「你不能回來，回來的前景是不妙的，既然你已跳出了這張『網』，……我的生活、工作都還不錯，比以前好多了！因我學會說假話了，會拍『馬屁』了。完全是在『混』。」

第五封 朋友（大陸自費留學生·北歐）來信：

「……我臨走時去你家拜望了伯父、伯母，他們特讓我轉告你，以後家信、錄音帶中

不要談政治，到時政策一變，出了事，還要牽

連別人……。」

第六封 朋友（某出版社工作人員）來信：「現在國內流傳着些『民間』的口頭語，多少反映出百姓的心緒和國內『改革』的一個側面；如『團結起來吃老共（共產黨）』。又如『十七十八、清華、北大，二十七八，函大、夜大，三十七八，飛黃騰達，四十七八，累死白搭，五十七八，種菜養花，六十七八，等待火化，七十七八，實現『四化』』。」

摘錄以上幾封信我想就夠了。衷心希望你們，讀了這幾封信，不要「痛罵」，說什麼這些信是「編造」的；不要認為這些隻言片語代表不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們幾個要好的留學生在一起常愛說這樣一句話：出國是我們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轉折點」三個字所包含的內容，我想他們每個人都有一份心中的「萬言書」，只是不敢也不會再上報黨中央、上報毛主席了。我們都在各自思索今後的人生道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前輩的「教訓」，更使我們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那可貴的時間。在國外，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國在世界上是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同時也更加深了我們對你們——新中國新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殷切期望。我並不想加入到當今流行的敵對的一方互相漫罵的行列中去，而是想心平氣和地講幾句心裏話，而這代表部份「人民」的心裏話是決不可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如果「中國之春」發表此文，我將表示無限的感激。我深切地感到，中國的真正的春天是可望可及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

●留學生園地●

略談「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演變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洲）黎 民

民主共和國是人類歷史發展到現階段，最先進的政治制度。我同意英國政治家溫斯頓·邱吉爾的這個意見：民主制度雖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比起其它制度，它却是最好的了。民主制度或民主共和國在近代中國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翻開歷史來看，中國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中，就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在亞洲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是，中華民國出生不久，就差點被封建專制軍閥扼殺于搖籃之中。雖然經歷了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運動」以及以後的「護法」運動（保護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的一系列拯救新生的民主共和國的努力奮鬥，民主共和國的名義招牌是保存下來了；但是直到孫中山去世，這個「中華民國」仍然是被封建新舊軍閥、官僚所統治。

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為基礎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打倒了北洋封建軍閥政府；在這個時候，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軍閥對外屠殺共產黨，對內排斥其它實力派，熱衷於打內戰；他打着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正統旗幟，也利用了孫中山思想中一些反民主的東西，以及利用中央政府的合法名義，搞「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完全阻塞了中國向民主制度演進的道路。因此在蔣介石統治時期的「中華民國」，仍然是徒有民國之名，而毫無民國

之實。

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巧妙地舉起了被國民黨踐踏了的民主旗幟，聯合其它黨派，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號召組織「聯合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後，在美國的調停下，國共雙方和其它民主黨派同意組織「聯合政府」。中國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出現了向民主制度演變的可能（共產黨中也有人認為這是「和平民主的新階段」）。但是，由于蔣介石只迷信武力統一，只想搞「一黨專政」，共產黨也一心只想武裝奪取政權，因此，建立民主制度的設想，很快便變成了泡影。

共產黨在三年內戰取得勝利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久就實行土地改革，變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為農民的土地私有制，使耕者有其田，並沒收官僚資本，保護工商業，這些民主措施，使中國人民以為從此可以享民主共和的福了。但是，實際上，共產黨在政治上強化了「一黨專政」，完全排斥其它民主黨派，使其它民主黨派名存實亡；在經濟上建立了共產黨官僚的國家所有制，把工人完全變為國家的僱傭工人，農民完全變成了國家的農奴；思想上也搞獨家壟斷和專制。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一樣，仍然是假的民主共和國，仍然是以「共和」之名，行「一黨專政」之實；它只不過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名代替了「軍政、訓政」之名，以馬克思主義代替了三民主義，以社會主義之名代替了資本主義之名而已。

借用一等功臣的嘴

(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伍石村

讀了「中國之春」第二十八期寒山碧的「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的出路」中的一段話「……：共產主義運動只能在生產力落後、文化教育不普及、人民的民主意識淡薄的國家興起。」不禁使我想起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光明日報」甚至在頭版頭條)發表的解放軍一等功臣盛其順的匯報摘要。當時看後就覺得心中不是滋味！

我自己曾在部隊當過十年兵，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我們的戰士，至今還懷有深厚的感情。我曾經沿着紅軍當年長征的路(四川境內)走過，橫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激烈驚險的戰鬥場面，如今仍像夢一般時而浮現在我眼前。我還去過西藏，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山上，雷達連和戰士們共同練兵、生活，當時指導員送我的雪蓮花，今天仍似乎還聞到她的芳香！

但是，讀了盛其順的「匯報摘要」，我感到，中共如今利用中國勞動人民的樸實感情為自己塗脂抹粉，可謂在當今世界共產黨國家也是絕無僅有的，為破全國人民個人之小私而滿

足自己一黨之大私而使用的手法，花樣不斷翻新。從盛文可見，盛本人的文化水平很低，而突然一躍被捧為「戰鬥英雄」式的「超人」，其關鍵還在於要借他的口說出一般人不能說、也不願說的話：「……：我深深感到，過去對黨的認識和對黨員的態度是很不對的，開始從心底裏感到，我們的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共在面對目前的「三信危機」無法挽救時，竟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不惜借用人民戰士的鮮血、生命為自己病入膏肓的軀體打「強心針」！今天，在實在找不到為自己的錯誤和窘境辯解的理由時，竟不顧羞耻地搬出了三十多年前使用的「憶苦思甜」的辦法來為其遮醜！(當然，我要聲明一點，即對盛其順本人我是非常尊重的，但對他被人如此利用又感到很可悲)。

其實，當今大陸現實生活的種種事例，已經構成了對共產主義的最大諷刺。例如，現在講共產主義大目標、革命大道理，往往是最基層的共產黨幹部對那些知識、文化水平低的老

百姓的訓話；而愈往上，愈是知識水平高的階層，反而如十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巴金給十位小學生的覆信中談其追求的理想時所說的那樣：「我在二十年代寫作生活的初期就說過：『把個人的生命連繫在群體生命上面，在人類繁榮的時候，我們只看見生命的連續，哪裏還有個人的滅亡？』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把它們分給別人，不這樣做，我們就會感到內部乾枯。』你們問我伏案寫作的時候想的是什麼？我追求什麼？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話。我追求集體的幸福和繁榮。」巴金的覆信是十分耐人尋味的，通篇隻字未提共產主義，而却充滿了宗教色彩。說到這，我的思緒又岔到別一「枝」上去了。出國後這段時間，時常有人向我傳教，這對大陸學生開始不免有些好奇。我去了幾次教堂，和那些「基督徒」們以及「耶和華見證人」們討論了很多類似理想、人生觀等問題。最後我發現他們追求的天堂和共產主義天堂有許多的共同點。而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是把「天堂、人間樂園」的美好理想安排在「世界末日」之後；而馬克思主義理想的共產主義樂園却是被安排到現實世界之中來。人類有共同的美好理想，巴金在人生旅途「尾聲」中所得出來的人生追求的理想，最終是以「聖經」的學說為歸宿的。

盛其順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因一時思想「衝動」，表明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很「堅定」。但是，我敢肯定地說，隨着他人人生道路的繼續發展，他的這個信仰是不會「堅定」的，而且在今天看來，他的這個「堅定」又是顯得多麼「幼稚」(可愛的)！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國台灣留學生·日本) 黎音

作者簡介：黎音，男，中國大陸留日學生，長期研究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

去年，北京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四週年之際，官方精心組織了一場萬人歌會。許多把共產黨比做「救星」、「母親」之類的老歌又翻出來大唱特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唱了幾十年的，是中共歷來十分得意、非常欣賞的看家老歌，顯然是這場歌會的主題歌。那硬梆梆的旋律，標語口號式的歌詞，由萬人口中吶喊出來，着實有點驚天動地。其場面與氣勢不禁使我聯想起「文革」末期，「四人幫」垮台前夕，也是在官辦的歌會上，萬人亮開嗓門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情景。

當年，我們在「四人幫」的淫威下不得不在台上合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一邊唱一邊心裏暗想：「娘的，文化大革命好在哪裏？把人都折騰稀啦！」這真是名副其實的心口不一，現在回憶起來很好笑。但不知今天北京那一萬人在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時候，是否真正是萬眾一心，表裏一致？答案大概要在關起房門，知心者彼此密談的時候才能找到。

世界上往往有些事情很滑稽，偏偏是弱者喜歡逞強；醜陋者總要拚命地打扮自己；即將垂死的人樂意聽人頌揚他萬壽無疆；越是專制的政黨越熱衷於用各種手段標榜自己的功德，將天下動聽的詞句時時掛在口頭上。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嗎？我看未必。中國社會的發展是人民大眾推進的，中國歷史的文明是庶民百姓創造的。連毛澤東也不否認

「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當然，不能抹煞任何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歷史功績，但是，不尊重客觀事實，從心所欲的抬高某一政黨或個人的歷史作用，貪王功而為己有，不僅是對歷史的篡改，並且是對人民的藐視。

今天的中國大陸雖然仍沒有擺脫貧困落後的面貌，但比過去的中國是有了一些進步。這個進步絕非哪一個政黨獨自奮鬥的成就，而是億萬民衆踏着前輩用血和汗鋪成的階石，以智慧和生命所換取的。這個功勞無論如何不能完全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帳上。遠的不講，就從鴉片戰爭、辛亥革命談起，那時中共還沒有誕生。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實力尚且微弱。儘管現在中共將抗日勝利的功勞一家獨攬，但翻開真正的歷史（不是中共杜撰的黨史）來看，當時迎戰日本侵略者的並非中共一黨一軍，國民黨的數百萬軍隊並沒有白吃飯。烽火瀾漫的北國山河、中原大地不僅只埋葬着中共烈士的遺骨，國民黨的黨內、軍中也有無數鐵血男兒，英勇將卒。他們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也曾做出過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有過多少不容抹煞的卓絕貢獻，至今仍鐫刻在祖國人民的心中。而當時的中共軍隊，充其量只不過是為國民革命軍所收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已。抗日戰爭的勝利，還因為有廣大人民群衆做爲堅強的後盾以及國際間反法西斯力量的密切配合。中共幾十年來不停地進行宣揚，是由於共產黨一家「堅持抗戰八年多」才換來一個新的中國。這樣爲一黨之私利而公然歪曲歷史的高調，雖說者並不臉紅，然聞者未免嗤鼻。

沒有共產黨能有新中國嗎？我看可以。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前仆後繼的反帝制反封建鬥爭，已爲新中國的出現奠定了基石。民族要

獨立，國家要興盛，人民要民主早已成爲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在如此歷史條件下，倘若不是中共引進馬列主義（再加上後來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實行了一黨專制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能吸收、容納先進的多元民主政治與發達的自由經濟之精華，建立一個真正由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那麼，可以肯定，中國會少走幾十年的彎路，人民可以早過幾十年的好生活，中華民族可以提前踏入世界先進民族的行列。歷史已清楚的證實，共產黨的劣根性很強，他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局限性太大。中共執政三十多年間，中國像個蠕動的蝸牛，進進退退，擺擺搖搖，在緩慢、艱難地爬行。既使是目前的中國大陸，雖經中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大搞「改革」、「開放」，然而由於社會制度的局限，面臨的大堆難題仍然束手無策，無法根絕。在熱熱鬧鬧的一股「改革」熱浪湧過之後，失望的寒流開始侵襲人們的心頭。「改革」能否成功，連鄧小平都沒了把握。有識者皆認爲，目前的中國實無「新」意可看。如果豎着比（比過去的所謂舊社會），某些方面可說有點進步，但若橫着比（比世界上的先進國家或地區），都落後十萬八千里，是個地地道道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落伍者。因此，可以結論，沒有共產黨絕對可以有新中國。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共某種政治口號喊得最響的時候，恰是他在那件事上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當中共爲「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唱贊歌時，正是「三面紅旗」帶來全國性三年連續大災荒，餓殍遍地、民不聊生之際。當它拚命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正是「文革」的發動者與支持者都已苟延殘喘，「文革」的喪鐘即將敲響

的前夕。現在，中共又在大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說明中共已意識到「三信」危機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故而借歌招魂。這與胆小鬼行夜路自呼自唱而爲自己壯胆的心態差不多。

然而一個政黨或領袖的威信不是靠着自我標榜的口號就可以樹立起來的；信任的危機也不是憑着自我粉飾的功德可能挽救的。日本並沒有編一隻「沒有自民黨就沒有新日本」的歌曲，但日本人民自發地支持日本自民黨執政幾十年，至今威信不減當初。美國也沒有編一隻「資本主義好」的歌要人去唱，但一直在高唱社會主義好、「黨啊！我的媽媽」的中國大陸，却有人通過各種途徑源源不斷地投向資本主義自由國家的懷抱。活生生的現實還不足以使中共認真自省嗎？

人們自發的、從內心唱出來的贊美之歌，會成爲越唱越動聽的頌歌；而貼上官記商標、強制人民去唱的歌功頌德之曲，唱來唱去將變成一首葬歌、哀樂。這雖然不是甚麼規律，但却是幾十年來從中共歌台上摸出的實踐經驗。今敬奉中南海諸君，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信不信由你。



最後一個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洲)黃洵

老頭子忘記了日月。在這絕無一點光的黑暗中，這黑直黑進腦裏，黑在沉息，或黑在旋轉。偶爾的記憶或思索，就如漫天黑夜裏的一池濃墨遲緩地翻起一個小泡，很快又平伏。人虛脫孱弱。一點聲音傳來，使人知道是同伴在蠕動。誰也看不見誰，眼睛開與閉都是一樣，醒着睡着都是一樣，都是半死的狀態，死在深邃的黑暗中。

有一雙凶殘的眼睛，却時而在黑暗中游移，閃着碧綠的光。而這光也只是稍縱即逝。這是一間除非斜立，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將全身伸直的禁閉室。其原意祇是禁閉一人，但事實上總禁着兩個人。小室有一僅可容人鑽着出入的小鐵門，緊鎖着。小室中央的頂部另有一僅可容納一顆頭顱的圓洞，却上壓着一塊厚重的鐵板，也緊鎖着。空氣則從一條曲折的小管道輸入，光被剝奪。被囚的人常將鼻孔貼在氣孔上，妄想嗅到一點陽光。

每當室頂上傳入一片鐵器的聲響，他知道又一天過去了。也是每當這個時候，一股朦朧的信念促使他盤坐一團，在肚際交疊雙掌，吐納。這是他唯一的功課。然後，總是的，他聽見同伴的呼吸漸而粗重。他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但他實在無力，也無意阻止。如果同伴的呼吸漸而轉為平緩，這一天算是平安無事；如這同伴忽然站起來，狂叫一聲，用頭撐開室頂圓

洞的鐵板，一團光激射進來，使人無法睜開雙眼，緊接着「叭」的一聲槍響，鐵板沉重地覆蓋下來，同伴倒在血地上，頭在噴血。不久，室門打開，光再激射進來，屍體被拖出，新囚被推進，一切又復黑暗。

兩次光射，他都無法睜開眼睛，但以一命的價值，他得到兩次光照。他全身結着厚厚的血跡。

食物一天一次，少得不致使人餓死，且在入夜才送來。

新囚一開始總在哀號或怒罵，在厚硬的鋼骨水泥四壁碰撞，在自言自語，而後麻木。沒有人能挨得多少日子，不是在暴戾中尋死就是在無奈中尋求了結。

每天都有槍響。老頭子奇異自己的不死，大概全因打坐的緣故。每當打坐完畢，他內心慢慢地開拓一抹清明，遂想起一些發生的事情。很快地，精力消隱，他又復恍惚昏冥。

「為甚麼要動搖？」是他內心無數次的吶喊。

……
母親的坟墓就如瘦小的母親那樣駝着背立在家門前。

「媽！我回來了。」他揹着書包，却穿着厚重的雨衣，一頭亂髮，「今天沒有功課。」他想。

坟墓很潮濕，「你是無期徒刑，回不來了。」母親說。母親在流淚，地上濕透了。可是

，她在坟墓下面？

妻子忽然從屋裏奔出來，舉着一把大菜刀，向他劈來，他在淌血，碧綠的光在游移着。「我沒有罪！冤枉！」他欲呼喊，却無聲……所有的影像都那麼黑。

二

每天正午，營長命兩名士兵將禁閉室頂上的大鎖打開，他則在一排九間的禁閉室正前方不遠處，端坐椅上，長槍橫臥大腿，他守候着獵物。

他十分欣賞自己的槍法，彈絕無虛發，太神乎其技。每天他至少有一名獵物，多起來竟有九名，這叫他心花怒放，稱作九龍壁。任何想將頭伸直的罪犯，都祇有死路一條，他們得永遠向權威低頭、跪倒、匍匐。

他有一雙十分激光的眼睛，剛毅果敢。他的制服總穿得嚴嚴整整，且他的軀幹十分英挺，儼然像一個很幹練的長官。

每當開槍之後，他總咀咒：「狗娘養的，敢與我作對！」

事情起因於他向上級報告：本營已可自給。此外，勞改營地處一遠離大陸的孤島上，半年前一場風暴將唯一的交通艇打沉。日常用品、食物都停止供應，甚至連新囚犯也停止遞送。食物其實並不够供給，於是，犯人的食糧即被扣減。犯人極為不滿，爆發了全體絕食抗議。

他不動聲色，兩天之後，部份犯人不支，將送來的食物狼吞而盡，絕食遂告失敗。他得意地笑着。旋即，他將帶頭的全部投入禁閉室，說：「不准將頭伸出來。」結果，頭一顆顆伸出來，他一一槍殺了，十分快意却又憤怒難

過，他要考證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犯人遂被不斷地推進禁閉室，而每一顆頭的伸出，都是對他的挑戰。

老頭子是絕食的頭領之一，他沒有伸出頭來，這使他奇異，老頭子沉默寡言，但說過一句話總使他難忘：

「你有甚麼權利抗議？你是個死囚犯。」他說。

老頭子淡淡地說：「沒有我又怎麼會有你。」

老頭子有點不嗅煙火味，他對他用過無數刑罰，在老頭子的面上他得不到令他快意的神色。

午時過後，他復令士兵將禁閉室頂上的鎖鎖上……

正午，戰火正濃，他看見一名傳令兵從陣地後面奔來，一顆炮彈銳嘯着迫緊，他躍出戰壕，向那傳令兵撲去，炮彈在附近爆炸，他中了三片彈片，重傷在地，卻救了那傳令兵一命……

深夜，他輾轉牀上。不知怎的，他潛進了姐姐的房間，姐姐熟睡牀上，十七歲姑娘，喘息着滿房女兒的幽香，他輕輕掀開姐姐的衣裳，撫摸兩團潔白柔軟的肉峯，全身都在顫抖……

正午，他被父親剝光衣服，綁在家門的大樹上，全身被抽打得傷痕累累。烈日當頭，他的汗如雨下，淌在傷口上，一陣陣的劇痛。而長着狼牙的鄰家胖寡婦，是那樣邪惡地微笑着，瞪着他的下體，竟趁人不察之際，餓狼般撲上來，將之咬進口裡……

他沒有成家。父親其實是個很忠厚善良的人。

三

大個子士兵孔武有力，他可以將囚犯一隻手提起來，摔在地下。他對犯人並無特別的憎惡，他極服從命令。只要營長示意，他一頓拳腳就能將犯人揍得死去活來。

他盼望着役滿回家種田，或到城裏找份職業。事實上他已滿役，但上頭沒有批下文件。他沒有怨言，就等着。

起初，犯人一個個被槍殺，他認為：多殺幾個人渣是好事，被槍殺的越來越多，他并不在乎，這等人，既犯了罪猶不知悔改，猶作亂鬧事，實應嚴厲懲戒。

當有些士兵發出異語：不能濫殺犯人。營長勃然大怒，即將他們剝去軍服，監禁起來。說：「同情罪犯，即是犯罪。」他覺得有點不對。

這天，營長對他說：有人兵變。他急忙操起槍，跟着營長去鎮壓。營長槍殺了副營長，并將許多士兵監禁。他感到疑惑。

被監禁的士兵叫罵起哄，營長下令將之推進禁閉室，并一一槍殺了。營長說：「服從是軍人的天職，不服從就是死罪。」槍聲天天都在轟叫，屍坑堆滿了一個又一個，整個營地充滿了血腥腐臭。他感到恐懼。

疑惑、恐懼中，他終於發覺在營地中走動的祇剩下三個人：他、營長和大鬍子。大鬍子是營長最信任的親隨，而營長竟命令他們將沒有鬧事的士兵也押進禁閉室，整整一營人，竟似突然間消失。

這天，營長忽然用槍指着他和鬍子，冷冷地說：「你們也進去吧。」

他嚇呆了，吭不出半點聲來。大鬍子拔腳狂奔，營長開槍，大鬍子命喪當場。

老頭子發覺槍聲日漸稀少，而且，他發覺

他內心清明的次數增多，可能是生命的迴光返照。

這天他聽到室門被打開，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喝着：「進去！」跟着是「叭叭叭」三聲槍響，一人動急地鑽了進來，洞門隨即被狠狠地關上。

進來的人忽然放聲哭號：「我沒有犯錯，我絕對服從命令。」

「又是一個士兵。」老頭子想着，且發覺自己似在笑，笑得十分邪惡。

大個子士兵哭號到筋疲力盡而睡去。醒來的時候，忽然有所悟，又哭號起來：「他瘋了，他要殺盡所有的人，是他犯罪。」之後，他十分暴躁，在室內團團亂轉。但他不敢觸及老頭子，這使他的活動範圍更加狹窄。第一次無意碰着老頭子的時候，他悚然駭慄，那軟綿綿的軀體，就如一條盤着的蛇，尤其老頭子身上發出的、令人昏暈欲嘔的腐惡腥臭。

不知過了多久，大個子聲嘶力竭的時候，老頭子忽然問：「你是最後一個？」

老頭子的聲音來自另一個星球，以光年傳送，且在冷靜的空間詭異地迴響。大個子瘋狂般吼叫起來：「住口，你是鬼！你是罪犯，滾出去！我沒有犯罪！」

「丁點兒！」他絕望地喊着。

營長突然發覺九間禁閉室的人祇剩下最後一間的兩個人：老頭子和大個子。此外，每天他要為犯人入廚，并將食物送去。「我是營長？」他有點惑然。

他沒有動搖，守候着。正午，同樣的陽光。他也忘記了日月。營地變得很靜很靜，時間來得極慢却去得極快。

終於有一天，鐵板撐了起來。他舉槍、開

槍，鐵板摔下。他心中湧起無可名狀的快意。槍法仍然那麼準，雖然擊中的祇是一隻手。

黑在沉息，黑在旋轉，時日好好長好長。

大個子自從叫出第一聲「丁點兒」之後，發覺了一個秘密。每當室頂上的鎖被打開，老頭子盤坐蓮花，他則不斷地噓着：「丁點兒、丁點兒。」這使他能沉入深遠的黑暗更多時日。

老頭子終於忍不住好奇而問：「丁點兒是誰？」

這一次老頭子的聲音使他很受用，他要向人傾訴：「丁點兒，」他尷尬地笑了笑：「她是我的未婚妻，瘦瘦小小的，就那麼丁點兒。」

沉默了很久，老頭子忽然又問：「她躬背嗎？」

大個子有點愕然，他已十分孱弱，連丁點兒的形象也想不起來。他尋索着，然後說：「好像有點……」

他像是犯了禁，右手心挨了一槍，兩人合力才用內衣將傷口紮住。傷痛使他意亂情迷。次日開鎖的時候，他的槍傷實在疼痛難擋，且他正在發燒。他用頭頂住了鐵板，而老頭子忽然奮起，將他推開，兩人摔在地上。拼命的喘息着。

很長久的沉默。

「人總難得有點頓悟！」老頭子想着，站起來，頭頂着鐵板，用力向上。意料中的一聲槍響，他倒下了，頭在噴血。

營長知道擊中的是老頭子，不禁放聲狂笑。得到守候越久的獵物，越使人喜悅。這喜悅幾乎使他癱瘓。而鐵板再度上升，一顆頭伸了出來。他舉槍，扣機，「叭」的一聲。

夜懷

魏京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哲子嬰

秦城之月

越過鐵蒺藜

兵無盔甲

列槍森嚴

那鐵窗之冷氣

掠過你的眉梢

你靜坐如山

令天地肅然

夜仰秦城

若漠漠巨魔

吞噬着人間英雄

塊塊巨石

印上了多少人的淚痕

你冷對歷史長河

水波依然不興

而你胸中熱血

惟九州方知

想起你少年零叮之時

手上哪來旗幟

連軍服也不瀟灑

一聲氣笛長鳴

却已急景殘年

河西走廊黃砂瀰漫

塵烟在蒼茫的敦煌裡翻滾

獨赤裸的公社女

如蒙難的土觀音

煤灰、泥土抹得淒淒迷迷

你欲問蒼穹

羞恥為何

故事並非編造的

你站過的西單牆

早已一頁悲愴

風雨不再飄零

而你深鎖囚城

已沉默如歷史

秦城之月冷如故

看你安坐之神

欲數盡人間秋冬

今夜江山之雨飛騰

我欲試劍人已老

遂引頸高歌

日墮大地喲

而月則昇

九州方圓啊

誰可馳騁

登泰山而感氣豪

但願劍在人亦在

而今夜

能與我煮酒論英雄

捨你其誰

浩歌一曲

美酒千重

英雄既如是

何須今相晤

一九八五年元月卅一日定稿

優待券 \$3.00 附此券，減少訂費美金三圓，
此券有效期至1985年12月31日

您想知道：

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明天將要發生什麼？
新的一代想些什麼？

您想聽到：

中國民主化的腳步聲嗎？

(購買1—30全套中國之春費用為60美元)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訂費 (每年)
地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機關：60美元 200 港元
_____		普通訂戶：24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
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Tel: 3-667665

贊助2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請您提供其它學校的幾位大陸留學生名單

中國之春刊登廣告、徵求大陸留學生通訊錄以來，我們收到大批名單。有時，同一個學校的通訊錄，我們可以收到數份。這充分說明，廣大留學生是支持我們的。

儘管同一個學校的名單可以收到數份，但仍有一些空白學校。我們請您協助填補這些空白，方法是：向我們提供您所知道的其它學校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通訊處（只要有姓名、系、學校即可），提供一、兩位，也是有助益的。這樣的交叉提供信息，終將遍及各校。對於提供者，我們有如下獎助：

提供外校中國大陸留學生二名以上者，贈閱雜誌半年；五名以上者，贈閱一年；十名以上者，贈閱二年。僅提供一名者，則寄贈中國之春賀年卡一張。

您協助我們一分，中國之春的影響就擴大一分。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請中國大陸公費生 免費訂閱

美國華僑陳覺文，東南
亞華僑黃福瑞，原香港商
人林廣凡，捐出巨款，資
助近千名中國大陸公費生
免費訂閱中國之春。現仍
有空額，請速寫信訂閱。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 迎接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召開 ❖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民主的目標誰不向往？可是，怎樣才能成功呢？」我們總是聽到這樣的問題。

「怎樣成功？」我們的體會是：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就能成功。您加入民運的行列，民運成功的希望就大了一分。

孤獨時，常有無力感、無助感、無望感。加入民運行列，做一兩件對祖國前途有益的事，和我們共同奮鬥，會使您的這種感覺一掃而空。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房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085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B. P. 84, 75623 PARIS C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ENDING ≡
≡ FLUSHING N. Y. ≡
≡ 35-8237 ≡

T. P. Lee #9511 28-33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3-667665